

麦阳 刘蓬 著

再现一九五八年耐人寻味的诸多片段



中国青年出版社

沈从文

LIANG  
WANG  
ZHAO  
ZHONG  
DONG

一九五八

文学  
A752  
M2  
文学  
学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京)新登字08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在1958/麦阳,刘蓬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ISBN978-7-5006-8085-7

I.毛... II.①麦...②刘... III.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IV.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9220号

---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编辑电话:(010)64034329

责任编辑:吴方泽 wfz@cyp.com.cn

营 销: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010)64017809

印 刷: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7.75

插 页:2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定 价:28.00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35821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 写在前面的话

1958年是不平常的。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大跃进”运动，人们把主观意志和冲天热情任意泼洒在原本一穷二白的土地上，期望开出大同之花，而把称之为“科学”和“规律”的东西遗忘在角落。后来，这两场孪生姐妹般的运动均以失败载入史册。

1958年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中共中央在外地召开的各种会议也多达9次。

毛泽东常把北京比喻为“加工厂”。他实在不甘于深居红墙内，光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他1953年说过：“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来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他1957年说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不好就犯错误。”

在1958年毛泽东对大江南北的巡视中，所到之处，他接触了各界各阶层人士。那么，他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获取了什么原料又得到了些什么半成品？据此他又制造了什么样的思想产品？人们从中一窥的，又是毛泽东以及许许多多各级干部彼时彼地怎样的心绪和思维状态？头脑清醒者的确不乏其人，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之所以能主宰1958年中国的命运，也在于：在这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热情和空想泛滥。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 he 视做正确的，他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所大力倡导的，其诸多错误倾向也是毛泽东在视察中很快注意到的。那么，他的巡视对这次运动的起始、发展、高涨以及1958年底和1959年初进行的压缩空气、压缩高指标举措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早点儿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有过这样一个心愿：骑一头毛驴，邀上几位地质、地理和历史学家，从花园口到通天河，走遍黄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用3年时间走遍全国。但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

也许有人会大胆设想，假如毛泽东这个愿望实现了，中国是否会有另一番情景？

我们要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还在于毛泽东1930年就已经说过的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也没有发言权。无论得失，均在此中矣。

本书如果能反映以上之一二，便是我们的努力之所在。

本书不做理论的探讨与评价，也不做文学性的刻意渲染，而只想通过纪事性的描述，以1958年若干次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这恐怕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制造产品）内容作为每一章节的楔子，按时间顺序记叙毛泽东1958年初至年底在外省视察的诸多片段，以通俗可读的文字贡献给广大读者。所用材料基本以当时的报道、文稿以及事后有关的回忆文章为主，力图对学术界“大跃进”的研究有所帮助。本书十多年前初版，今修订再版，再读之时，仍觉出字里行间有些耐人寻味处。这本书，没有全面反映毛泽东1958年的所有活动，也没有对这个特殊年代做深入的描画与研究，更无法深入探究到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层面上。它撷取的仅是毛泽东在各省市巡视时所经历的一个个片段，它的价值，就在这诸多片段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可供有志深入研究毛泽东者所用。不足之处，亦敬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作者

2008年2月修订于北京

# 目 录

杭州会议/1958. 1. 上旬 ..... (1)

漫步小营巷,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战将陈炳文住过的旧宅  
有没有蚊子发生了兴趣 ..... (3)

说到土壤和农作物的关系,农科所所长是权威。但扶犁  
时他却被国家主席将了一军;“你行吗” ..... (6)

踏上毛泽东派来的专机,三位学者心情各异,然而等待  
他们的是一段西湖聚会的佳话 ..... (9)

南宁会议/1958. 1. 11~1. 22 ..... (15)

邕江冬泳,力显英雄本色。一封短信,“干涉”地方报  
纸。从没怕过蒋介石的人怕越下越大的雨 ..... (17)

专机接来两个“冤家”,也搅起事关三峡工程的一场争  
论。输也好,赢也罢,嫌一万年太久的毛泽东说:  
“两百年太少了” ..... (23)

最高国务会议/1958. 1. 28~1. 30 ..... (31)

说工人下班了,敷衍不了毛泽东。雪夜访黎明机械厂,  
他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职员太多;开工不足的浪费 ..... (33)

毛泽东对批评官僚主义的壁报感兴趣。这一天,他两  
次临时停车,就为看看自力更生的工业与农业



的机械化 .....	(36)
车到抚顺,市委负责人等得急出了汗。临别跨入机舱	
的那一刻,毛泽东转头微微一笑:“你们辽宁的粮	
食什么时候过了关,我再来” .....	(41)
坐国产汽车——毛泽东久有的一个心愿。五年奋斗,	
长春汽车厂驶出了“解放”、“东风”、“红旗” .....	(45)
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毛泽	
东抬头发现了镜头,忙挡住:别把我当戏拍进去 .....	(49)
<b>成都会议/1958. 3. 8~3. 26 .....</b>	<b>(53)</b>
请工人带路,去成都量具刃具厂。考一考厂里干部:“什	
么是文明生产?” .....	(55)
穿花径,踏春少陵草堂。步高台,毛泽东四字评杜甫 .....	(57)
口粮够不够吃?毛泽东不要听社干部的回答。和大家	
到处“摆一摆”,便摆出了“除七害”与“打破碗	
花花” .....	(60)
手指都江堰,毛泽东两次想到一百万年以后。俯视宝瓶	
口,突发奇想:过去有没有人游过?我想下去。麦	
地估产,他伸出四个指头 .....	(65)
专列停靠隆昌,却只找到一辆又破又小的轿车。突然下	
起大雨,毛泽东索性撩起大衣,在炭黑炉前蹲了下来 .....	(69)
听三峡惊涛,赏白帝古城,躬问船工生活,指点近代	
风云人物,盛赞四川青年革命家 .....	(75)
<b>汉口会议/1958. 4. 1~4. 9 .....</b>	<b>(81)</b>

一个春天的傍晚,正在老通成餐馆吃饭的一家七口发现

- 了一位不速之客。围桌而坐，客人手指汤包、豆皮：  
“这是真正的湖北风味” ..... (83)
- 参观火宫殿，视察部队，毛泽东关心干部给不给战士盖  
被子。抬头一望故乡的艳阳天，只道：现在可以种  
苋菜喽 ..... (87)
- 广州会议/1958. 4. 27~4. 29** ..... (91)
- 糖厂要不要砍？答案是：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吃不到  
糖的人想一想。春色撩人之夜，毛泽东乐呵呵披  
衣散步，不料被堵回了屋 ..... (93)
- 卫士张仙朋粗手大脚挑灯缝衣，因为毛泽东早就有  
言在先：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可以省点给老百  
姓穿 ..... (96)
- 毛泽东对西医治感冒不屑一顾，而惊叹针灸大有名堂！  
既然政治能除“四害”，外行便也能领导内行。他打  
算动手拨一拨卫生部这个“算盘珠” ..... (98)
- 六级干部在一起，毛泽东刨根问底问什么？村头地边，  
系上竹编遮阳帽：“我也像个农民了” ..... (107)
-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 5. 5~5. 23** ..... (111)
- 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便率与会全体人员坐  
大轿车往十三陵劳动。上万民工的眼睛只注视  
他手中的一把锹起起落落 ..... (113)
- 隐秀桥西，一个不眠的夜晚迎来一个旭日临窗的黎明。  
微风拂煦中遥望南天，挥就一首不寻常的诗 ..... (118)
- 听了徐水县关于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汇报，毛泽东屈



- 指一算：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最后还是他出了主意——社员一天吃五顿。只是粮食真有这么多种吗 …… (122)
- 《三国演义》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办社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安国的古药王庙一闪而过，爱论古的毛泽东此时却沉浸在现实问题中 …… (129)
- 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到了。一切竟如想象般好，他笑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 (136)
- 看完烟田看炕房，烟瘾很大的毛泽东觉得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一看“烟叶王国” …… (139)
- 在管理精细的玉米地边，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长葛无‘葛’啊！”面对 2000 斤亩产的保证，他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 (143)
- 红薯地边，有人上前扒一块红薯，个不大，再扒一块，还不大。毛泽东看在眼里，不让再扒，转身留下一句话：“亩产 13000 斤？秋后我再来看” …… (147)
- 毛泽东对乡干部说：“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对棉花专家说：“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 (153)
- 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表示怀疑：“搞亩产 10 万斤有可能吗？”不相信，却也不批评 …… (156)
-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一个个展台看起来，除了感慨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他认定，有了粮和钢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 (161)
- 三问张美珍，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构想通过校办工厂的方法来实现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理想 …… (161)

- 毛泽东要去正阳春饭馆吃顿便饭，不料饭没吃好，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清扫现场，鞋帽钢笔收了七筐半 …………… (169)
- 车过丰台，毛泽东去看菜地。听到“夜战”两个字，他转身向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 (174)
- 北戴河会议/1958. 8. 17~8. 30** …………… (177)
- 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决定再下去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 (179)
- 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香。一语点破，一片沉默。掰块面包放嘴里，毛泽东尝到的是什么味道 …………… (182)
- 长江水深流急，却是他最中意的游泳池。他还要把全国的江河都利用起来，让 3 亿人口都来游。18 次击水，对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 (185)
- 初到武汉，毛泽东就去看小高炉。他对王任重说：“你看要不要农业社开个庆祝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喝点酒，吃点肉……” …………… (193)
- 炼焦厂、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矽钢厂……校园工厂遍设。学生当了厂长，毛泽东看得高兴，但什么叫活性氧化铝？却没有人能答得出来 …………… (196)
- 毛泽东关注下面对钢铁事业有没有信心，并表示：“三顾茅庐也要看到出铁。”出铁看到了，出焦也看到了，面对苏联专家的宏论，他却表现得平静而客气 …………… (203)
- 能炼焦能做草酸，“大跃进”中的武汉妇女既敢想又敢做。毛泽东的片刻接见，更使她们干劲倍增 …………… (209)

两年后,武重人终于又迎来了毛泽东。听着汇报,毛泽东笑得好开心 .....	(211)
黄石地方虽小,却有个大冶铁山和大冶钢厂。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在炼钢镜中,毛泽东看到的是一幅钢铁“跃进”的未来宏图 .....	(216)
风高浪急,正是游泳好时候。一连看了两座小高炉,上了车却差点走不出安庆 .....	(222)
汽车开出一公里才知道搞错了方向,毛泽东没在意。他大感兴趣的是吃饭穿衣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前景。一出管天管地管神仙的新编剧更令他夜不能寐 .....	(226)
在安徽省博物馆,毛泽东对淮北河网示意图兴趣最大。看到几十种除“四害”工具,他开心了:老鼠就要遭殃啦 .....	(231)
视察省委办的钢铁厂,毛泽东提醒青年工人:你的胡子该剃了。参观新式农具展览会,他赞赏群众的发明创造 .....	(234)
张治中灵机一动,毛泽东慨然允诺。秋雨之中,30万合肥人从省委机关一直排到火车站。毛泽东说,他们是主人了 .....	(237)
拒绝专用餐厅,不用象牙筷,穿旧拖鞋,不让烫衣服。“我这儿还有半截烟,不抽不就浪费了吗” .....	(242)
中南海里,年轻时就擅长新闻笔体的毛泽东不但评说昔日《大公报》报人,还亲手描述他的9月之旅: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 .....	(246)
<b>郑州会议/1958. 11. 2~11. 10</b> .....	(251)
身在郑州,心在南阳。诸葛亮、二十八宿之首、每人每月	

几两香油……毛泽东连发三问,装了一书包  
汇报材料的南阳县县委书记却交了白卷 …………… (253)

毛泽东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  
个公社,但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  
样?”潮起潮落,他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 (256)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毛  
泽东想了又想: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  
灯夜战行吗 …………… (267)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 11. 28~12. 10 …………… (271)**

## 杭州会议

1958. 1. 上旬

这一年的元旦社论很有气势，题为《乘风破浪》。

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更令人激动的是，它提出了一幅十分具有诱惑力的发展经济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美。

几天后，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毛泽东还提出，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要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自1957年9月、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进一步批评两年前的“反冒进”。“反冒进”的代表作便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见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他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促退派不是“少数”而是“许多”。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到了批评右倾保守的时候了。他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自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欣赏，建议要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口号的人。

1958年的到来，真的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大发展、大跃进吗？

## 漫步小营巷，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战 将陈炳文住过的旧宅有没有蚊子 发生了兴趣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



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主席？她犹豫地说。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 10 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主席，欢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 61 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 61 号，走进 56 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 5 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子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 42 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 幢 6 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 89 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说到土壤和农作物的关系，农科所所长是权威。但扶犁时他却被国家主席将了一军：“你行吗”

1月初旬的一个星期天，冬日的阳光下，地处杭州市郊外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院内显得十分安静。午饭过后，留在所内值班的所长楼宇光走进办公室。

窗口，可以看到从杭州市区伸延而来的那条公路。公路上，出现了两辆小汽车。楼宇光看了一眼，没有在意。小车越驶越近，竟驶进了所内。楼宇光见状，连忙下楼。这时小车已停在两楼中间的空地上，车门打开，走出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毛主席！楼宇光愣怔片刻反应过来，三步并两步迎上去。

楼宇光的拘束和不安被毛泽东看在眼里，他伸出手，向楼所长问长问短，然后两人并肩向试验大楼走去。

大楼的走廊里，放着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毛泽东弯下腰摸了摸：“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那种双轮双铧犁？”

半个多月前，周恩来总理也曾到所里检查双轮双铧犁的使用和推广情况。楼宇光想，毛泽东或许也有耳闻，不过他还是详细地做了介绍。

走过休息室，毛泽东听楼宇光汇报所里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四个系和一个园艺组在研究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及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研究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的兴趣很浓，“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只结合着做了一些。”楼宇光回答。

毛泽东点着烟吸了一口，并不满意楼宇光的回答：“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听到楼宇光肯定的回答，毛泽东又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一位负责人：“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道：“赞成。”

毛泽东满意了：“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你是学什么的？”毛泽东又问楼宇光。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毛泽东沉吟片刻，打开话题，和楼宇光一起讨论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分与农作物的关系等等……他都请教得十分仔细。末了，他向楼宇光提出借一本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书看一看。

毛泽东心里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提高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个问题他已经琢磨不短的时间了。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提到了12项农业增产的措施：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实行精耕细作和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保持水土，保护和繁殖耕畜，消灭病虫害，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等。那么，这些措施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什么？能不能做一个更精练的概括揭示其内涵和相互间的关系？

毛泽东的思考其实是在为随后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打腹稿，他渴望详细了解有关的农业专门知识。他不否认自己在这方面是外行，但他相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而能够领导的方法之一便是向内行请教学习。

这种调查研究与虚心的请教的结果充分体现在毛泽东后来在这一年提出的“八字宪法”中了。它仅仅以八个字便概括出了农业增产彼此联系的诸方面：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

据当年担任山西省省委第一书记之职的陶鲁笱回忆说：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给每个人发了一本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并说，这是农业的基础科学，我看了，里边有辩证法，当第一书记的都要看一看。可见，毛泽东是赞赏威廉斯创立的“土壤统一形成学说”的理论的，他也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们多学习农业的专门知识。这次和楼宇光的讨论，他发表了自己对威廉斯的看法了吗？他借的书里有没有威廉斯的著作？也许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吧。

楼宇光去取书，毛泽东等人则走到大楼前的一片试验田前。这片田

的前后，环绕着供农科研究之用的两幢试验大楼和玻璃温室、职工宿舍等。试验地的东边，一群人正忙着准备用双轮双铧犁耕地，这是所里特意安排的。

工人张有根今天心情有些紧张，他反反复复地调整着调节杆，唯恐出什么差错，时不时他还吆喝前面两只依然悠哉地摇头摆尾的耕牛，让它们老实起来。

“你看，毛主席来啦！”有人小声告诉他。

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毛泽东已到跟前：“你会耕地吗？”

这一句寒暄使张有根放松了下来。

“好哇，你就耕吧！”毛泽东说完，就看着张有根牵动牛绳，让两头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地前行。有时，他弯下腰，察看着翻过的深褐色的土坷垃。

犁到地边，毛泽东问张有根：“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劲吧？”

张有根说：“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纵。”

“我行吗？”毛泽东转脸问大家。庄稼人出身的他今天想试试身手了。大家都说行。张有根等立即调过双轮双铧犁的头，把犁重新插入土中。

“你行吗？”走向犁边的毛泽东看见拿着书刚走过来的楼宇光又问了一句。

楼宇光没说什么，脸却红了，他不会犁地，也没有耕过田。

毛泽东似乎也并不在意楼宇光怎么回答。他走过去，扶住了犁把。冬日的阳光，照着田里这位正在犁田的国家主席。

## 踏上毛泽东派来的专机，三位学者 心情各异，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段 西湖聚会的佳话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谈家桢1月6日（注：此处当事人回忆的时间可能有误，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此时已赴广西南宁）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周谷城、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相识了。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主席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

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老习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他们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主席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主席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

主席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

赵超构这样说：“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对于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毛泽东还在1961年对这位学者的最后一次接见中关心过。1968年11月的寒风中，下放劳动正锄草的谈家桢被告知“解放”，也是毛泽东指名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至于周谷城，1965年在上海西郊同毛泽东共吟李商隐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这是这两位老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 南宁会议

1958. 1. 11~1. 22

南宁，轻风吹送细雨。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乘专机经长沙，于1月6日来到南宁。

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工作会议开得不轻松。开会通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会议内容很多，毛泽东的讲话也极丰富。经过充分酝酿，《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毛泽东的笔下诞生。

然而反“反冒进”主题的开始，使气氛骤然紧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的原件千里迢迢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圈点批画，情绪激动，并在会上不断插话，大批反冒进，把反冒进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从1月11日到14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

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要求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

他说，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是“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说，“反冒进”的教训是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

周恩来由于工作关系，原本并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也没有听到毛泽东的那些讲话。13日，他飞赴南宁参加会议。当晚，毛泽东与他和刘少奇

谈话到深夜。后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大批“反冒进”，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相继出台。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设想：在1958年9月以前酝酿一下他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组织鸣放辩论，征求意见，以取得多数人同意，使他能够离职后专做党中央主席，以便更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也使他有可能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他对“暮气”两个字耿耿于怀，他认为：我们都有些暮气，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革命朝气的对立面。

而这样的对立面，在毛泽东看来，是非打倒不可的。

南宁会议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邕江冬泳，力显英雄本色。一封短 信，“干涉”地方报纸。从没怕过蒋 介石的人怕越下越大的雨

1月7日的南宁，正值冬季。虽然没有北方的雪花飘飞，却也凉风刺骨。下午2点多钟，梁亚华等几个青年运动员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

练得正欢，忽见教练叫他，小梁连忙上岸。教练把他带到一位负责人那里。那人告诉他，马上准备，有紧急任务，具体就是陪首长冬泳。

首长冬泳？小梁心里琢磨着，冬泳可不像夏天游泳那么自在。会是哪位首长呢？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开到邕江边。那里，已经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选择合适的地点。

20分钟后，首长到了，竟是毛泽东！他在省委覃应机等的陪同下，走下轿车，显得有点儿迫不及待。

毛泽东1月5日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7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别出心裁地想游次冬泳，毛泽东主意一定，那是谁也劝不动的。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笑了：“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改主意，而且鼓励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更完衣，汽艇就朝江心驶去。也许是想适应一下气温，毛泽东竟穿件睡衣站立船头，浏览邕江两岸景色。好在不一会儿就到了选定的地点，梁亚华等早已划着舢板前来迎接。

天刮着小北风，江心的风尤其凉。除了几个经常冬训的运动员，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毛泽东先用江水浸湿毛巾，擦抹胸前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边上的人忙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梁亚华等也连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又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有了他的鼓励，卫士们便争先恐后朝水里跳去，一时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有人想说又不便说什么，只得咬牙坚持，一会儿便适应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没事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说：“不过如此！”脸上竟有些孩子般的得意。

他确实游得挺尽兴。时而蛙泳，时而潜泳，时而侧泳，有时又在激流中踩水。游到酣畅处，便拿出他的绝招：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长达几分钟不下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实在耐不住的已抽缩着身子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随队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不止一次劝道。

“再游 10 分钟。”毛泽东坚持说。

10 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 1000 多米。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终于上船。披上衣服，他又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

张木奇不断地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 20 度也冷。”停了会儿，又转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招待客人，每餐几两米饭，两三样菜也就行了，外出自然想不到准备点酒。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感到冷，只是不肯承认。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拧一条热毛巾来替他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围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要拧热毛巾，连忙摆手表示不冷。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的身上被冷风吹着，已经起来些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说什么，管自拧了热毛巾，替他用力擦

身。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也没再吭声，全身的肌肤在揉擦下渐渐红润了。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并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岸。

上岸后，他还走到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与一些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们见了面。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一列长队，他赞赏地笑了。这是他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啊，每到艰难挫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想起他们。他坚信，军队会毫不犹豫地跟党走，上刀山下火海。就在毛泽东与战士们交谈的时候，附近地里的农民、摆渡的群众、下班的工人闻讯，又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对两次在邕江冬泳，毛泽东颇为得意。后来他跟老友周谷城这样说道：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毛泽东在南宁的作息时间和往常一样，是上午休息，下午安排些会议和活动，晚上通宵达旦地工作。1958年11月24日出版的《新闻战线》第13期上首次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办好省报问题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就是毛泽东1月12日凌晨，在紧张工作后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时挥笔写下的。

刘建勋，当时是中共广西省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当时是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给这两位广西的“父母官”送去了几份各有特点、编得比较好、比较引人看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在信中说：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

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每到一处，总要把当地的报纸拿来翻阅研究一番，借以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和基层思想动态，并把这些同自己的所思所虑相映照。毛泽东自己也习惯动手写东西，一般不要秘书代办，即使对中央别的负责人，他也总要“干涉”一下用秘书多的问题。对报纸的宣传，他十分重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他亲自动笔写过不少社论，亲自动手修改的更不胜枚举，这在中央领导人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党的主席，他更是直接抓《人民日报》的工作。现在，他对广西的省委书记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求他们抓省报的工作，写好社论，办好报纸。

如此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空谷来风。这些天在南宁，他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着这么一些问题：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与学逻辑……他在1月16日的讲话中，就主要阐述了这些问题，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领导干部学理论，讲究文法词章，是毛泽东一贯也是特别的要求。从他身边所用秘书的博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是经常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的部长们，也一定深有体会。那些言不及义、枯燥无味的报告往往会

被毛泽东搁置一边，甚至会受到不轻的批评。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直到10个月后才由毛泽东亲自许可公开发表，引起新闻、报纸与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重视，此为后话。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广西壮族自治区跋山涉水长途运来优质的汉白玉石、大理石和花岗石扩建这封指示信的纪念碑，则是后话了。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此次在南宁，还经历了一次虚惊。说是虚惊，其实也确实令人不得不防。不过毛泽东却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那样的勇气和胆略。

那是1月17日深夜1点多钟，我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那时，台湾海峡不平静，风来雨去，瞬息万变。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心里紧张：别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一刻不敢怠慢，何庭一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却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卫士长：“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已经有些很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毛泽东又加重了语气。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埋头去看他手里的书，那是一本《楚辞》。他看得津津有味，忘记了外边的世界。

1月22日，南宁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了4万多各族群众。

也是不凑巧，安排下午4点钟的接见。不到2点钟，天就下起雨来。

南方雨水勤，雨水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不停。

还没出发的毛泽东眼望屋外，在想着什么。一会儿，他让卫士请来省委的刘建勋和韦国清，对他们说，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的确，安排4万多人的接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人群早已按指定的地区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他们在等待，即使是风吹雨淋，也在朝一个方向等待着、翘望着，谁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呢？

4点的接见提前到了2点多，毛泽东冒着雨来到公园。沸腾的人群欢呼着，盖过了风声雨声，冷雨和热泪一起流淌。

雨越下越大了。在连声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在青年们敬献的鲜花束中，毛泽东迎着人群走过去。他的步子迈得很大，脸上和御寒的风衣上早已滴满水珠。

接见结束，毛泽东对刘建勋和韦国清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叫他们先回去吧！”

专机接来两个“冤家”，也搅起事关  
三峡工程的一场争论。输也好，赢  
也罢，嫌一万年太久的毛泽东说：  
“两百年太少了”

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毛泽东指着那本地图。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毛泽东说着，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

林一山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由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不住点头，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21日，毛泽东重点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情况，以及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问题的分析。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他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泽东这样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

些什么理由？

对林一山，毛泽东了解颇多，这几年长谈短论有过几次。对李锐，近年虽无接触，却也不陌生。在延安时李锐在《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文章颇受好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也是他的专著，而且是个湖南老乡。湖南人的辣劲可是出了名的哟！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 “御前”争论见分晓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

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 2 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李锐的文章 8 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 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 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 1958 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 15 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做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中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 1978 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 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 5 亿吨，合 4 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 200 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 200 年太少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 200 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 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 年 5 月 20 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 最高国务会议

1958. 1. 28~1. 30

人不离镫，马不卸鞍。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26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阐述工农业发展目标、工作方法、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他信心百倍地说，经过去年的大鸣大放辩论，群众热情甚高，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他还从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引证“小米加步枪”的威力，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肉食者鄙。我们过去的战士每天是四钱油，三钱盐，可是能够打胜仗。那些美国大少爷兵却打败仗。

毛泽东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向两个方面开战：一是像除“四害”一样打掉官风官气，最好根绝；一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注意力要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去，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

毛泽东对明朝人徐霞客充满钦佩，认为徐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发现了“金沙江导江”，从而推倒了以前经书上的“定论”、陈陈相因的旧说——“岷山导江”。毛泽东还说到酈道元，那部《水经注》的作者：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随即召开，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实际上，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



会。会议期间，2月2日、3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继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在开会的间隙，毛泽东曾在2月5日乘专列到山东济南，同省负责人和一些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2月11日，会议结束。

2月12日，毛泽东的专机离开被他视为只“是个加工工厂”的北京，往能出产“原料”的基层而去。这次，目的地是东北。

说工人下班了，敷衍不了毛泽东。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他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职员太多；开工不足的浪费

天上飘着雪花。远处，灯似繁星，错落有致。

沈阳机场一派紧张肃穆。这是1958年2月12日的傍晚。辽宁省省委的有关负责人正在冒雪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接待工作已经检查了又检查，一切就绪。

1950年，毛泽东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回北京途中就在沈阳做过短暂的停留，顺便视察了沈阳医学院和一个橡胶工厂。辽宁是重工业地区，基础好，实力强，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此，毛泽东十分关注它的发展。时至1958年2月早春，毛泽东又要专程来此，视察几个工厂企业。

专机终于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已经等了不少时间的省委领导人兴奋地迎上前。

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一下飞机，互相认识寒暄之后，他提出第一个要求是：去工厂看看。

去工厂？这会儿？他们都愣住了。按预先的安排，应该是去宾馆休息。省委负责人上前说：“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不松口，重复说，他要去工厂。而且他对这个理由不屑一顾：“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又有人过来劝说：“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反问道：“工人不是三班倒了？”

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他。于是在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黄欧东、焦若愚的陪同下，毛泽东直接从机场到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兴建的，在当时来说是现代化的大型工厂。建

厂前，沙盘模型曾送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过问。这次毛泽东到沈阳，自然是最好的视察对象。

前面就是办公大楼了。打前站的人早已通知了厂方。由于事出突然，在此等候毛泽东的厂总工程师程华明既兴奋更紧张。

毛泽东下车后，拉程华明一起坐进了车，并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问清了程华明的职务，毛泽东说：“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一句诙谐的话，不仅把别人都逗笑了，程华明也轻松了许多。

说话间，总装车间到了，毛泽东径直走进厂房。正在工作的工人们被照相机的闪光灯吸引，循声望去，都怔住了——这不是毛主席吗？那么熟悉的面容。犹豫一会儿，不知由谁迈出了第一步，大家纷纷朝前聚拢。眼前的这个伟人竟伸手可触：一顶夹帽下，一张红润的脸，银灰色半旧的夹大衣。脚上，棕色的皮鞋前尖都磨白了……

毛泽东边走边详尽询问生产情况，有时为弄清楚一个细节，一连询问好几次。他问程华明，全厂总共有多少人？年生产能力是多少？厂里的工人、职员、管理人员各有多少？程华明一一回答。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职员，不是太多了吗？”毛泽东似乎有些不满意，但语气和蔼。

走到光荣榜前，毛泽东站住，问起干部下放劳动的情况。

程华明汇报说，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第一线当工人。毛泽东满意地点头，并说，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当他听程华明说边上一名正在操作的工人就是下放干部时，他特意走过去，和他握手。

宽敞的车间里，贴着不少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指着这些大字报，毛泽东扭头问程华明：“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有时也出废品的。”

毛泽东又问：“有停工现象吗？”

程华明说：“有的时候会由于原材料、零件供应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内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

法吗？”

程华明回答：“除生产主产品外，我们打算生产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很高兴：“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短暂的视察很快结束。夜幕早已笼罩大地，寒气袭人。然而毛泽东离开后，黎明机械厂却没有平静下来。人们议论纷纷，为毛泽东突如其来的视察而兴奋激动。见到毛泽东的人连说带比画，没有见到的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惋惜自己没福气。女工金玉凤从厂子到家有十几里地远，平日每天下夜班她都留宿厂内。今天下班，她按捺不住，穿过僻静的大街小巷，竟一口气奔回了家，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嚷嚷：“我今天见到毛主席啦！”自然这又让家人吃了一惊。

就在金玉凤往家赶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省委安排的宾馆里开始夜间工作。他随身携带的两大提包书籍和文件，这时都摊开来放在了书桌和硬板床上。

原来的房间里铺设了沙发床和崭新的被褥，毛泽东见到后，说：“这样的床铺我睡不惯，还是硬板床好，留一条毛巾被就可以了。”服务人员只好把厚被褥拿走，把沙发床面翻过来变成硬板床，铺上毛泽东自己带来的薄旧军被。

在服务人员整理床褥时，毛泽东自己走到洗脸间，把为他预备好的毛巾、香皂规规矩矩整整齐齐放在一边，然后拿出自带的牙具、旧毛巾。

床前的台灯偏矮，工作人员要拿走换个高点的，被毛泽东制止了：“垫一垫不就可以了么？”于是工作人员找来两块砖头，包一包，垫在了台灯下，毛泽东一拍手：“这就蛮好嘛！”

雪更大了，屋内的灯更加明亮。毛泽东伏案工作，全然忘了时间。

负责保卫毛泽东安全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已经午夜1点多钟了，他轻轻走进房间，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说：“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钟，毛泽东还在看书。当张铁军再一次催促他休息时，他却催促张铁军了：“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 毛泽东对批评官僚主义的壁报感 兴趣。这一天，他两次临时停车， 就为看看自力更生的工业与农业 的机械化

2月13日清晨，天放晴。雪后的沈阳，空气分外清新。曙光初露，便已有几丝春意传达过来。

通宵未睡的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便紧着催促安排下面的活动。由于昨天已经去过了黎明机械厂，所以今天的日程上便只剩下视察松陵机械厂，然后乘车去抚顺。

谁知这一天，毛泽东又两次改变计划，增加了对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的视察。

到达松陵机械厂的时间是早上7点半。毛泽东和随行人员的四辆小轿车相继开进松陵厂大门。

厂领导一一被介绍给毛泽东。厂长牛荫冠资历老，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已听说了他的名字。当牛荫冠站在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的超人记忆力发挥了作用。

他微微颌首，端详片刻，说：“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毛泽东听他回答今年47岁时，打趣道：“还是青年团员嘛！”

毛泽东一踏进总装车间的大门，就被一个在工作架上操作的工人瞧个正着，他脱口喊出：“毛主席来了！”这一下，整个车间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淹没了机器的轰鸣声。

毛泽东一边忙于和工人们打招呼，一边听介绍，有时还登上窄窄的工作梯子，观察产品的内部结构。

他看到车间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应该注意时事！”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报上《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上，问道：“这写的是什么？”

车间干部说：“是批评官僚主义的。”

毛泽东说：“官僚主义应该批判”，他转过身来环视周围的干部们：“群众贴没贴你们的大字报？”又说：“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在同车间干部交谈的过程中，毛泽东特意问一名车间主任，是否出国学习过。那车间主任回答说，是在工厂里学习的，毛泽东又问：“那么，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呢？”车间主任说：“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毛泽东满意了：“这很好。”

大家由在实践中有专门人才帮助造就企业领导骨干的办法，谈到如何培养技术工人。牛荫冠厂长介绍说：“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

毛泽东很关心地问：“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牛厂长说：“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毛泽东进一步问道：“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吗？”他对培养工人一专多能的方向做了肯定。

毛泽东走到工人苗春雨、刘智渊跟前，没等他们擦掉手上的油泥，就握住他们的手。他还弯腰拿起他们使用的风钻掂了掂：“再轻一些就好了。”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家便朝门外走去。到了墙角前，毛泽东忽然停下，伸手去摸暖气片，问大家：“那么大的厂房用这样的暖气片冷不冷？”

出了厂门，汽车早已发动起来。坐进车里，毛泽东说，去沈阳小型开关厂看看。

原来，在视察黎明、松陵这样的大厂时，毛泽东早已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有些原材料和重要零部件不得不依赖进口，发展生产的主动权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使他再一次想到他过去一贯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所以他一再问那些技术人员，哪些零部件我们自己能造，哪些还不能造？

当他听说沈阳市小型开关厂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几百个人在窄小破旧的民房里，硬是靠牛头刨、皮带床、老虎钳子这样的简单工具造

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时，他十分兴奋：“我要去看看。”

这样行程安排上又临时加了视察沈阳小型开关厂。

小型开关厂接到通知后的准备工作做得匆忙、仓促。当他们一边清理环境一边猜测会是哪位首长来时，毛泽东已经进厂。

在厂里，毛泽东问得十分详细的是电器开关的制造工序。同时还特别问到车间是否有通风设备，关心劳动条件的改善。

他拿着供机床自动控制用的电器开关，翻来覆去地看，爱不释手。小小的开关，寄托着毛泽东对民族工业发展的希望。

离开开关厂，便应往抚顺。车轻路熟，路过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却叫停车。

高坎乡旧站村的饲养员老王头一早起来就屋里屋外地忙活着，并没有感觉今天会有什么特别。

他端着一簸箕包谷，套上车准备去拉料。刚从东下屋推门出来，就看见几辆汽车开进村饲养场院里。他揉揉眼睛，仔细望去，看了看又揉揉眼睛再看，恍如梦中：那从车上下来的几个穿大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他还怕自己眼花，又使劲儿认了认。没错！千真万确是毛主席。

老王头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手脚往哪儿放，不知迎上前也不知说什么，只看着毛主席在那里和生产队长赵文泉说话，心里则翻江倒海：我今年73岁了，旧社会给地主侍弄了多半辈子牲口，没人理会过。如今在社里做饲养员，差一点就要老糊涂了，想不到能看见毛主席，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会到我的马棚里来啊！

其实，生产队长赵文泉这会儿也激动得不得了，话说得结结巴巴，也不连贯。当毛泽东看着马棚问他：“大牲畜是分槽饲养还是集体饲养”时，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是集体饲养，是集体饲养。”

毛泽东详细地向赵文泉询问生产队的土地、劳力、产量、社员收入等情况，特别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等问题。

当赵文泉介绍到去年入冬后农业社社员冰天雪地里破土动工打高坎乡第一眼电井时，毛泽东来了兴趣，拉住赵文泉的手：“走，你领我们看看电井去！”



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行人来到打井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已挖了9米多深的井筒，问赵文泉：“你们为什么要打电井？”

赵文泉说：“因为电井坚固，用水泥灌的，打得深，水量大。”

毛泽东问：“能浇多少亩地呀？”

赵文泉答：“能浇300多亩呢！”

毛泽东又问：“电力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着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就从那里引过来，电柱子都开埋了。”

毛泽东很高兴，指着第一眼电井的井架，又指指远处刚埋的电杆，说：“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回身又嘱咐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辽宁的工业比重大，一定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从电井工地往回走，毛泽东问积粪肥的情况，问社里壮劳力一年干多少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多少？男女劳力各占多少？种多少旱田，种多少水田？今年能完成多少水浇地？

走到地边上，快要上车了，毛泽东再次去握赵文泉那拿铁锹把刨粪的粗糙的手，使早已放松下来的赵队长重新激动不已，热血沸腾。

毛泽东坐车走后，高坎乡旧站村嚷嚷成一片。电井工张贵春比谁都后悔。毛泽东来之前，绞盘的大铁轴刚巧坏了送去修，几个电井工到市里搬运去了，他一个人在井底下生火烤井围子。因为上面用帆布盖着，加上烟雾很大，他根本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到这里，他懊悔地不停搓手：唉，要是那天连夜把绞盘铁轴运回来就好了！

生产队长赵文泉在毛泽东视察旧站村时是始终陪同在边上的。一连几个晚上，他总睡不着觉。一会儿想，这是真的吗？我真看见了那个和蔼的、慈祥的、高大的画像里的人？还和他说了话？握了手？一会儿又想，我这粗糙的生着老茧、冻出裂口的手掌，不会把他老人家的手握疼吧？

高坎乡的人好久好久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我真的看见毛主席了。有的说，我也看见一个穿银灰色大衣的人，是从后窗玻璃中看见的。没有看见的人则津津有味地转述着别人谈过的片段情景，用羡慕的口吻谈着赵文泉的好福气。

饲养员老王头也被大家用羡慕的眼光追逐着。他自己呢，则逢人就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来看我的马棚啊！毛主席到社里，不看别的，先看马棚，这就是说毛主席很看重马，看重畜力呀！”说着说着，他更骄傲了：“都说看见毛主席要多活十年呢！”

毛泽东的车队往抚顺而去，而抚顺那里早已翘首而望。他们都在猜测，毛泽东怎么还不来？

车到抚顺，市委负责人等得急出了汗。临别跨入机舱的那一刻，毛泽东转头微微一笑：“你们辽宁的粮食什么时候过了关，我再来”

2月13日上午，就在毛泽东漫步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旧站村的时候，抚顺市负责人早已心急如焚。照原定的时间表，毛泽东这会儿早该到了，怎么还不见踪影呢？别会出现什么情况吧？

毛泽东临时去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旧站村的事，无法通知到抚顺，所以这边一面检查各项准备工作，一边焦急地等待。他们已经在毛泽东要来的地方放了瞭望哨，以便随时通报消息。

就在大家越来越焦灼不安的时候，瞭望哨那里突然有了消息：毛泽东的车队到了，正往抚顺这里开来！

抚顺市市委负责人立即振奋起来，驱车前往迎接。车开出没多久，毛泽东的车队就迎面而来，掠过他的车朝前开去。

市委负责人坐的车连忙调头。就在这调头的工夫，车队已开出一段距离了。

抚顺市市委负责人忙叫司机加速，追上车队。追上了车队，他又让司机超到车队的最前面去。他要赶到前面去领路，然后再等着毛泽东下车才行。

超车哪里那么容易？一次两次，屡试屡败。为毛泽东等人开车的司机都是好手，驾驶技术特棒。但这会儿他们倒不是要抖本领，实在是因为弄不清要超车的这辆小车的身份。好好的你干嘛非要挤到前面去？更何况还有好多安全保卫的规章制度是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的。

这边的负责人急得出了身汗。急中生智，他一面让司机继续超车，一面自己伸出脑袋大声向车队那边报出身份姓名，说明要赶到前面去的目的。这一招还真管用，只一会儿，他便连连超越到了前头。

这位负责人赶到目的地，气喘未定，毛泽东的车队也到了。他轻轻舒

了口气。

这一切，毛泽东都没有察觉。他下了车，向这位负责人问好之后，他忽然挺好奇地问，天不热，你怎么出这么些汗？

抚顺市西部的千台山，冰雪初融，桃花水开始西流。毛泽东到抚顺西露天煤矿视察。抚顺市委书记处负责人、矿党委书记葛玄吾、矿长王齐芳等人上前与他握手，簇拥着进了矿接待室。

大家刚围坐下来，也许是烟瘾上来了，毛泽东一落座就毫不客气地拿起桌上摆放着的香烟，打量一下，说：“大生产牌的，好啊，抽一支！”

先听汇报，由王齐芳矿长介绍西露天矿解放前后的变化和目前的状况。当他讲到厂矿在总体改建设计中，常常因为国外进口的材料、设备不能按时到达，影响生产时，毛泽东语气凝重地一字一句插话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王齐芳告诉毛泽东，矿工们正跃跃欲试，要在1958年增产60万吨煤。

毛泽东问：“要不要增加人？”

“不增人，也不增加投资。”王矿长答。

“那用什么办法来增产呢？”毛泽东又问。

“靠发动群众，搞老矿挖潜。”矿党委书记葛玄吾接口说。

毛泽东点头：“这样做好。我赞成。”

听取汇报后，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话。

他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懂马列，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他拿起一块带有树叶、昆虫的页岩，颇为内行地讲到煤的生成过程。讲到抚顺的主要产品煤、油、电、钢、铝中，电是动力，是为其他工业服务的。他一连举出十多种特殊钢含有的化学元素，谈到什么是特殊钢。

他说，抚顺是个以燃料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煤的埋藏，量多质好，油的产量在逐年增加。煤和油含的成分很多，要研究如何把煤和油的原料提炼出来。综合利用很重要，价值很大，要把综合利用的问题好好研

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央支持你们搞。

他还谈到抚顺农业的发展,说,应当很好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争取超过四十条。郊区应当很好地发展副食生产,建立副食基地,郊区生产要为城市服务。蔬菜供应要做到自给,肉蛋供应要逐步做到多解决一些。养猪就看你们干不干了,要干,肉食就能自给。

谈话之后,毛泽东踏着很陡的梯磴,登上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及远眺抚顺市景,对露天矿的生产资源及过程,对当时举世闻名的180多米厚煤层及丰富的人造石油的资源——油母页岩,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问得详细,从大问题到小细节;他看得也详细,从远到近,从南到北。看台的风大,气候寒冷,陪同人员几次劝他下来,他都表示再等一会儿。

看到老远有几个工人沿着大卷下盘铁道正一步步向坑上爬来,他便问:“那是工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坐上下坑道的车上来呢?”

有人回答:“他们是大卷扬机铁道检修工,在那里工作。”

“噢。”毛泽东点点头。

忽然,他的视线停在远处冒着的几股烟上,问:“那是什么?”

王齐芳答道:“伪满时,日本侵略者乱掘乱挖,造成不少暗洞自燃发火。”

“能解决吗?”

王齐芳答:“能有办法的。”

毛泽东说:“要加紧灭火,不要把国家的资源白白烧掉了。”

从露天矿出来后,毛泽东中午时分抵达抚顺铝厂。他出现在车间门口的时候,人们惊讶又激动。正在检查铝锭质量的检查员常桂荣连忙放下小锤,摘下手套,想和主席握手,手伸出一半却迟疑地要缩回去。毛泽东看见,主动伸出手去握常桂荣的手,问厂里的负责人:“是自己培养的工人吗?”那人答:“都是本厂自己培养的。”

天气很冷。来抚顺前,随行的人看毛泽东衣服单薄,就准备了一件皮大衣。毛泽东不要,说:“不用了。冷,对自己是个锻炼,要不怕冷不怕热才行。”这时到抚顺铝厂,车间温度又特别高,室内室外相差竟有30度。有人提出,这样容易感冒,最好给主席送件大衣,毛泽东又谢绝:“工人同

志穿得单薄不是照样进出车间吗？”

铝电解车间弥漫着烟尘和怪味。毛泽东一进门，车间干部就送来两个口罩。他接过来，却不在意地用手拿着向电炉跟前走去，看工人操作，了解炉体结构和生产过程，还看了炉头上的电压表。整个过程，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儿不耐烦和无法忍受的表情，直到离开车间，那两个口罩还在他的手里拎着。

参观了抚顺铝厂，毛泽东到抚顺宾馆休息。并应大家的要求，在此接见市委机关干部以上的领导干部，照了相。

随后，毛泽东即乘车赶往沈阳机场。在那里，辽宁省，沈阳市、沈阳部队和辽宁省军区的 2000 多名干部，早已排列整齐地等待着。毛泽东绕场一周，挥手向大家问候，然后一起摄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和摄影师握手表示谢意。

下午 4 点多钟，专机轰隆隆地发动起来。在数千人的注目礼中，毛泽东向飞机走去。在跨入机舱的那一刻，毛泽东回过身来挥手告别。此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欢迎主席再来辽宁视察！”

“好啊！”毛泽东微微一笑，“你们辽宁的粮食什么时候过了关，我再来！”

## 坐国产汽车——毛泽东久有的一个心愿。五年奋斗，长春汽车厂驶出了“解放”、“东风”、“红旗”……

1958年2月13日下午，一个阳光明媚却寒风料峭的早春，毛泽东的专机由辽宁沈阳降落在吉林省长春市。

一下飞机，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迎上去彼此问候。

毛泽东眼尖，竟在人群中发现了曾经在自己身边做过警卫员，一年前已到吉林工作的申虎成。

“噢，小申，你也来了！”他很高兴地向申虎成打招呼。小申告诉毛泽东，自己这次还是担负主席的警卫工作。又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申虎成的心中感到暖融融的。

有人请毛泽东去休息室休息，但他不同意，要直接去长春汽车厂。

对长春汽车厂，毛泽东一直都很关心。

旧中国曾被人称之为“万国”汽车展览馆和修理所，街上跑的都是外国车，更不用说要找一家国产车的制造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党中央就把建设汽车厂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工程的重点项目。1953年，一个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计划问世。6月，在汽车厂建设即将破土动工的前夕，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字。这11个字后来被精心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

3年之后，长春汽车厂终于矗立在长春市郊。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汽车开出总装配线。毛泽东亲自为它命名为“解放”。

“解放”——这个词里包含着多少人的欢欣啊。当一辆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驰过城区的时候，长春沸腾了，驾驶室里的司机更是无比的自豪。

今天，刚下飞机，毛泽东就急于要去汽车厂，其心情可想而知。

他首先到了铸造车间。那里的走廊上贴满了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



大字报，内容是反浪费反保守，既有对干部提出的批评，也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还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形式多样，诗歌、漫画、数字、图表样样不缺。

走到这里，毛泽东脚步放慢了，又停下了，从头至尾细细地看了几分钟。他对大字报中表现的汽车工人做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尤其赞赏，感叹说，大字报好啊！看到大字报下面的实物展览，他又说：又有大字报，又有实物，这好。毛泽东的到来，使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称为“铸黑子”的工人们兴奋万状。而车间里哪个地方最累，哪个地方最脏，毛泽东也都要亲眼看一看，亲自走一走，问工作，问生活，周到细致。

从铸造车间出来，到总装配车间。这里扳手咣咣，手锤叮当，好不热闹。工人们见到毛主席，都赶紧把手底下的活干完，站起来欢迎他。毛泽东边走边看边和工人打招呼，还问他们累不累。

厂领导汇报说，这个车间的工人大多数是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点头，关切地说，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加强青年的思想教育很重要。

这时，总装配线上恰好一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装成开出。毛泽东注视着它，脸上洋溢着舒畅的笑意。

在底盘车间，毛泽东看了正在飞快运转的一台台平行排列的自动机床，还看了加工成型的零件。他拿起一个齿轮细细地看，又轻轻地用手摸着表面的光洁度，然后鼓励汽车工人们说：“好好干！”

毛泽东走过去之后，在一边的工人刘喜林连忙把毛泽东亲手摸过的那个齿轮拿起珍藏起来。

从长春汽车厂视察归来，毛泽东听取了吉林省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夜晚，毛泽东的屋里又亮起了办公的灯光。头一天在沈阳，他就通宵未眠，今天，他的精神依旧饱满。

申虎成回到他熟悉的毛泽东身边。主席依旧是那样的简朴。还是那件灰大衣，1949年进城后买的棕色皮鞋还穿在脚上，鞋尖已磨得发白。喝的茶、吸的烟都是自己带。还习惯睡硬板床，讲究的沙发和漂亮的被褥一概不用，只铺上那条已用了不知多少年的白布被子和灰毛毯。来长春，毛泽东头一顿吃的是大米和小米掺在一起的二米饭，外加一块红薯，两三

样菜和一碗汤。第二顿依然如此简便。人们特意送来吉林的特产松花江白鱼，盛情难却，他才让厨师切下一段，算是额外加了菜。

那一夜，申虎成看到主席屋里的灯光和在中南海一样是很晚很晚才熄灭的。

也许，在普通的人民群众的眼里，毛泽东只能是一位受人欢呼的领袖。而在申虎成，他感到，毛泽东更有一颗朴素的心。而这，是从许多他看起来很平凡的一举一动中体现出来的。

毛泽东对长春汽车厂的视察，时间并不长。但以后有关国产汽车的历史，仍然不能不说到毛泽东和长春汽车厂：

在毛泽东到此视察的三个月之后，长春汽车厂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东风”牌轿车。毛泽东听说，兴奋无比。不久，中央铁道部即派专用车厢到长春接运轿车到北京。

1958年5月21日下午4时40分，毛泽东专门检阅了这辆轿车。他问护送轿车的技术人员和司机的姓名，问轿车的生产情况和技术性能。他绕着轿车看了又看。最后，兴致勃勃地和在场的林伯渠一起坐上“东风”轿车，绕怀仁堂行驶了两周。下车时，他满面的笑容如春风般和煦，他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个场景的照片，更令许多中国人欢欣鼓舞，备感骄傲。

长春汽车厂的工人们尤其激动。8月1日，新中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又诞生了。不久，他们精心设计和制造了新型“红旗”牌高级轿车献给毛泽东。

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到了天安门城楼。缓缓行进的队伍里，有长春汽车厂特意送到北京接受检阅的各种汽车：红旗牌轿车，解放牌载重车、翻斗车、农用车、洒水车……当它们开过来时，毛泽东笑得很开心。

11月12日出版的《经济消息》第34期刊载的《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的好经验》送到毛泽东那里后，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篇消息报道长春汽车厂在充分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运动中，提出明年10月1日实现年产15万辆汽车的跃进方案。在大搞技术革命的运动中，工人不仅参加行

政管理,而且全面地参加设计和技术管理,并对生产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规章制度实行改革。毛泽东对厂里的这些做法很感兴趣,在11月18日专门批示把它印发到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肯定道:“要实行技术革命,就应当这样做。”

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是能不能造出汽车来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自尊与独立富强的象征。

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抬起头发现了镜头，忙挡住：别把我当戏拍进去

2月14日，风和日丽好天气。毛泽东这一天在长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上午接见了吉林省党政负责人，二是视察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对吉林省党政负责人的接见，气氛轻松活跃，毛泽东也谈笑风生。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和哪个地方的人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你们这是五湖四海啊，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谈话中，毛泽东很关心吉林省的农业。他一再强调，要搞好农业，农业搞不上去，其他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要把农业搞上去，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变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还很有兴趣地跟大家讨论有关农业科学的知识，问大家，“看没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介绍中外土壤学的各种版本。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读有关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赞成一位土壤学专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人定胜天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土壤的团粒结构，说破坏了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他强调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

毛泽东还打听吉林省的肥源，当听说肥源中有草炭时，他很感兴趣，详细地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并指示，要多搞农家肥。话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滔滔不绝地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靠细菌帮助的。

这时，毛泽东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啊？”当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回答出来。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声，毛泽东便对省委各方面的负责人说：“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要注意学习，除了政治理论，还要多读一点儿专业方面的书。”他这次到长春，随身就带

了不少农业问题的书籍，还让省里的同志再给找一批有关土壤学的著作阅读。

在省委负责人汇报吉林省的情况时，毛泽东很关心一个问题：“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有关负责人介绍道，常用的是“拉刀切土”法。就是头一天先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沿着格印，一大块一大块地撬起来，又会露出下面的暖土。

“附近有搞的吗？”毛泽东问。他是想去实地看一看。

有人讲到，吉林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有些人主张应当放弃一部分耕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他请示毛泽东，怎么办好？

毛泽东回答：“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定。”他鼓励大家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方针。谈话中他叮嘱又叮嘱，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

这天上午，毛泽东还在机关大院里分别和省市负责人合影，和机关干部以及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合影。天气虽不错，室外也有零下十多度，许多人还穿着棉袄、皮大衣，毛泽东却只穿一件灰大衣、单皮鞋。照像时，他还专门脱下了帽子。

对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视察也安排在这天上午。当时，有一些人正在办公大楼的走廊看大字报，看见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是又惊诧又激动。

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细心地看了贴满墙的这些大字报，又向厂负责人询问工作情况，问长影这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地制片厂一共拍了多少片子？

“只能拍 50 多部？”他似乎并不满足这个数字。

第 6 摄影棚正在拍摄故事片《红孩子》，拍的场景是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坡，虫声唧唧，一片秋夜景象。故事情节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以后，儿童团在一个夜晚机智地勒死了敌人的哨兵，缴获了武器。

毛泽东蛮有兴致地看着。一个场景拍完，厂负责人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孩子？”

毛泽东笑了，拉过小演员们到自己身边，问他们是哪里人？哪个剧团的？在哪个学校上学？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围着毛泽东，小嘴呱呱啦啦地讲个不停，都争着回答问题。尤其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更是偎到主席跟前，一步也不离。

看见如此动人的场景，机灵的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抢开了镜头。毛泽东抬头发现了，用手挡住，风趣地说：“不要把我当戏拍进去啊！”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走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的树叶和青草问，真的能不能用？又指着院内堆着的拆卸下来的旧布景布，问这些东西能不能再用？

第一摄影棚也在拍摄另一部影片，规定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位青年渔民得了重病，他的母亲为此忧愁无比。

毛泽东一出现，情况大变，扮演医生的忘了给病人看病，忧愁的老母亲笑逐颜开。

毛泽东也乐了，说：“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大家也都笑得更欢。

扮演青年渔民的演员，光脚从床上跳下来，握住毛泽东的手，也说：“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毛泽东夸张地说。大家更乐。

时近中午12点，毛泽东到了第一录音室。那里正在进行《火焰驹》的录音工作。当毛泽东一出现在检听室旁，一刹那，演员忘了歌词，乐队忘了伴奏，只是出神地望着这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半晌，大家才如梦初醒般叫道：“毛主席！”

毛泽东举手致谢，并和大家握手。厂长介绍说，他们是由陕西来拍秦腔《火焰驹》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秦腔电影剧团的一位演奏员，他的眼睛几乎全失去了视力，只能见一丝微光。他摸索着挤到毛泽东身边，使劲儿地看，看到了毛泽东的大衣。

他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他的眼睛没有瞎，他看到毛主席啦！

和大家见完面，毛泽东走到录音室门口，院里已围得水泄不通。毛泽东转过身，面前是一片欢腾的人海。



## 成都会议

1958. 3. 8~3. 26

在东北四天，毛泽东跑了四个城市。

东北之行结束后，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央的又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会议，但规模更大。

毛泽东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他的情绪很高昂，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认为这个高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批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但口气缓和了许多，将之定性为“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会后，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到达成都，主持召开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是这一年极具重要意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仅会上通过的有关决议文件就达四十几件之多。

毛泽东在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有多达6次的讲话，讲话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坚持原则，独创精神与破除经济工作中教条主义的问题；两种领导方法的比较，“冒进”和“反冒进”的问题；势如破竹，高屋建瓴，敢想敢说敢做的问题；在中国人民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关系以及处理好这类关系的问题；个人崇拜的问题。

他的讲话从民歌到赋比兴，从《西厢记》到玄奘惠能到欧洲中世纪经院学派，几乎无所不包。他表达的思路清晰而明了，“大跃进”理论初具形态。

成都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成都会议后，“跃进”之声一天比一天高，“跃进”的热情也一日比一日高涨。

## 请工人带路，去成都量具刃具厂。考一考厂里干部：“什么是文明生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成都。巴山蜀水，地杰人灵。3月4日到达，8日开成都会议。这其中的几天，毛泽东主要用来读书看报，了解有关情况。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

一是向书本做调查。外出时不仅总是随身携带几大箱子书籍，每到一处，也总要针对性地借书来看，毛泽东足迹所至，都留下了他借书的记载。这次到成都，他在这个蜀汉古都借览的则是《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地方志书籍。

二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情况。向人做调查的方法很多，除了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更愿意亲自下去走一走，更愿意兴之所至，而不是刻意安排。这不仅仅出于他无拘束的本性，更多的是毛泽东相信这样能使他获得真实的情况。

3月5日，毛泽东抵达成都的第二天，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庄稼长势。闲聊之中，他得知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便即兴提出要去看看，并说：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那时正是下午4点多钟，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的车间主任王德明正在办公室写工作报告，有人匆忙赶来说，毛主席已到了车间门口。他不信，对方再三说千真万确，他这才慌忙奔到门口去。

果然那里停着几辆小汽车，身穿银灰色制服、高大魁梧的毛泽东正跨步下车。王德明激动地迎上前去。

“你是车间主任吗？”毛泽东问。

王德明说是。毛泽东又指着屋内正在操作的锻工，比画道：“你会干这个吗？”

王德明回答说自己是车工，并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毛泽东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

“可以，可以。”王德明连声地说。

一进车间不远处，就看到锻工谢钦荣操作着 150 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干得正欢。火红的锻件迸发着火花，四处飞溅。王德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是太原的产品，大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走得很慢，问这问那，什么都很感兴趣。

在调直台前，他问：“这是什么的？怎么用？”王德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在材料库，毛泽东摸摸一盘带钢，问它的用途。王德明答，带钢是做量具千分表的材料。一个检查台上面放着新做出的许多配件，毛泽东拿起一件：“这是量尺吗？”王德明说，是量尺，也叫卡尺。毛泽东点点头，询问各种检查器的效能，对量具刀具的精密程度格外注意。

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住一位青年工人油迹斑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我叫吴朝武，今年 19 岁了。

毛泽东看完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才听到消息的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急急忙忙地赶到。毛泽东向他们打招呼，解释因为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他看得高兴，便要再到铣刀车间看看。

这是 5 点整工人交接班的时候，下了班的工人们一群一群涌向铣刀车间。

写在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一条条看着，忽然回头问道：“什么是文明生产？”这是墙报上保证书中的一条。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  
产有秩序。”厂干部回答。对这一解释，毛泽东显然挺满意，称赞道：“很好。”

毛泽东离厂时，天都快黑了。

## 穿花径，踏春少陵草堂。步高台， 毛泽东四字评杜甫

在杜甫草堂负责人林延年的日记本上，有一页不平常的记载，那就是1958年3月7日这一天。

杜甫草堂又称少陵草堂，在成都市浣花溪畔，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于唐乾元三年（公元760年）营建的居室。他在这里居住了3年多，作有《恨别》、《枯棕》、《病橘》、《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大量诗歌。只是原故宅早已不存，现在的草堂是五代前蜀韦庄等人在旧址重建的茅屋，又经北宋在此建祠宇，元、明、清历代培修，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从大门起由南而北，五进四院。正对大门的中轴线上排列着大廡、诗史堂、工部祠三重古雅的厅堂。院内古楠参天，翠竹丛丛，各种花卉应时而开。荷池水槛，溪流曲桥，幽静古朴。

这一天，正是杜甫歌咏过的“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春色无边的时节。下午时钟刚打过4点，林延年就被一位草堂的工作人员叫住了：“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草堂寺紧挨杜甫草堂东侧，古称梵安寺。唐郑纬《蜀记》中说：“梵安寺乃杜甫旧宅，在浣花溪上，去城十里。大历中崔宁妻任氏居之，后舍宅为寺。”林延年想，是哪一位客人参观没从大门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代猜想，边跨出屋子，向浣花祠甬道走去。抬头一看，走在一群人前面，已穿过“花径”向这边走来的竟是毛主席！

就在林延年一愣神儿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踏过小桥，环顾着四周的翠竹、苍松和高大的楠树，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工部祠是杜甫草堂最后一幢建筑，因杜甫当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而得名。一室三楹，肃穆庄严。林延年见过毛泽东后，便陪同他一起参观游览。毛泽东在看左壁间嵌着的后人凭吊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

时，十分入神，有时用右手轻抚下颚，有时把微弯的左臂背在身后，口中似乎低吟微咏。看了题壁，又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走出来往诗史堂而去。

“这是什么地方？”毛泽东问林延年。他是从后面步入堂内的，因此没有看见悬在前面镌有“诗史堂”三字的匾额。

林延年介绍说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看到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在看堂两壁间悬挂着的各种杜甫石刻像和画像，他便又一一介绍了每张像的来历。

堂正中有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毛泽东在它面前站定，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诗史堂东西两侧配有对称的陈列室，有回廊连接。毛泽东沿着这回廊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浏览宋、元两代杜诗书影。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版面宽大，字迹清晰易认。林延年告诉主席，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有多少本？”毛泽东问。

“发行到成都的约有十多部。”

毛泽东叹道：“太少了。”

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是政治诗！”

这是毛泽东对杜诗的一种评价。把杜甫这位现实主义诗人和他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相比，毛泽东更为喜欢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的豪迈奔放。1957年，毛泽东在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对杜甫“不甚喜爱”。

但毛泽东并不排斥杜甫，也并不妨碍他读杜诗。张贻玖在《毛泽东和诗》一书中就曾介绍到：从毛泽东故居藏书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圈画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等。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途中经过岳阳市，还索笔手书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毛泽东还把杜甫的《北征》一首推荐给别人看，和陈毅谈诗时，也举此例说明诗的赋、比、兴手法。

此时在杜甫草堂的版本陈列室，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看了历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看各种杜诗的外文版本。

最后，毛泽东走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休息。他的神情从容轻松，吐着烟，四下环顾。忽然他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间如此江山龙蟠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地念着，然后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

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派人来此借阅了楹联书十余种来读，其中就有杜甫草堂的对联，可见他对这里的对联颇有兴趣。

从大廨出来，便是草堂的大门，毛泽东对草堂的参观便算结束了。临行，他握着林延年的手，很平易地表示感谢接待。

夕阳西下，田野绿油油的麦苗和金黄的油菜花被映得愈加浓烈如画如诗。林延年一直看着毛泽东跨进汽车，平稳地在浣花溪畔的大道上愈行愈远。

第二天，成都会议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从杜甫草堂处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共 12 部 108 本。

他还为成都会议间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而拟题，并亲自校看稿样。在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的 14 首，所占比重较大：《剑门》、《蜀相》、《水槛遣心二首》（选一首）、《赠花卿》、《野望》、《狂夫》、《客至》、《登楼》、《绝句四首》（选一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白帝城最高楼》、《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和这部诗词集同时编印的还有明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

只是此时的毛泽东，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还是以诗人的情怀来读这些诗词的呢？



口粮够不够吃？毛泽东不要听  
社干部的回答。和大家到处  
“摆一摆”，便摆出了“除七害”  
与“打破碗花花”

3月16日下午6点多钟，夕阳已经西斜。郫县红光业社的社长周桂林、副社长刘贤松，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和农村工作部部长潘兆清匆匆赶到社机耕道，毛泽东就下了轿车。握手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忘记赞美周围的春色：“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毛泽东一边和大家在机耕道上慢慢地走着，一边向干部们问起生产情况。

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和绿色的麦田交织如毯，都江堰流过来的清水流淌在沟渠里，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一条小路伸向不远处的一户农家。“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侧过身征询社长们的意见。

“好！”社长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屋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位正患眼病的60多岁的老婆婆林赛华在家。她看见许多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躯的人进了门，以为是来了一位外省的大干部。

毛泽东在堂屋坐下，学着用四川话对老婆婆说：“我们摆一摆好不好？”

接着他问起林赛华什么时候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筹粮？一年分多少口粮？

说到口粮，毛泽东很关切地问：“口粮够不够吃？”

林赛华说：“够吃。”

这时副社长刘贤松说：“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400多斤粮……”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对林赛华说：“他说的不算，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

林赛华连忙道：“真的够吃！”毛泽东这才满意地笑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的社长？”毛泽东问。

“认得到。”林赛华转身指着周桂林和刘贤松说：“这是我们的周社长，这是刘社长，我们社还有张社长，穆社长……”

“社长对你们好不好？”毛泽东很关心基层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好。”林赛华笑着说，“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大家在一边听了都乐得很。

毛泽东又换了话题：“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七害’。”林赛华胸有成竹。

“七害？”毛泽东很感兴趣地俯身向前要听一听。

林赛华掰着手指数道：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七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林赛华说得头头是道。

毛泽东问：“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它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留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挺满意地对林赛华说：“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呢！”

毛泽东站起身进了灶间，想看看偷油婆是什么样。打开碗柜没有发现，却看见里边的碗筷收拾得干净整齐。他又到堂屋，问林赛华，能不能再看看你们的房间？

房间虽不大，但也整理得清洁整齐。毛泽东走出来，幽默地说：“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林赛华一本正经：“我们是贫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

毛泽东走出林赛华家后门不久，林赛华的媳妇就回来对她说，那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刚才那是毛主席？”林赛华这才知道刚才同自己“摆”了半天的不是什么外省干部，而是像片上常见的毛主席。她急忙三步两步赶出屋去追毛主席。追上了，却反而说不上话来。

毛泽东一边往前去，去看农田，一边向社长们问起社里有多少户，有

多少田，有多少生产队，生产队下有没有生产组。

周桂林说起一个生产队有三个队长时，毛泽东问：“三个队长里边有没有女队长呢？”

“有，每个队都有一个女队长。”

“组长里边有没有女的？”

“每个组都有两个组长，一个男组长，一个女组长。”

“有没有女社长？”

“有一个女社长。”

“怎么没有看到她？”毛泽东回身打量身边的一群社干部，有人立即找人去把女社长萧绍群找来。

不一会儿，萧绍群来了。毛泽东和她握手，关切地问：“你们社有900多户人家，管得下吗？”萧绍群说能管下。周桂林社长这时也说：“有党的领导。”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路边有一块麦地的苗显得比较矮小，毛泽东看见了，说：“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

社长们说：“这是社员们在自留地上种的小麦，不算好，是中等的。”

前边一块菜子田长势不错。毛泽东走进去，站到金黄色的油菜花中，问：“这样1亩田能收多少斤菜子？”

周桂林估摸了一下说大约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毛泽东把右手比画着胸前：“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又往上一抬，比到齐颈的高度：“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再往上举，到一人高的时候：“能不能长这么高？”一边比画，一边开心地笑着。

村里的一帮妇女和孩子围着毛泽东看个没够。毛泽东走过去，指着跟前的孩子问：“你上学没有？”他一连问了四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时，边上有人说她已经高小毕业，正在家劳动。毛泽东问她：“劳动好不好？”那小姑娘说好。毛泽东赞许地说，很好。

接着，他问社长们：“社里办了民校没有？”

周桂林说办了一个。毛泽东便道：“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们应允了。

转上一条小道，去看一块麻田。麻田前有一条1米多宽的沟。周桂

林跨过去，转身要扶毛泽东一把，却见他已跃步而过。走到麻田边上，毛泽东问：“会不会踩坏麻？”周桂林说：“不会，苗子小，从中间走不要紧。”

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走过来的小女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这女孩叫王祖运，她回答毛主席的问话说：“是开荒的时候被锄把震裂了虎口，正在化脓。”

“给她点药，把伤治好。”毛泽东对随行的保健医生说。隔了两天，毛泽东还惦记着这个女孩，又打发医生专程来为王祖运换药。

返回时，毛泽东又问起社里除“七害”的事：“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周桂林向毛泽东保证。

“你们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毛泽东没忘记问问具体的方法。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漏夜地干，到处吆赶，只留一块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打一个。”

“老鼠呢？”

“老鼠也好办。”周桂林又讲了灭鼠方法。

“苍蝇、蚊子呢？”

周桂林说，苍蝇蚊子就更好办了。

“为什么？”毛泽东挺有兴趣地问。

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并说“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孑孓。

毛泽东好奇地问：“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解释说：“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

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周桂林说好找，说完走到田坎边随手拔来一株。毛泽东拿过来看了看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并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天色落黑了，毛泽东离开了红光社。

“打破碗花花”的事三天后也有了结果。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里能杀蛆灭子了；还能毒杀土蚕、蜈蚣，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毛泽东把这个材料专门推荐给参加成都会议的同志，并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转述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

手指都江堰，毛泽东两次想到一  
百年以后。俯视宝瓶口，突发奇  
想：过去有没有人游过？我想下  
去。麦地估产，他伸出四个指头

川西平原春意盎然。成阿公路上，几辆小轿车飞驰而来。

这是1958年3月21日，正在成都召集中央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各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工作会议的毛泽东，特意来看都江堰。  
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晴天，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时分，便到  
了二王庙后的玉垒山腰。

玉垒山位于岷江左岸，成阿公路盘旋到山腰以后，至此转而向西蜿  
蜒。山麓有著名的二王庙，里面供奉着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守李冰及  
其子二郎。庙宇依山取势，高低错落，朱檐飞阁，雄踞江边。山脚下发源  
于雪山草地的滚滚岷江奔流而过，一览无余。

毛泽东在山腰一下车，便发出一声赞叹：“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  
秀哟！”

走到公路旁，他拿起望远镜，久久眺望远处隐约可见的大雪山。然后  
又把镜头移向都江堰，仔细观察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堰全貌，询问  
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分水鱼嘴、内江、外江和杓槎截流等情况。

这座由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率众兴建的巨大水利工程，久已闻  
名中外。千年岷江水波涛汹涌，经过都江堰却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出宝  
瓶口流入内江，造福农桑，使川西平原千百年来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  
馑，沃野千里，世长陆海”的天府之国。

由于它极其重要的水利作用，政府每年岁修，用力甚大。当省委第一  
书记李井泉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讲到这一情况时，毛泽东问：“每  
年岁修给不给民工钱？”李井泉答给的。

毛泽东又问：“修一次要多少工？”

张建中说：“大概要100万民工。”

毛泽东道：“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就省人力了。”又指指安澜索桥下的都江堰鱼嘴说：“今后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鱼嘴是都江堰的一个部分，是建于江心的分水堤，形若鱼口，通过此堤，岷江水分导流入内江、外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经宝瓶口入川西平原灌溉农田。控制住这里的泥沙，就可以减少内江的淤泥淤沙。

毛泽东到了在都江堰离堆北端的伏龙观。这是李冰的祀祠，有传说李冰父子治水，曾制服岷江孽龙，锁于离堆下伏龙潭中，后人立祠祭祀。观有殿宇三重，由前至后逐级升高至观澜亭，亭上可远眺索桥、鱼嘴及西岭雪峰。

毛泽东拾阶而上，到后殿看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都江堰灌溉区域图。他弓着身，看得很仔细，然后指着飞沙堰洪道问张建中：

“这里修个闸不更好吗？是不是？”

飞沙堰在鱼嘴及宝瓶口之间，主要作用是泄洪，调节由鱼嘴流来的水量，避免过多流入内江。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张建中表示同意。他又指着飞沙堰侧边的内江，告诉毛泽东说：“每年岁修，都在这里挖泥掏沙。”

毛泽东看了，就说：“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张建中说，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毛泽东点头。

走过伏龙观，到了宝瓶口。这是人工开凿玉垒山的一个延伸部分，形成一道口子，成为控制内江流量的天然闸门。因它的形状像瓶颈，所以有此名。这里水流湍急，涛声裂岸，内江之水由此而去，灌溉万亩良田。毛泽东迎水而立，指着宝瓶口两边的岩石问：

“这里岩石会不会被冲垮？”

张建中说：“这是粒岩，很坚硬的。”

毛泽东又笑着问：“一百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大家都没有料到这个问题，答不出来。不过后来有关部门还是有所考虑，并付诸实施，组织民工用钢筋水泥把它加固了。

毛泽东俯视着宝瓶口的激流，问张建中：

“这里有多深？过去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张建中答：“这里有8米深，没有人下去过。”



毛泽东突然明白无误地说：“我想下去。”

大家都感惊讶！这怎么能下去呢？何况，主席的安全是那么重要！

只有毛泽东自信地微笑着，不再言语。其实，他并不是当真要下去。依他的个性，他很喜欢去做那些极富挑战意味的事情，而且往往是愈挫愈奋，但他心里也明白，大家不会让他下去。他吁了口气，感到一种无对手的失落，还有一种英雄不能用武的无奈。

不知是谁把毛泽东来了的消息传了开去，伏龙观门口慢慢聚起数百人。当毛泽东走出伏龙观大门的时候，被拥上来的人群围住。

毛泽东好不容易离开灌县返回成都时，已经是晚上7时许。一路之上，毛泽东心情极佳。拔节的麦苗和成片的金黄色油菜花，令他更加心旷神怡。看见公路边田里有社员在劳动，他就让车停下，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

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他揉揉眼睛，有点不相信，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到这里？可眼前的这个人明明是毛主席，身边还有许多陪同的大干部哩。正当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时，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麦田里确实还有一些杂草没锄尽。

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冉贵全还是不知怎么回答。

毛泽东伸出了四个手指：“400斤？”

冉贵全这才如大梦初醒过来似的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这时陆续围拢来的农民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

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贵全说：“种水稻。”

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贵全道：“600多斤。”

毛泽东把头转向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说：“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似乎要一直追问下去。

“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道：“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冉贵全吭哧吭哧不知怎么对答，正想再说些什么，毛泽东已迈上田坎。

农民高淳然迎面而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淳然说自己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哇！”

沿着田坎走过去，毛泽东跨进一块苕菜地。地里几个女社员正忙着摘苕菜。

“你们摘什么？”毛泽东问。

其中的王应岗说：“摘苕菜。”

毛泽东走过去：“我帮你们摘点儿好不好？”说着，弯下腰就摘起来。不一会儿，把一把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了王应岗：“这行不行？”

王应岗连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其他几个女社员这时也停下手里的活，想喊几句毛主席，话到嘴边又激动得喊不出来。

出了苕菜田，毛泽东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去。几个孩子呼喊着紧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叫任国民的少年：“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打破碗花花”是一种毒草，可以利用来灭虫害。当地人怕孩子们乱采，便说采了这种草，便会失手打破碗，所以民间称“打破碗花花。”

任国民说：“认得。”

毛泽东弯腰随手摘了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任国民，问：“你敢不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说：“敢拿！”伸手就去接。

毛泽东笑了，很欣赏孩子的勇气。大家也都笑得挺开心。

毛泽东返回公路，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也很愉快，和大家握手告别，他很喜欢和这样一些淳朴的普通农民在一起。一位社员也握着他的手说：“一辈子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呢！”

天黑了，毛泽东的车开动了。地里的社员也纷纷收工回家，忙忙地向家里报告这个意外的喜悦。

专列停靠隆昌，却只找到一辆又破又小的轿车。突然下起大雨，毛泽东索性撩起大衣，在炭火炉前蹲了下来

3月26日，成都会议结束。

3月27日上午11时5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成都车站，往自贡方向而去。

专列开动以后，成都铁路局局长胡景祥就惦记着要见见毛主席。他的任务是送毛泽东去重庆，不趁此机会见见会终身遗憾的。他找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说：“在延安我还没有与主席面谈过，你带我去见见主席行不行？”叶子龙说：“没问题，等一会儿我就带你去。”

专列离成都越来越远，胡景祥想，叶子龙会不会因为事务忙，把自己相托的事情忘了呢？

前方就是资阳站了。这时，因为会车的关系，专列临时停车了。看见毛泽东从他的车厢里下来，胡景祥便主动下车直奔主席车厢门前。

车站内除一些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外，没有一个旅客。毛泽东下了车，东张张西望望，正与赶来的胡景祥碰个正着，毛泽东开口便道：“你带我在附近转一转。”这时，和其他各省省委书记们一道坐在专列中部车厢内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也赶来，和其他几位公安同志，一起陪毛泽东向出站口走去。

出站不远，就有一块菜园子地，里边种着一种既不是葱，又不是韭菜的菜，毛泽东见了，问：

“这是什么菜？”

胡景祥告诉他，这叫藟，湖南也有这种菜。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一种树问：“这是什么树？”

胡景祥说，这是桉树，生长较快，它的叶子可以制药。”

毛泽东听了说：“应该多种一些。”

经过铁路职工宿舍区时，毛泽东还顺路到一位铁路职工家坐了约 10 分钟，问了一些家庭情况，然后由职工家的后门出来回到站台。

在等候开车的的时间里，毛泽东幽默地问胡景祥：“你是什么官？”

李井泉代为介绍说：“他是成都铁路局局长。”

毛泽东问：“叫什么名字？”

胡景祥回答后，毛泽东点头道：“这名字取得好。你到过延安没有？”

胡景祥说：“我在延安住了 6 年，有 3 年多时间住在枣园后沟。”

毛泽东又看了看胡景祥：“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胡景祥说：“当时人较多，没机会接触主席。”

毛泽东点头，又问：“成渝路有多长？”

胡景祥说：“505 公里。”

“全局有多少职工？”

“正式职工不到 3 万人。”

“你同我们一道去重庆吗？”毛泽东再问。

“我是专为送主席来的。”胡景祥说。

“那好嘛！”毛泽东说。

大家一起上了专列。一声汽笛长鸣，往内江驶去。

离开资阳站后，柯庆施找到胡景祥问：“局长同志，怎么站上看不见一个群众呢？领袖不能脱离群众嘛！”

胡景祥表示，这不是铁路的问题，是地方公安部门布置的。于是，就把省公安厅一位护送专列的副厅长找来，要他通知前方停车站允许群众进站，但同时考虑安全，在专列将要出发之前再放进来。

专列停在内江，李井泉、胡景祥等人又陪同毛泽东下车走动。看见不远处有一幢农舍，毛泽东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无奈小道两旁全是水田，道不好走，他只得说：“往回走吧！”

回到站台候车时，胡景祥向毛泽东谈起，内江是产糖的名城，南边的自贡市产盐也有名，那里还有天然气，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趣，对李井泉说：“天然气我还没有见过，让我看看行不行？”

原本计划要去自贡，但此时去自贡的计划被临时取消了，再要变计划很难。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井泉立刻紧张起来。

“前面隆昌县有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是可以的。”胡景祥出主意说。毛泽东同意了。

这边李井泉赶紧吩咐胡景祥，马上通过车站打电话转告隆昌县做准备。

下午6时许，专列停在隆昌车站。这时车站站长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胡景祥：“隆昌县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他们都不在家。”

胡景祥也慌了，急忙告诉李井泉，他也着急没办法。李井泉陪着毛泽东，还有柯庆施等不少陪同人员都在那儿等着，从车站到气矿有10多公里，急需用车，怎么办呢？

就在胡景祥带着车站站长来回奔忙，想办法的时候，突然从内江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车停下，跳下来一位省公安部门的同志。原来，专列在内江车站开动时，这位公安同志因故漏乘，只得临时找来一辆车赶往下一个停车站隆昌。他这么一个差错，没想到救了这边的急。

这辆车既小又难看，破旧不堪，但有比没有强，只好让主席将就了。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主席由李井泉陪同坐小车，柯庆施他们十来位陪同人员怎么办？

胡景祥问站长，能不能找到一辆卡车救急？

站长犹犹豫豫地说：“刚才炭黑厂来一辆卡车到站运煤，行不行？”

胡景祥听了，只得说：“你快去叫司机把车开到这里来。”

一辆脏又没座位的卡车开到柯庆施他们跟前。正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毛泽东有些心急了，他一挥手，大声叫着柯庆施的名字：“快上嘛！”于是柯庆施他们只好一拥而上。

毛泽东和李井泉上了小车。李井泉招呼胡景祥上车带路，胡景祥说车站还有事，就让一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坐在了司机旁边。

天空阴云密布，汽车出发不久，突然下起挺大的雨来。胡景祥心里叫苦，主席坐的车虽然不好，尚能避雨，柯庆施他们坐在大卡车上怎么办？

那边，隆昌气矿已接到火车站的电话，要气矿矿长火速带着小车到火车站。小车一时找不到，矿长刘选伍急忙坐上一辆中吉普出发。公路凹凸不平，司机也管不了那么多，加大档猛开。

快到隆昌县城时，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会车

时，大车上有人向刘选伍招手，刘选伍急忙叫司机调头。此时，隆昌县委领导也已得知主席专列到隆昌站的消息，派了两辆吉普赶来，终于在离车站不远的途中与车队相遇，及时使柯庆施他们换了车，免遭雨淋之苦。

刘选伍乘的中吉普车车速较慢。当他到矿上时，毛泽东等人已被行管科副科长冯占海迎进矿的小招待所会议室。气矿的几个年轻人林国浓、谢奉露、王大芬看见了小车里坐着的毛泽东，急忙跑到招待所，从门外探头探脑。毛泽东招呼他们进来，问他们的姓名，和他们握手。这时谢奉露等看见刘选伍推门进来，忙说：“刘局长来了！”

刘选伍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我原在四川石油局，去年来这里兼任矿长的。”他伸手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气矿的关怀。”然后，他转身向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李井泉说：“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吧！”

李井泉说：“主席主要来看一下气井和天然气生产，边看边介绍吧！”

这时，这次也陪同毛泽东来川的王任重问：“气井有多远？”

“气井离这里有4公里，炭黑生产车间只有1公里多，都在后面山坡上。”

李井泉征求主席意见道：“我们现在就去看吗？”毛泽东站起身表示同意。

大家一起出门下坡，刚赶到的矿党委书记安增彬先行一步去车间安排。这边刘选伍陪毛泽东坐一辆车，其他人分乘别的车也朝后山开去。

刘选伍上了毛泽东的车，感到十分拘谨。毛泽东便首先开口问他：“天然气含有什么成分？”

刘选伍答：“主要成分是甲烷、乙烷等碳氢化合物。”

“还有些其他成分吧？”

刘选伍说，还有少量的硫化氢。接着刘选伍说到隆昌气矿正在试验用天然气制造合成汽油。毛泽东很感兴趣，问天然气要制造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等成分。

路不太好走，时而拐弯，时而爬坡，路过机修厂、配电所、仓库……车直接开到炭黑车间。

大风夹带着烟雾四处飞散，毛泽东往车间里边走去，听车间副主任梁



锡远讲生产操作过程。

当他听到天然气中的硫化氢通过脱硫塔被脱出时，抬头看着飘散的烟雾，问：“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

梁锡远和安增彬回答说，硫化氢随空气跑掉了。本来可以回收硫磺，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毛泽东意识到，这不仅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他说：“要尽快解决回收处理问题。”

走到生成炭黑的1号火房面前，梁锡远打开它的小门让毛泽东察看里边的燃烧情况。风大，又有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毛泽东转到最后21号火房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输气管上密密地排着上千支火嘴，喷着红黄色的火焰，烧成的炭黑粘附在火焰上方慢慢移动的槽钢上，再被刮板刮下来，经螺旋输送到包装车间。

毛泽东看得很高兴。这时在露天，还下着雨，他嫌站着看不甚清楚，索性撩起身上的大衣，蹲下来看。他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梁锡远答，按照设计安装是1728个。看着看着，毛泽东发现槽铁似乎没有像梁锡远说的那样要来回移动，便问：“怎么看不出槽钢在移动？”

梁锡远解释说，槽钢移动很慢，10分钟只移动1.8米，不容易看出来。

毛泽东问气矿的年产量，梁锡远说，现在气矿的产量已经比初建矿时增加了5倍以上，有1000多吨，约占全国炭黑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站起身来，问柯庆施：“你看到了没有？你认为怎么样？”

柯庆施说：“看到了。自流井（属自贡市）是用天然气的热能烧盐，这里的热能没有利用起来。”

毛泽东说：“自流井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炭黑。”他很内行地指出了解决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问题。

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钟，风没有停，雨也没有住，毛泽东的衣帽已被打湿，他还想去很远山上的产气井。

天黑路滑，再加上时间也来不及了，李井泉和柯庆施都竭力劝主席不要再去，毛泽东总算点头同意了。

回矿的路上，毛泽东又想起问一个问题：“这个矿是不是外国专家设计的？”



安增彬回答说：“是我们中国专家设计的。”并介绍说气矿建立在1953年，现在已经从解放前的一口小井，发展到了20多口井。刘选伍还告诉毛泽东，他们现在能生产一种炭黑，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炉黑。毛泽东听着高兴得不住点头：“很好！”

回矿的路上，两边山坡和桥梁街道，早已挤满了人。毛泽东坐的那辆简陋的小车就在欢送人群组成的夹道中驶出气矿大门。

胡景祥在隆昌车站等候着毛泽东一行。专列要离开时，大量的群众忽然拥入站台，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争先恐后跑上前与毛泽东握手。这里的人比内江车站多得多，为了安全，胡景祥只得挡在车厢门前，许许多多双手从他面前伸向站在他身后的毛泽东……

专列加速。毛泽东进了车厢。人群渐渐看不见了，隆昌车站也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

28日凌晨2时，车至重庆，层层叠叠的山城还在睡梦之中。

## 听三峡惊涛，赏白帝古城，躬问船 工生活，指点近代风云人物，盛赞 四川青年革命家

夜已经很深了。春风吹拂，江水微波荡漾。山城重庆早已沉入梦乡，只有朝天门附近的江峡轮灯光闪烁，正在做出航前的准备。

3月29日凌晨2点多钟，几辆小汽车停在码头，船上的客运组组长殷正禄连忙出来迎接。是毛主席！吃惊之下，殷正禄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什么。他只知道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武汉，却不料重要的客人却是毛主席。

江峡轮起航了。船员们知道这将是一次难忘的航行。他们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每一个操作动作都十分认真。

毛泽东坐在三楼船尾上，眺望两岸风光。在四川，他跑了不少地方，了解了不少情况。成都会议开完了，4月1日还有一个在汉口开的中共中央会议。汉口会议上，自己该说些什么呢？比如，对农业生产的宣传是不是有些不实的地方？比如，破除迷信的问题。

这时，中共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引水杨大福和年轻的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转身发现了他们，连忙打招呼，跟他们握手，并要他们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问他们的名字，年龄，哪里人，在船上做什么工作。

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一支烟，开始和杨大福他们聊天。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他问石若仪。

石若仪落落大方地说：“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毛泽东关切地问。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样害怕了。”

“是啊！”毛泽东赞同道，“当你对一些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有4年多了。

毛泽东转脸问杨大福：“你呢？”

杨大福说30多年了。

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石若仪听了，使劲儿地点头。

一天一夜之后，30日，轮船起航开进三峡。两岸悬崖壁立，奇峰连绵，山重水复。舟行江中，巫山十二峰历历在目，新滩、泄滩等处，更是江水湍急，漩涡相连。船过处，水声轰鸣不绝于耳。壮丽奇伟的景色，令游人心醉。

望着滔滔的江水，毛泽东的思绪飞出很远。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五千年历史进程的见证。毛泽东对长江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不但熟悉有关这条大江的各种历史掌故，更关怀这条长江已有的和未来的命运。在长江中搏击风浪，使他激情满怀。在江中游泳对他而言，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锻炼，这是他个性的展现，一如他年轻时独立寒秋，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天问”不是孔夫子“逝者如斯夫”式的书生吁叹，而是充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霸气和强烈的使命感。1956年6月，毛泽东曾由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汉口。那次游泳，一定让他心情极度愉快，因此才有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毛泽东乘坐轮船专门从水上视察了大桥的建设情况。在长江上建桥，是中国人多年的夙愿，公元35年宜昌下游曾建起长江上第一座浮桥。1912年，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曾提出要建武汉长江大桥，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现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将变通途，毛泽东兴奋之余，萌生出更大的愿望：截断巫山云雨，让高峡出平湖！

对三峡大坝建设的憧憬，正涌动在这位诗人的心中。而他，不仅是位诗人，更是一位舵手，他将引领这条大江乃至中国未来的命运。

吃过早饭，毛泽东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三峡风光。

他首先与船员们见了面，和船长李吉成、莫家瑞，舵工贺理富交谈，问他们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航段需要修整？能不能夜航？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面的情况？

船员们告诉他，近几年来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这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毛泽东问。

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连忙答道，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那人解释，过去试过，但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正说着，正面江心中突兀一块大石头，直冲而来。只见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开，那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毛泽东又望一眼已在身后的大石头。

船长说：“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

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不久前的南宁会议和前些天的成都会议,曾涉及到何时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时提起,是想看看船员们对此会怎么想。

“我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李吉成爽快地说。

说话间,只见奉节北岸有一座小山,古老的城垣和庙宇已经倒塌,但大概的面貌还依稀可见。石若仪走过去对毛泽东说,那是白帝城。

白帝城扼瞿塘峡西口的长江北岸,相传为公孙述所建。公孙述生在西汉末年,他割据四川,依托“殿前井中有白龙出”的传说,在公元25年自称白帝。三国时期,蜀主刘备举兵伐吴,兵败后也退守这里,便有了在此托孤于诸葛亮的故事。

毛泽东眺望这古迹名城,兴致勃勃地诵出他喜爱的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船过白帝城,毛泽东问起船员们的生活情况:工资多少?比过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休假?能不能经常回家?他的关怀,令船员们大为感动。

毛泽东看到年轻的舵工贺理富掌舵十分熟练,心里很喜欢,走过去问:“多大年纪了?”贺理富说18岁了。毛泽东说:“还年轻啦,要好好学习。”

他又转身对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李吉成回答:“我保证多带徒弟。”

毛泽东对驾驶技术也很感兴趣。他问驾驶部和轮机部有多少人?具体担负什么工作?他又向驾驶员们询问如何使用车钟,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他兴奋地说:

“假如我学习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一段航程。”

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让船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细致地对将要修建的坝址看了又看,沉默半天不言语,直到船驶出好远。

一路之上,从瞿塘峡到巫峰到西陵峡,毛泽东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

看了神女峰。

快过西陵峡，他回到舱内客厅。

客厅里，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又有了新的话题。其谈话内容，吴冷西在其《人民日报回忆录》中有不少记述：

毛泽东讲到了他在成都会议期间，收集唐、宋与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选了十几首印发到会的事。他特别称赞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对四川还备加赞赏，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多将帅是四川人。

毛泽东还谈到邹容，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毛泽东还谈到了《苏报》案。他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邹容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的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

毛泽东称赞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著称。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

索解尤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榧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毛泽东还说到了章士钊，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癖，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

毛泽东这一番对清末民初几位政论家的议论，使吴冷西等听了深受启发。

又过了两昼夜，航行结束了。江峡轮到达目的地——武汉。毛泽东离船登上码头，他对夹道送行的船员们说：“谢谢你们。”

由于江峡轮工作得出色，在以后它又两次担负相同的使命：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乘坐该轮从黄石到安庆视察。航程中，他在暴风骤雨、白浪滔天的时刻两度下水，搏浪长江。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第三次乘坐江峡轮从汉口到九江，然后上了庐山。



## 汉口会议

1958. 4. 1~4. 9

毛泽东离开成都后顺江而下过三峡，从重庆到武汉，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听取河南、山东、江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的规划以及安徽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各省在汇报中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互相攀比，不甘落后。

对此，毛泽东既兴奋又有些怀疑，比如，对安徽水利问题，他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

说毛泽东一味高喊跃进，人为推动浮夸，这并非事实。

他是个胸有蓝图志在千秋的人，也是个求实与务实的人。

不然，他何以成就中国革命？

时至今日，平心而论，毛泽东仍然是想做到踏实一点儿的。

成都会议上，在跃进的主旋律中，他虽然大力倡导跃进，但也提出不要空喊，不要虚报浮夸与虚名，提倡实报与实施具体措施。

此次在汉口，毛泽东又提出，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好大喜功需要，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带动其他工作的中心工作。

对河南的宏伟规划，毛泽东如此幽了它一默：各省不要跟河南争第一，实干就是了，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

以毛泽东的敏锐,他不会不觉察下面出现的虚与假,只是他坚持认为,这仅是十个指头中一个小指头的问题;只是更多的时候,深夜展读总随身携带的《离骚》,他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所淹没、所笼罩。

一个春天的傍晚，正在老通成餐馆吃饭的一家七口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围桌而坐，客人手指汤包、豆皮：“这是真正的湖北风味”

4月3日这个春天的傍晚，已经7点多钟了，街头的行人慢慢减少。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成餐馆的顾客也陆续走出了店堂，只剩下几张桌客人。

一张桌子旁，坐着3岁的王熙滨和他的四个哥哥姐姐，加上他的父母，一家7口人，是最后一批进店用餐的。他们一边吃着卤菜，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什么。

忽然，门外响起一阵汽车声，有人进来了。大家以为又是新来的顾客，也就不经意地望了几眼。

首先推门进来的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大家都有些眼熟，毕竟是本省的“父母官”，经常在集会与报纸上见到的。只见他进门后并不朝里走，却转身向后面做出表示请进的手势。紧接着是一位天庭很宽、身材魁伟高大、穿灰制服的人走了进来。熟悉的面孔、身材举止，是谁？大家几乎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毛主席！毛主席！”熙滨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拥而上。5岁的女孩熙江用手扯毛泽东的衣角，问道：“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同孩子们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脸上十分慈祥欣喜。

直到毛泽东朝桌边走来，熙滨的妈妈刘燕如仿佛才如梦初醒，迎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她和她在什么地方工作？又同他们扯了几句家常。然后环顾四周，朝其他的顾客们挥手致意。

前厅的响动，早已惊动了店里的经理和服务员，大家也都拥到餐厅里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正一条一条地看墙上贴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一边

看，还一边念出声，又问经理万书明：“这是你们写的吗？”万书明回答是的。毛泽东赞道：“好，好。”

他又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刨花板做的，很经济。”万书明说。

毛泽东朝厨房走去。厨房里的师傅们正在干活。头一个看到毛泽东的，是做汤包的钟生楚师傅。他刚刚把包子捏好，装上笼，准备去盖盖子，毛泽东就走到了他的面前。钟师傅一下子怔住了，他想说一句祝福之类的话，但说不出来。到底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这是什么包子？”钟师傅也忘了回答，直到毛泽东再次问：“这包子是谁做的？”，他才如梦初醒地说：“是汤包，是我做的。”

厨房里其他的人都笑了。毛泽东走到做三鲜豆皮的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师傅说：“我是做豆皮的。”豆皮是武汉十分出名的小吃。他心想，应该请毛主席吃点儿好的豆皮。于是，他又说：“我准备专门做点儿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吃。”

毛泽东亲切地看一眼曾师傅，说：“你太细心了。”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曾师傅说。

毛泽东朝前走到炉灶跟前，用手摸了一下灶面，然后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一看没有，便称道：“这个炉灶很干净呀！”随后，他又与做菜的李汉卿师傅和其他一些人谈了话，然后又沿锅灶边走到宿舍门口，看见宿舍收拾得挺干净整齐，毛泽东道：“很好！很好！”在餐馆看了一遍，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今天就在这里吃饭吧。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既高兴又紧张，师傅们都想让毛主席尝尝自己的手艺，又怕做不好。

把什么最拿手的菜送上去呢？当然是最好的。但由于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来，没有准备，加上店已到快打烊的时间，所存的原材料不多了。做菜的李汉卿感到有些遗憾，但此时也只好看有什么料就做什么菜了。当然，汤包与豆皮是少不了的。

饭菜上来了。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凑上前，看看，指着面前的碗碟，向外省同志介绍：“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

味。”一句话，把餐馆的师傅说得高兴，大家也都随意放松下来。

毛泽东用餐的时候，已经8点多钟了。刚才在餐厅吃饭的其他顾客也不忙着走，要多看看毛主席，有的人甚至把座位挪到最容易见到毛主席的角度。孩子们就更不管不顾了，东西也不吃了，睁着圆圆的眼睛只管盯着看。有个孩子胆子大，竟跑到毛泽东跟前去问好。毛泽东放下碗筷，摸摸他的脑袋，还用大手去握握他的小手。

一会儿，毛泽东又想起什么似的，停筷问道：“司机同志都吃饭没有？”

大家吃完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师傅们拥向前去同他握手告别，毛泽东没有忘记问上一句：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师傅们说：“我们是国营。”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道。

快走到门口了，毛泽东看见厨房里又陆续走出一些师傅，就转身再和大家一个一个握手告别，感谢他们的款待。

毛泽东走后的这天晚上，老通成的职工们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都争着谈自己的感受。

“毛主席真健康啊！”这是大家最常提起的话题。从来开会很少发言的王寿山师傅这次也开口道：“旧社会谁瞧得起我们这些大师傅，今天国家的领袖来看我们。”

做三鲜豆皮的大师傅曾延龄一谈到和毛泽东握手的事，就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手洗干净哩，毛主席就把手伸过来了。毛主席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当时就像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一样，一身都热火起来了。我就想：“毛主席呀，他老人家心里，真是不知道是怎样关心我们！”

这一年的9月12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老通成餐馆。刚刚游完长江，兴致很高。他是个记性很好的人，这次见到店堂的师傅便如熟人般打招呼：“又来麻烦你们了。”

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他在外面餐馆吃饭的时候极少。老通成是幸运的，竟然连续两次接待毛泽东，也许这里的美味使毛泽东不能忘怀？

这次的饭菜，除了豆皮，只有四个菜，一个汤。毛泽东向来不让太奢侈。

老师傅服务得十分尽心。他一直守候在桌边,想为毛泽东递换毛巾。天热汗多,送上的毛巾需要及时搓洗干净换上去,再用再洗。但毛泽东似乎不习惯这种服务。老师傅准备取毛巾时,被他拦下了。再次上前,又被谢绝。这位 13 岁进餐馆当学徒的老师傅,为此激动万分。事后,在他一再的请求下,经过省交际处的同意,他留下了毛泽东用过的毛巾做纪念。

饭快吃完了,桌上还剩了一些。已经放下筷子的毛泽东又举起筷子,要同桌的人把饭菜都打扫干净,全吃掉不浪费。他用手一指墙上“炮打保守;火烧浪费”的标语,说:“你们不吃完,就要火烧浪费!”

这次到老通成,毛泽东在前厅和全体服务人员合了影。

参观火宫殿，视察部队，毛泽东关心干部给不给战士盖被子。抬头一望故乡的艳阳天，只道：现在可以种苋菜喽

最令游子系念的莫过于故乡。老百姓讲叶落归根，有了一番作为的人则要衣锦还乡。尊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虽然时时被“万岁”的呼声包围，但没有人能比他自己心里更清楚，他也和常人一样，有着一份对故乡的深深眷念。

4月12日，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末，毛泽东从湖北南下到长沙。长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但即使短暂的停留，仍使他欣喜无比。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风味，还有那浓浓的故乡情，哪一点不令他陶醉？！

韶山离长沙还有一段路。这次的日程安排中仍然没有回韶山一项，毛泽东直到1959年6月才重返故里。是时间仓促，还是近乡情怯，或是毛泽东认为还不到时候？其实，只要毛泽东提出来，回故居一趟很容易。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只要他想做的事他总能办到。但这次毛泽东还是没有提出回韶山。不回韶山不等于他不想韶山，那个韶乐长鸣、凤凰起舞的美丽山冲，埋着他的祖辈，埋着他的父母。1927年他回韶山调查农运，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一次，他对乡亲们说：“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了！”如今，革命早已成功，离开韶山也已31年了，韶山依旧在梦中。

不过，回到长沙也就算回到了家乡。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第一师范学校、岳麓山与爱晚亭、清水塘……哪一处不是记忆犹新。

这几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长沙。或小住，或路过，有时一年数次。这其中，最令他开心的要数游湘江。“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自信，这种朝气今日犹存，不是已经有过证明了吗？

1956年游湘江，是在5月30日。一下飞机，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他



就直奔湘江而去。他要游过江到水陆洲那边去。水陆洲上住着几十户人家，《沁园春·长沙》里提到的橘子洲头，就是指的水陆洲。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多少次和伙伴们游江到过这里啊！

这一天，是个大晴天，但江水暴涨，波浪汹涌，一片黄澄澄的江水把岸边许多的树木都淹了。陪游的年轻人心里有些发怵，但毛泽东更加兴奋，他几乎是扑入江中的。一个小时之后，毛泽东靠向水陆洲。小岛把湍急的江流硬劈开来，狭窄的水面回转激荡，搅起滔天浪，咆哮之声不绝。毛泽东毫不在意，照准直游过去。眼看就要被卷进去，冲向一棵大树桩，警卫人员急得扑过来想挡，却只见毛泽东迅即抓住了那树桩，敏捷地一步登上岸。正在江边车水的农民抬头看见，愣了许久才醒悟过来，慌慌地返身回村报告这个意外的喜讯。这时毛泽东也披上了那件打着补丁的浴衣走过来。那一天，他在一位周姓农民家门前的长凳上一直坐到日落西山，他的湖南腔融在一片笑语中，不分彼此……

1957年那次游湘江是在中秋节的下午。这时的湘江和去年5月时正相反，由于干旱，江水大减，两岸河床都露出好几十米，淤泥有六七十厘米深。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毛泽东从江中游到岸边，穿过四五十米的泥泞路。卫士劝他不要过去，他却已迈开了步子。很难走，一只脚陷进泥里刚使劲儿拔出来，另一只脚就又陷进去了。卫士们过来帮忙，护着毛泽东拔两下，迈一步，一步步越过淤泥上了岸。这时，毛泽东已是满脚满腿的稀泥，浴衣上也拖上许多。卫士连忙到附近的井里打来水给他冲洗，而毛泽东不讲究，也等不及，马马虎虎地冲几下，沿小路朝一户农家而去。除了那件浴衣，毛泽东便和庄户人家没有一点儿区别。稚气的娃娃们好奇地瞪着这位双脚沾满泥的客人。这位客人好像和平时看见的伯伯爷爷不一样，他有那么多陪着的人，他们对他很是殷勤周到，但他又实在和大家没两样。毛泽东兴趣盎然地逗着娃娃们，户主则端来凳子，又取了自种的旱烟让毛主席尝，毛泽东则把自己的纸烟回敬户主。农家妇欣喜地洗碗倒茶送上来。茶是中午烧好的，已经凉了，面上还飘落着几根草屑。警卫人员想说什么，没张口，毛泽东已端起碗来一饮而尽，畅快地吐了口气……

回想到这两次游湘江的情景，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准备车！”下午，毛泽东吩咐卫士。今天在长沙，不是去湘江，要去的地方是两个：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一连和火宫殿。

对长沙的一草一木，毛泽东都烂熟于心。无论去哪儿，他都能反客为主，做个向导。没去火宫殿，他就先向别人介绍了：“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解放好些年了，他想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变化。

火宫殿的面貌基本没怎么变。拉水拉车的却不再是下等人，而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火宫殿也改成了饮食店，店铺狭窄简陋，往来顾客颇多。这一天的顾客是最幸运的，他们意外地见到了毛泽东。有个少年脚快嘴灵，飞跑出去报信，顿时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大家心情激动，毛泽东也激动，他感觉的是如鱼得水般的惬意，他的好心情使他满面红光。

去驻湘某部独立营一连，毛泽东没让事先通知部队。他由湖南有关负责人陪同到连里时，战士们有的在看报，有的在看书，有的打篮球，还有的在挖菜地。

先看到毛泽东的是连里的副连长。他的动作不慢，放下锄头，咋地一个军礼。毛泽东握住他沾了泥的手，他却扭过头去向后大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在一连“走马观花”。看到宿舍门口的一张小凳上放着一本《论列宁主义基础》，他就高兴地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课都讲些什么？有多少战士能自学马列的书？那个时候，战士入伍大都要进扫盲识字速成班，到连队再进业余文化夜校读两年，这样就能达到读书看报的水平了。

在一个班的宿舍，毛泽东走到床前，摸摸床垫子看有多厚，问战士铺得够不够。再拿起棉被，在手里掂几掂问有几斤重，问够不够暖和。看了班里的内务，又问一间屋里放 12 张床睡得挤不挤。战士们答说不挤，毛泽东点头，说：就是地湿了些。

三班的武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争过去了，自己也多少年没摸枪了，但对枪的感情依旧。战士们都争着把自己的枪递上去，请主席检查，那是多么大的光荣啊！毛泽东却走到枪架前，看了看，很内行地说，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边擦得干净不干净。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骑枪，拉开枪机检查一遍，又拿起一支冲锋枪。里边没有油泥和锈蚀，毛泽东这才说：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他还指示，军事训练要抓紧。要搞制式教练，要练好射击、刺杀和投弹的本领。

到院门口，毛泽东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转身问连里干部：“还有没有查哨查铺的制度？”

连干部们说，还查。

毛泽东却去问战士：“你们的连长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一个战士老实地回答说：“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干部表示，今后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办。此后，一连的干部一直坚持了查铺查哨、给战士盖被子掖蚊帐的制度。

临离开一连，毛泽东去看了连里的菜地。4月，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田里一片的葱绿令人欣喜。毛泽东抬头看看艳阳高照的天，又低头看看齐整的菜畦，以一个老农的口吻道：“现在可以种苋菜喽！长沙人不是有句话叫‘六月苋菜胜过鸡’吗？”

一句话，大家就都笑了。

故乡的这一天，好晴朗！只是明天又要离开了。

## 广州会议

1958. 4. 27~4. 29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机从长沙到达广州“小岛”。离广州会议的召开还有十余天的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个65岁的老人奔波数月，也需要休息了，然而为中国农民要翻身的渴望所感动的毛泽东却在2天后挥笔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他似乎相信，凭着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二年就改变了面貌的干劲和速度，中国赶上英国的发展水平不再需要用15年的时间了，尽管他提出“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提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这一天，毛泽东夜不能寐，情绪激奋地在这篇文章里欢呼“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接着，他向世人这样展示他眼里的中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广州会议连开三天，主要讨论的是工业问题。毛泽东往往是开完会

就下珠江游泳，有时会就在船上开，休息的时间也下水游一会儿。

一生为实现中国工农业生产跃进蓝图而斗争的毛泽东，当他 5 月 2 日从广州经武汉回到北京时，回荡在他胸中的一定是波涛般的激情！

糖厂要不要砍？答案是：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  
春色撩人之夜，毛泽东乐呵呵披衣散步，不料被堵回了屋

细雨霏霏，暮色渐渐四合。毛泽东的专机4月13日近18时到达广州“小岛”。

这是他近年来广州的主要落脚点。解放后他到广州的次数不少：1954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和修订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在广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写序言和按语。1956年5月，他在广州视察了一个月左右，询问渔民的生产，和造纸工人、铸铁工人攀谈，还经常去珠江的白鹅潭至石围塘一带江面畅游。这次他将主持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然后计划在月底返回北京。

冒雨在院子里漫步一圈，和接待人员以及先后到达这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还专门去看了与会同志的宿舍，毛泽东最后回到他住的4号楼。

房间宽敞，虽然并不奢华，但收拾得干净舒适。陪毛泽东一同进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及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卫生部副部长朱珏等人到此想告辞，要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不忙走嘛！”毛泽东不想送客，“再坐下谈谈！”说完，自己先落座。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的近况。

陶铸说起，广州有个糖厂，产量高，但怕销不掉那么多产品，打算砍掉。他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不表态，把脸转向朱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江

苏人，你谈谈，你们江苏人喜欢吃糖吗？”

朱珽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喜欢吃糖。江苏人吃糖，不仅偏爱甜食甜点心，尤其无锡、苏州一带，烧的菜里就没有一样不放点糖。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更讲究吃红糖补身子，亲戚朋友前来探望，糖也是传统的缺少不了的礼品。

“江苏有多少人？妇女人数能不能占到一半？其中育龄妇女约占多少？”毛泽东和在座的各位一五一十地算起来，结果是需要用糖的数字不小。

毛泽东感到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吸了口烟，挥挥手：“好了，你们的糖厂不要砍了，产品多，在广东销不掉，就送到江苏去销吧，江苏老百姓喜欢吃糖。”

顿了顿，他接着说：“少则就贵，多则就便宜。”他用手一指在座的人“像我们这些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想吃糖而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

4月16日晚，大家吃过晚饭后，都出来散步。春天了，鸟语花香，温暖惬意。随毛泽东来广州的随行人员李银桥、侯波、张仙朋、洪敏、朱珽等一起，说说笑笑，聚在江边聊得十分开心。

也许这春色太撩人心扉了，毛泽东也耐不住寂寞，难得离开了堆满文件的宽大写字台，出门散步。是这边的欢声笑语吸引着他吧？只见他一个人乐呵呵地披件衣服悠悠径直朝这里走过来。这时李银桥一回头看到另外邻近的一座桥上聚了不少的居民，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毛泽东，正指指点点，小声兴奋地议论着，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进去，眼见人越聚越多。

李银桥有点急了。且不说毛泽东当时在小岛事属机密，不宜对外公开，单就这人越聚越多，最后要疏散也不好办呀！

不能让主席露面！李银桥这样想着自己的职责，就赶紧和大家商量，用什么办法说些什么话可以去挡毛泽东的驾？

直接对他说因为那边桥上有老百姓在看是不行的。毛泽东不只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对卫士们说过：“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是对的，但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为什么你们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众，是不对的。”话说得很严肃，也十分在理，共产党人，哪有躲着老百姓走的？但



保守国家机密,维持秩序,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的确是卫士们的头等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怎么办?议论一阵,大家觉得还是得请主席回房。主意一定,办法也就有了。

由大家推举的朱璉和张仙朋身负使命,迎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搭话。然后他们找了个话头,说江边晚上的风冷,请主席回去加件衣服。

毛泽东爽快地随张仙朋回去了,看起来挺难办的事情谁知那么简单就办成了。只是不知他真的感到江风的凉意,还是他心中有数地默默配合了卫士们的工作?

卫士张仙朋粗手大脚挑灯缝衣，因  
为毛泽东早就有言在先：能补的都  
应该补补穿，可以省点给老百姓穿

天黑了，院里的灯亮了。朱璉和洪敏医生正在散步。这是4月18日的晚饭后。

不远处，有一间房子的窗户上映出正在忙活的人影。朱璉和洪敏医生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平日就和小张挺熟，这会儿两人想去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推开门，跨进屋，只见张仙朋正在缝衣服。难为小伙子，粗手大脚的，针线缝得正一段歪一段。

张仙朋见到两人，很热情地让座倒茶。

“这样宽大的衣服是你穿的呀？”洪敏扯起正缝着的衣裳看。

“是主席的。”小张说。

主席的？朱璉和洪敏先是感到意外，随后也就释然了。不少接触毛泽东，又和他的卫士们熟的，时常能听到毛泽东生活如何简单朴素的事。

正在补的衣服有一套内衣裤，还有一套棉毛衫裤。朱璉和洪敏坐下来，一边帮张仙朋补，一边教他怎样用织补的方法补棉毛衫。

三个人一起动手，衣服补得很快，话题也不离毛泽东。

朱璉说：看起来，我们主席穿补丁的衣服是一贯的了？

张仙朋说：可不是。

朱璉回忆道：“我在延安时常常看到主席穿补过的衣服，特别在右臂从肘关节部到前臂这一段衣袖的后侧，冬夏都有补着的，这一定是写作太辛劳的关系。1940年年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主席亲自来给我们讲新民主主义论，就看到主席棉衣上的这一段，还不止补着一层哩。曾经听杨家岭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同志说，每次要给主席做衣服，主席总是不要。主席说：‘不好省点给战士穿嘛，省点给老百姓穿嘛。’”

“是呀！”张仙朋附和。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卫士，他接触的这样的事太

多了：“我们有时请主席同意买点新布请个裁缝给他做身新衣服，说现在在城市，与过去不同了。你们知道主席怎么说？主席说：‘有什么不同呀，稍微做点衣服出外穿穿就是了。可是在家里穿的和里边衬的衣服，穿破了，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一件衣服本来只可以穿一二年的，破了随时补上，就可以穿五六年了。如果我们国家机关人员，每人节省一寸布，老百姓就可以多穿一点儿。’”

朱琏等听了，都感慨得很。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话，你完全可以说，这和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的唠叨有什么两样？的确，这话太实在了。可从至高无上的领袖嘴里说出来，表现的又是怎样的不平凡？

你可以说，毛泽东农民的生活习惯未改；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另外一条思路：经济发展了，大家就都有的穿，而不用谁去省给谁。

但你能否认普通老百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他们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吗？

两位医生和小张加紧了手里的针线活。他们偶尔抬头的时候，都会看见亮着灯的另一间屋。里边，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

毛泽东对西医治感冒不屑一顾，而惊叹针灸大有名堂！既然政治能除“四害”，外行便也能领导内行。他打算动手拨一拨卫生部这个“算盘珠”

1958年4月19日下午4点多钟，卫生部副部长朱珽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和洪敏医生一起去见毛泽东。

自从1953年到中央卫生部工作以后，朱珽不止一次见到过毛泽东。因为专业工作的缘故，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也颇了解。对今天突然要她去见主席，并不感到奇怪。主席平日工作很忙，有时人闲下来了脑子闲不下来，想到些问题就非得找人谈谈不可。这似乎也是一种休息的方法，聊天，既能获得新的信息，又能放松神经。

今天要谈的当然是卫生工作。朱珽猜测，也许还是针灸方面的事。

整整三年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和她的谈话，现在又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55年，也是春暖花开的4月。朱珽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住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关负责人就来通知她和洪敏去见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时间里，朱珽听这位同志讲到了毛泽东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段指示。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朱珺听了，印象很深刻。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是明确肯定了中医的地位和发展前途；二是婉转对卫生部的中医工作提出了批评；三是把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提到了一个高度，挺严重的一个高度。

15日晚上，朱珺被邀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饭。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席，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但因为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之中，毛泽东也很快了解了各个同志的籍贯、姓名及职务。

在跟朱珺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珺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珺的看法，朱珺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珺和洪敏大夫。

大家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

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

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 10 分钟，第二天散步 15 分钟，第三天散步 20 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 25 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做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外国人是没有什么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在毛泽东看来，最讨厌的事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边上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 支至 15 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这时，已经晚上近 10 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请了几次，他才动身。

1955 年那一次在杭州，毛泽东是在 4 月 19 日晚上回北京的。朱珽回来后，把与主席接触的这一切都记在了日记本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卫生部的工作很快有了改进。1955 年 12 月，他们就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的离职学习班共 6 个班 300 余人，培植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方面的骨干，使他们不仅能一般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而且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

到 1958 年 4 月，中医研究院创办的一个班已临近毕业。

对这一切，毛泽东都很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去，主席也会问到这些

情况的吧？朱珽一面和洪敏朝毛泽东在“小岛”下榻的4号楼走去，一面心里回顾着，想着。

4号楼带着一个宽敞整洁的院子。差10分5点，朱珽她们到时，毛泽东已经等在那里，正和夫人江青在聊着什么，看见她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

握住朱珽的手，毛泽东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

朱珽回答说：“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心里想，主席今天的话题看起来的确离不开中医问题了。

果然，毛泽东不谈别的，只是关心办针灸学院的事：“不是还有一个中医研究院吗？”

朱珽介绍道，针灸研究所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一个直属单位，她又顺便介绍了研究院其他几个直属单位的情况。

毛泽东用手指记着数，对中医研究的组织编制很关心，特别问起了中医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听说在这个班学习的60名学员都是从高等医校毕业的西医，眼下临床实习还没结束，毛泽东说：“这个班有60名西医专门学习中医，好呀，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诚心诚意地学呢？”

朱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也并不等她的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发表对中西医的看法：“我看，西医治感冒就很少办法，中医治感冒有时只要一服药就治好了。替我治感冒的中医就是用一副药。”他举出自己身边的例子，“此人姓刘名惠民，山东卫生厅副厅长也。我要他留一个药方，感冒时就用，昨天下午我吃了一，晚上又吃了一，熬一副汤药分两次服，出了点汗，今天感冒就好了。”他把脸转向江青，微微地点着头，又回头问朱珽、洪敏：“你们知不知道中医治感冒的药？”

朱珽随口举出一副，并说刘惠民中医治感冒的那副药的方子，自己已抄录了一份。

“咳，西医治感冒，只会用些阿斯匹林、抗生素之类。”毛泽东说，“抗生素，我知道它是抗生物的作用。人亦是生物，光靠抗生素，把生命也抗死了，应该叫抗菌素。”

他接着解释说：“我说的抗菌素，是针对着抗危害生命的细菌——当



然，有些抗菌的药也许并不能直接杀死细菌，你说是不是？”

他用眼光征询周围人的意见，然后说：“抗生素这个名称有些不通，但抗生素这个名称现在已经用惯了，也不必修改它。我是说光靠抗生素，就可以不死人啦？”

毛泽东的情绪激昂起来，思路也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卫生部不懂卫生，农村部不懂农村，你们知道吗？现在当然改了，尤其农村部改了。

院外，有不少人正忙着打扫卫生除“四害”，一个个干得很带劲儿，真可谓人人动手。

毛泽东的眼光从院外收回来，重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卫生部不懂卫生，你说是不是不相信政治能除四害？自己以为内行是不行的，还要外行监督。做医生工作的，对于演戏的艺术总是外行吧。演京戏的艺术家梅兰芳是内行，但这个戏到底演得好不好，还要观众来评。有人以为这个戏好演出，或又以为那个戏不好演出，到底好与不好，拿上台去让观众来评，不就可以解决了嘛！

暮色苍茫，凉风习习，正是广州最好的季节，随处可闻隐隐的花香，偶尔还有动听的鸟鸣。

毛泽东的话题转向“老大哥”：“苏联派过三位医学专家来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回去开展工作了吧？学习的人太少，会忙不过来吧？”

朱璉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专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展针灸治疗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汇报。并说，这些专家学了针灸回去后还开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苏联保健部也准备在莫斯科开办有各加盟共和国医生参加的学习班。

毛泽东点头：“苏联会开展得快的。在苏联大规模开展这个工作，很好。不过，她们学习的时间太短，我们也要给予帮助。”

他又关心地问：她们要办全苏性的针灸训练班，没有邀请我们帮助吗？这个教员还不容易请喽，卫生部有什么办法吗？

朱璉告诉主席，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今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协定》上也有苏联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苏联的一条，卫生部准备帮助，至于怎么个办法，最近我不在部里，不太清楚。

“那么，苏联专家来北京学三个月针灸就能使用，是怎样学法的？”毛

泽东又问，“她们回去治好一些病没有？现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朱琏说，主要是教授她们针灸学的历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并通过临床实习有重点地让她们学会了35种病的治疗方法。她们回去后，对三叉神经痛之类的病治疗效果不错。至于研究，有中国同志参观了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那里的针灸实验室装备了新式仪器正在进行对针灸的研究。

“研究针灸的新式仪器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身子向前探了探，语气很关切。

“如三管示波器，”朱琏回答说，“在为病人针灸治疗之前及治疗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到针灸对病人中枢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如‘维修克’，又叫多管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观察到中枢神经、呼吸、体温、出汗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仪器在使用时都能同时自动描记。”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罢，他沉吟片刻，又道：“针灸是可以治疟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们告诉了苏联医生没有？他们相信不相信？”

朱琏说，针灸可以治疟疾，苏联医生相信，但针灸可治痢疾，他们还怀疑。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治疟疾，不相信治痢疾呢？”毛泽东追问。

“治痢疾，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材料，但不系统。至于治疟疾，1954年针灸所派过一个疟疾研究组到江西钨矿为工人治疟疾，同时有计划地结合治疗做了研究，资料比较系统，而且苏联专家在北京也曾亲眼看到针灸治好过疟疾。”朱琏回答说。

毛泽东对朱琏讲到的工人患疟疾的情况很注意，一再问到具体的情形和治疗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说：“你们研究治疟疾的根本道理没有？据我看来，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这类问题，根本道理都是一样，你看如何？”

朱琏点头，说根据针灸治疗疟疾症状消失的经过和疟原虫变化的科学分析资料，针灸治愈疟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说的。

毛泽东笑了：“那么，我也是内行了。”他又要朱琏讲一讲除疟疾和痢

疾之外，针灸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琏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等。

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打断朱琏的话头，问：“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朱琏介绍道，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则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朱琏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点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1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接着，他又提出问题：“现在针灸在各省市开展得怎么样？开办过训练班没有？针灸医生在全国有没有1万人？西医学了中医的大概有多少？”

朱琏她们回答说，各省市的情况卫生部可能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西医学了针灸的已有2500人以上，针灸所在过去几年中已办过20多期的针灸训练班，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回去后相继开办训练班，我们也曾派出针灸医疗队到内蒙古、西康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边为农民治病，一边为当地医生传授针灸术，也为工厂和农村开办过针灸训练班。现在全国27个省市大都有针灸工作，但一般来说，针灸在农村还不算普及。

毛泽东说：“这些工作做得都很好，还需要继续做。”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

朱琏说过去在农村中用针灸治过肿瘤，并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

妇女，她当时患的是腋下肿瘤，诊断为淋巴肉芽肿。

于是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这位妇女的年龄、针灸治疗和症状消失的情况以及现在的情况，又问起癌瘤的区别和种类。朱琏、洪敏一一回答。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兴奋地连声说：“有名堂，有名堂，针灸也许可以治疗癌病！”

这时，边上有人说，可以把用中西药之后无效的癌病人集中一些用针灸试治。

毛泽东赞同道，可以这样试的，治不好，反正别的方法也治不好。他又问道：“子宫癌，恐怕针灸达不到吧？”

大家解释说，针灸治病并不需要病在哪里就针在哪里。

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地说：“针灸大有名堂！”他不由感叹，“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天渐黑了，风也更凉。有卫士走过来劝说主席进屋去，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说。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的谈兴还很高，他还有问题要问，那就是卫生部的工作怎么样。

朱琏说：“在中医工作方面，过去是定盘珠，现在基本不同了，是算盘珠了。”

朱琏的话说得有趣，毛泽东好奇了：“什么叫定盘珠、算盘珠？”

朱琏说，定盘珠是一拨也不动，算盘珠是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卫生部的工作很繁重，但有些工作显得被动。”

毛泽东笑了，他用右手比画着拨算盘的样子，说：“对啦，卫生部工作有些被动，他们连除‘四害’也信心不足，不知道政治可以除‘四害’。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很好，我们大家都来拨。”

话题又转回到外行与内行上来，毛泽东说：“事情要大家来办，外行监督内行，内行就可以更加内行。梅兰芳演京戏是内行，他不会看病，在医生这一行上，他是外行，但他有了病，就是医生的病人了。医生治病是内行，在戏曲艺术这一行上是外行，但医生看戏时是观众。戏演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讲，医生看病好坏，得由病人来评。当然，医生也可以懂其他不少事情的喽！”他问朱琏：“你会写小说吗？”问完，他自答：“你也会写的喽。你认识黄树则吗？他是个医生，他也会写小说。”

顿了顿，毛泽东颇有感触地又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同样是重工业，做冶炼金属工作的，对于有色金属也是外行。现在化学原料就有1万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他把脸转向朱琏等人，“所以卫生部应该相信政治能除‘四害’。”

天转阴了，一股风穿过院子，凉凉的。怕是要下雨了吧？南方的雨很多的。大家再次让毛泽东进屋休息，说主席的感冒刚好，可别再着凉了。

毛泽东站起来，仰头看看天，穿上制服外套，迈开步子，不是朝屋里而是向着院外走去，他对大家说：“哪里有那么要紧？我们去散散步吧！身体是要锻炼的。”

等朱琏她们赶上他，他又打开了话匣子：“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卫生技术也不是不要，但前提要弄清楚。”

毛泽东的步子迈得很大，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回荡在小岛的夜色中。

毛泽东说了就要办的。1958年10月11日，他在对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中，就要求中央为此发一个指示，把卫生部的报告转发各地党委，加以研究，遵照办理，并特别指出，以两年为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通过各地的学习班培养出大约2000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要在卫生部的背上再推上一掌。

六级干部在一起，毛泽东刨根问底  
问什么？村头地边，系上竹编遮阳  
帽：“我也像个农民了”

广州会议已经结束。4月30日，是毛泽东在广州的最后一天。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他刚刚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过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色黑红。下午3点多钟，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早聚集了扶老携幼的村民们。

3点45分，只听有人喊“来了”。果然绿树成荫的路上，由西而东驶来3辆小轿车。

毛泽东坐在第二辆上，白衬衫，灰色长裤，下车时，人未见，脚上的浅口黑布鞋先伸了出来。毛泽东平日最常穿最合脚的是两双鞋，一双是今天穿的布鞋，还有一双就是已经很旧的棕色皮鞋。不论去哪儿，他都是这两双鞋轮流穿。卫士们好几次要他穿新鞋，都被谢绝，说多了，便要发脾气。

村民们看在眼里，备感毛泽东的随和亲切。中共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长朱光，刚要把社干部介绍给他认识，欣喜的上百位农民呼啦一下就围拢了上来。村干部们快把嘴说破了，才使人群闪出一条小道。于是，毛泽东等人在前，大家四周簇拥着，往村里走去。

社主任钟叙本毕恭毕敬地把毛泽东请进社办公室，室内长方形的桌边早已坐满了人。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毛泽东落座，逐一问完农业社干部的名字、年纪，开始转入农业生产情况。

“今年比去年好得多了。”钟叙本答道。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社员自养的多少？”



“300多头。”

毛泽东点头：“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不失时机地向大家做起宣传鼓动工作：“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年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上一句：“你们合作社散伙吗？”

“散不了，铁桶江山！”社支部书记梁富利落落地表示决心，很坚决的样子。

“散不了，为什么？”毛泽东似乎并不满足，要刨根问底。

钟叙本连忙接过话头：“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一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毛泽东问。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毛泽东慢慢说道，脸上有了满意的表情。

陶铸问钟叙本：“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提高声音说道：“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句看来颇为公式化的回答，在当时却是人们真诚的信仰。大家笑了，毛泽东也很开心。他勉励社干部们有事要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

桌子另一边有几位干部一直没吭声，毛泽东注意到，指着他们问朱光：“这几位同志是谁呀？”朱光连忙做了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会书记、乡基层党委书记们。

陶铸打趣道：“现在是四级干部在一起。”

“哪里是四级？”毛泽东转过头，对陶铸说，“连你，我，我们是六级干部在一起了！”

休息过后，毛泽东去看村庄西北面的干部试验田。聚在办公室门口的人群也尾随而去，尽管有人挡着，劝阻着，还是有人不顾一切地把手伸给毛泽东，希望能握上一握。

试验田离村尾那棵大榕树不远。

“这禾长得不坏！”毛泽东细细地看了路边的田，赞道。

陶铸问社干部：“一造能打多少？”

“大约700斤吧！”社干部答。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毛泽东问。

社干部说：“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田埂而行。此时的广州，已是火一般炎热了。基层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

这是南方经常使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来，端详片刻，戴上，很细心地系上系带，眼睛四周望一圈，说：“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走着走着，他在一块菜地边站住脚：“这是什么？”

边上的人连忙下田指着一种菜说这是藿香，又指指周围，说那是黄瓜、豆角、生姜，一块田同时种了四种作物。

毛泽东点头同意：“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说着看着，到了干部试验田边。社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 1600 斤。毛泽东问：“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这时，忽听人群一阵骚动。一位妇女满头大汗拨开人使劲儿地往前挤。别人问她干什么，她不理，只管往前。挤到毛泽东身后，她站住了，竟将手里的一柄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的头上，挡一挡炙人的太阳。毛泽东发觉了，转头向她道谢，那妇女只是笑，并不开口。

就在他回头的时候，他发现小渠那边的田埂上站满了 20 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齐齐地盯住他，却不靠前也不挨近过来。

毛泽东乐了，鼓励般地迎上前去。终于有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大胆地跳过渠，把自己的手伸给毛泽东。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毛泽东看得出，这些不是本村的孩子。

任溥华告诉他，他们是广州市第三十中学的学生，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

毛泽东显然很高兴：“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任溥华尽量用普通话做了回答。毛泽东连连点头：“你们都懂得一点儿，可以讲一些了。”他又一指这些学生，问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社干部答道：“社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毛泽东说话的时间，隔着小渠的那些孩子还是很拘谨，不开口，只用眼睛使劲儿盯着他。但当毛泽东转身往村里走去的那一刻，孩子们中却响起了清脆而又有节奏的欢呼声。毛泽东回头，他的脸上分明一派灿烂的笑容。

太阳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一个小时的视察，准备离开。四面八方的人流也顺着一个方向移动着，而毛泽东，他几乎握尽了由农民那里伸来的每一只手。

离开棠下社，毛泽东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的耕耘、水利、水产和土壤肥料四个馆。在水产馆，他指示说，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

随后，毛泽东一行连夜乘机返回北京。

##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958. 5. 5~5. 23

北京，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持续半个多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分析，认定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四次讲话，特别强调要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插无产阶级的红旗，要求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不要怕教授，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

喜爱诗人屈原的毛泽东的这段“天问”，同样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哲学意义，他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我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下。我说，不，我们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也住在天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来人，他们不把我们当成神仙吗？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把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然后，大气魄的毛泽东盛赞小小的细菌：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80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如此宏论，毛泽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青年人要战胜老年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他对《法门寺》中不敢坐却还对人说“站惯了”的贾桂的奴性充满厌恶，他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打倒贾桂！

八大二次会议还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的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它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此时，“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已最后确定，随之，“大跃进”形势由春入夏，急剧升温：

6月22日，毛泽东在批阅一个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的报告时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最高记录。此后，各地报刊争相报道粮食高产“卫星”。同时，批判“条件论”，宣传“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社论连篇累牍见报。

7月，《红旗》杂志第4期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其中透露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

盛夏的8月，毛泽东头戴一顶普通的草帽，往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而去。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又给已经灼热的农村投下了一把办大社的燎原之火。

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便率与会全体人员坐大轿车往十三陵劳动。上万民工的眼睛只注视他手中的一把锹起起落落

5月25日，是个星期日。这一天，是北京少有的一个大热天，烈日高照，没有一丝微风。北京的春天实在去得匆忙。

下午1点多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都要去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

一些主要的领导人陆续到中南海怀仁堂前集合。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副劳动者的装束，头戴草帽，身着布衣，脚蹬圆口布鞋。大家依次上了停着的几辆大轿车。

开车时间快到了，毛泽东突然走上一辆轿车的后门。这时人虽没坐满，但座位却只剩下车后部的几个了。车上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争着要给毛泽东让座。

“有了位子总要有人坐的嘛！”毛泽东向大家挥手示意，自己却径自在车后面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下午1点40分，5辆大轿车开向十三陵水库。

毛泽东也是一身布衣布鞋的装束。一路之上，他观赏着沿途的景致，谈笑风生。

车窗外，掠过滚滚的麦浪，掠过一片片棉花地、玉米地、豌豆地。

“看来有点旱意了！”毛泽东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说。

刘仁点头：“是有点旱。”

“有没有水浇田？”毛泽东问。

刘仁指着窗外大路两旁告诉毛泽东：“路西有水源，修了引水渠，所以农作物长得好一些，路东水源缺，农作物就长得差一些。”刘仁又说，十三陵水库修成后能灌溉30万亩农田。

毛泽东频频点头。

3点20分,汽车开进工地总指挥部门前的广场。只见工地上人山人海,挑土夯地干得十分紧张。毛泽东下车,环顾四周,指着一片片新屋和帐篷问道:“那是什么人住的?”

刘仁说,那就是水库建设者们的住处。

“毛主席来了!”不知是谁第一个把自己的发现喊了出来,顿时,人潮涌,掌声四起。

毛泽东走进劳动者中间。人群中有许多参加建设的部队战士。他走到河北省驻军某团参谋严式忠的面前时,拍着肩膀问小严叫什么名字?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还和小严紧紧地握了握手。部队纪律严明,所以大家虽很激动,但秩序不乱。

毛泽东先登上水库东墩台观看水库的全景。一条大坝已高高隆起。水库工地政委赵凡介绍说,这条坝高29米,现在已筑到23米。

“是不是能保证在洪水到来以前修成?”毛泽东很关切。

赵凡很有把握:“一定能如期完工。”

“有多少人在工作?”毛泽东又问。

“有10万人,每天运5万方土到大坝上。”

下了东墩台,毛泽东等走进工程指挥部。这是一座普通的木板工棚,初夏时节,天气燥热,加上低矮的屋里屋外挤了很多的人,更是闷热异常。毛泽东头上冒着汗,白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他坐在一张木板钉成的凳子上,听工程指挥部负责人汇报十三陵水库工程的进展情况,看水库模型沙盘。

“大坝在什么位置?”毛泽东注视着沙盘。

水库总指挥指点道:“就在这后山坡下面,离这儿很近。”

“大坝到20米没有?”周恩来也关心到工程进度。

水库总指挥汇报道:“近来水库工程进展很快,前几天每天上坝3万方,接着提高到4万方,昨天突破了5万方,坝身最高处已经超过了20米。”

“坝长得真快呀!”毛泽东点头称赞。

朱德问:“坝要多高才能挡住洪水?”

杨成武回答说,20米就可以了。

毛泽东问:“水库蓄水后,会不会淹掉村庄呢?”

“会淹掉一部分村庄。”杨成武答道,“但是这些村庄已经做好了安排。”

毛泽东满意地说:“很好。”

这时,挤来的人越来越多,屋前屋后都是情绪激昂的工地建设者们。一个结着两根长辫的姑娘走进来,递给毛泽东一块面巾擦汗。

“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注视着她。

“我叫王惠兰。”那姑娘回答。

“你是不是‘九兰组’的?”毛泽东问。“九兰组”是活跃在工地的一支铁姑娘队。九个姑娘名字里都有一个“兰”字。

“不是,我不是‘九兰组’的。”王惠兰说。

“你去就是十兰子了!”毛泽东笑着说。接着,他赞扬年轻一代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鼓励王惠兰多参加劳动锻炼,说:“工地上要多出现一些‘九兰组’就好。”

不一会儿,有人拿来纸笔墨砚。工地指挥部负责人说,想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为工地题词。

毛泽东欣然答应,他坐到桌前,拿起笔,问大家:“题什么词呢?”

在一旁的杨成武道,就请主席为十三陵水库题词吧。

毛泽东饱蘸浓墨,挥笔一连写下五六幅,然后从中挑了一幅。“十三陵水库”这5个字,确实写得十分苍劲有力。

刘少奇的题词是:“劳动万岁!”周恩来题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则写下:“移山造海众志成城”8个字。

题词之后,毛泽东一行人就开始义务劳动。刘少奇先同民工们一起平土,后来又与他们一起唱着劳动号子打夯。周恩来站在排成长列的民工队里往大坝上传土,后来又去挑土。朱德、邓小平也和大家一道,又往大坝上挑土,又在大坝上平地。其他人,董必武、彭德怀、贺龙、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还有3位老人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都或挑或铲,干得汗流浹背。

毛泽东和彭真在一起,手执铁锹铲土。锹是毛泽东从站在身边的指



挥连战士余秉森手中接过来的。他的动作很熟练，他的一举一动也最引人注目。成千上万的民工，向这里围拢，注视着毛泽东一锹一锹地铲起土，装进战士们的柳条筐里。

运土的战士考虑到不能让毛泽东累着，常常不等筐满，就挑土走了。毛泽东发现，说，不要把我同群众分开，不然，这样干会影响建设速度的。他的汗湿了衣衫，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没有停锹，还告诉大家，劳动能改造思想，劳动能锻炼人哩。

毛泽东的这次劳动，多少带点象征性。年岁大了，能干多少体力活呢？

但他的确崇尚劳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就都身体力行地参加“大生产运动”，种地，纺线。这有解决经济困难的因素在里边，也有政治的意义在其中。

就在这次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说：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主要是锻炼思想意识，也可锻炼身体，增长知识。

革命胜利了，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搞经济建设了，干部们也不再需要通过体力劳动来获得生活的保障，于是，干部参加劳动便成为改造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在毛泽东那里，更成为使干部不浮在上面，不做官当老爷，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途径。他要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很高。1963年杭州会议上，他如此说：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

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毛泽东坚信这一点，不止一次强调这一点。65岁的这位老人，今天率众上十三陵，并不一定能给水库建设增多少砖，添多少瓦，但他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把干部参加劳动推前一步。他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号召力。

毛泽东是在震山撼岳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开始劳动，又结束

劳动的。他刚一放下手中的铁锹，一个叫余秉森的人就用自己的雨衣把它包了起来，他说：“看到这把铁锹，就像看到了毛主席，浑身就会有使不完的劲儿。”后来他又请人在铁锹的木柄上刻了“这是毛主席用过的铁锹”几个字。以后这把铁锹被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那个时候，这是一种无比的荣耀。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工地劳动了一个小时。傍晚，6点40分，他们一行离开工地。夕阳西下，几辆大轿车远去，而工地却仍在沸腾中。

隐秀桥西，一个不眠的夜晚迎来一  
个旭日临窗的黎明。微风拂煦中  
遥望南天，挥就一首不寻常的诗

在杭州丁家山前隐秀桥西，有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的刘庄。其实，刘庄是俗称，它又叫水竹居，原是晚清刘学询的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十分幽静，园内迎宾馆、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多楼台水榭更是古朴雅致。1954年，经过精心设计改建后，成为毛泽东在杭州疗养休息的一个好去处。

6月30日的夜晚，刘庄园内亮着一盏不灭的灯。明天就是建党37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不仅有许多公文要处理，更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等待他主持。

当班卫士封耀松匆匆走进来。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刚刚去看望过自己的父母。这会儿接了班，心想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劝主席睡上一觉。

毛泽东正坐在一张藤椅上，手执一张报纸，看得入神，好像没有发现小封已经进来。

“主席，我回来了！”封耀松说。

“唔。”毛泽东没有抬头，应完一声，又加上一句：“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封耀松刚要再说些什么，发现毛泽东只抬头瞟了自己一眼就又低头凝神在那张报纸上了，嘴里还念念有词的。

报上发表什么社论了吧？封耀松这样想着，走过去瞄了一眼。报纸是当天的《人民日报》，但那上面却既没有社论，也没有大块头文章，好像全是一些“豆腐块”。主席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呢？他的两只手扯着整张报纸，目光却始终停留在一个地方，脸上显现着兴奋的神情。

封耀松又凑近些，这回看清了，是一篇通讯，题目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血吸虫病，那可真是说来话长。它广泛流行于水域广阔的南方各省，病人到了晚期，往往面黄肌瘦，腹部严重积水，轻者致残，重者死亡。流行

起来,许多村庄甚至良田荒芜,人烟稀少,是旧中国难以根治的一大灾害。

新中国建国后,政府曾派出不少医护人员到疫区调查、治疗,但未能根治。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身为国家主席,岂能坐视人民的痛苦不管?第二年,毛泽东又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柯庆施担任组长,以期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各疫区所在的省、地、县各级也普遍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1957年4月,国务院专门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份收获今天首先在重点疫区江西省余江县到来了。这个县过去因为血吸虫病流行竟有20多个村庄被毁,14000多亩良田变成荒野。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余江县委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防治工作计划。有人对此将信将疑,而两年之后,目标却实现了。

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报道:“江西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

放下报纸,毛泽东起身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踱回椅子边坐下去,再度拿起报纸看。很快又站起走到床前,躺下去,靠着枕头。由于激动,他的胸脯起伏不停。

封耀松走过来,抱床被子将他身后的靠枕垫高些,让他躺得更舒服。

“你把笔和纸拿来。”毛泽东又把报纸拿起来,同时头也不抬地吩咐道。

封耀松拿来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毛泽东将报纸折两折,垫在白纸下,便自顾自哼哼两句什么,又落笔写上几个字,又哼哼,又写,有时又涂掉几个字。

主席在做什么?封耀松有些不明白。莫非在作诗?

毛泽东还在哼了写,写了哼,哼的语调也有轻有重,合着节拍,声音也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含糊。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封耀松终于听清这样两句。

八成是在作诗了。

趁着停顿的时候,封耀松插空说道:“主席,你哼哼啥呀?天都快亮

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劝毛泽东休息,不是容易的事,但还是要劝。东方已经快要泛鱼肚白了,不睡一会儿怎么行?

“睡不着呀!”也许诗已成,毛泽东撒开稿纸,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啊!”

说完,他又拿起那张诗稿,又去改改写写。好久,他开口道:“小封呢,你看这句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拍着腿,有腔有调地又念了几句,什么“红雨随心”、“青山着意”。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虽然使封耀松没能听懂所有的句子,但封耀松还是由衷地赞道:“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望住他:“什么地方好?”

封耀松吭吭吃吃说不出来,只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小封有点儿不好意思:“那……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毛泽东笑了:“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他更加激动地说,“太好了!”

封耀松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下地,很舒展地活动了几下身体,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嘴里说:“天亮了么?哦,天亮了!”

天真的已经大亮了!7月1日的黎明,朝霞涌动在东方,火一般红。

毛泽东一点儿没有倦意。他又抓起毛笔,浓墨饱蘸,龙飞凤舞般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几个字。沉吟片刻,又加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全诗抄完,又修改一番,对封耀松说:“去把秘书叫来!”

秘书来了,毛泽东让他把诗稿拿去誊清,自己又拿起6月30日这张《人民日报》。

秘书不一会儿抄完,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提笔落了时间:1958年7月1日。

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常的早晨啊!毛泽东在激情中挥就出一首不寻常

的诗：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是毛泽东始终放在心上的大事。9月21日，他去杭州路过上海，晚饭时特意听取了这方面的工作汇报。末了，他郑重地说：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非常大，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病，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

毛泽东的心愿没有落空。短短几年的奋斗，终于使血吸虫病得到控制，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新中国创造的一个奇迹。

听了徐水县关于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汇报，毛泽东屈指一算：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最后还是他出了主意——社员一天吃五顿。只是粮食真有这么多吗

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一列专车驶进河北徐水县。毛泽东开始了他对华北农村的一次大巡视。

早已迎候着的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上列车迎接。

毛泽东脸色红润，精力十分充沛，灰色长裤，白色衬衫，朴素又随意。他一一询问了来者的姓名职务，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徐水县，向张国忠了解徐水土地、人口、劳力、夏季生产、秋季生产的大致情形。

徐水县在去年冬天以前，平常得很。“大跃进”开始后却不同凡响起来。“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便是他们的口号，也便有了“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便有了今年粮食亩产2000斤、人均4000斤的目标。

座谈片刻，毛泽东在陪同人员的簇拥下换乘汽车，经县城往南犁园乡大寺各庄村农业社。一路之上，毛泽东看到庄稼问收成，看到炼钢炉问产量，还不断掰着手指和张国忠一起算账。

“一炉能出多少斤？”毛泽东问的是土法炼钢的小高炉。

张国忠说：“一炉只出200斤。”

毛泽东道：“一炉200斤，10炉就是2000斤。”他心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做一道数学题。

说话间，车过小寺各庄的“小农场”与“试验田”，毛泽东看了不断点头，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得不错。

车开进大寺各庄，停在农业合作社俱乐部门前。毛泽东走进门，从这



面墙走到那面墙，看着几面光彩夺目的奖旗，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然后才坐在一张长桌旁，接过妇联主任和团支书递上来的茶水，欠身道谢。

这时，南梨园乡的乡党委书记詹登科、大寺各合作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也都落座，毛泽东拿出笔、纸，让把他们的名字写下，自己又念一遍，随后便问：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应声道。

“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接过话头：“754斤！”

毛泽东笑了：“不少呀！”他又问社里和县里大秋作物的预产量。

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说完，又补充说明道，“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他笑嘻嘻地环顾着屋里的人们，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显然又想起汽车上张国忠向他介绍的徐水县的情况，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事实上，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实在还是因为粮食当时并没有打得那么多。但在当时，没有人会如此说。

张国忠踌躇着开口解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又出了个主意：“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认为这还不是答案：“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着那么多酒精啊？”

大家答不出来。毛泽东呵呵地笑，环视四周。旁人也跟着笑。

张国忠打破尴尬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他又笑了笑，“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

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说完，他站起身，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对于1958年的“高产卫星”，毛泽东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我相信，也没有说过我不相信。那么，对徐水这样的“高产”、“丰产”，他相信不相信呢？这次，他也没有说。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一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问住了徐水县的干部，实际也问住了毛泽东。粮食多得换不到机器，多得造酒精用不了，怎么办？毛泽东最后的答案是社员自己一天吃五顿。

还是吃。这不是又回到“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这个问题上来了吗？那么，毛泽东到底相信不相信如此的“高产”？到底相信不相信其他地区也会和徐水一样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是半信半疑？

灿烂的阳光照耀田野。毛泽东差不多走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毛泽东去了粮食加工厂。那里一台锅驼机带动钢磨在磨大麦面。他同管钢磨的社员郑德祥谈着话，忽然发现正在机器旁站着的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正眼不错珠地盯着他。他转过身，问：“你们两个是开机器的？叫什么？多大啦？”那女青年回答，她叫田金花，18岁了，男青年回答，他叫郑德生，15岁了，他们两人是开机器的。毛泽东赞道：“了不起，这么小就会开机器了。”一句话乐得两个小青年咧开嘴，伸出手要跟毛泽东握握手，手伸出一半，发现满手的油污，就赶紧缩回去了。

筛面的是四位中老年妇女，满身落着白色面灰。看见毛泽东走近，一个叫郑秀芳的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大声说：“毛主席！您老人家身子结实吧！”毛泽东停了下来，问候她们说：“我很好，你们都好吗？”那几个妇女都激动得哆嗦着嘴唇，只会说：“我们好，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在不时响起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穿街走巷，一边与群众打招呼，一边走到农业社的供销部看望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然后又看了养猪场和缝纫厂、食堂、幼儿园。

幼儿园的几十个孩子一色新背心、新短裤。孩子们都住宿舍，实行“全托”，一般都不回家，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由社里统一供给。

幼儿园的隔壁是社里办的“幸福院”，住着由社里统一赡养的丧失劳

动力的老人们。幼儿园的女孩崔小玉领着大家给毛主席唱了《歌唱总路线》和《一条小手绢》两支歌。炕头上坐着的老人们则激动得只会喊口号说不出别的话，只有80多岁的田老汉抖着白胡子对毛主席来来回回地说着几句相同的话：“咱们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

在食堂的厨房，毛泽东拿起给社员们预备的大麦面馒头，问：“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支书阎玉如回答没有。

走到农田里，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毛泽东便对陪同人员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介绍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毛泽东接着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看看走在身边的张国忠，又算开了徐水县劳动力的安排：“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动力，抽出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那就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随后，他对省委解学恭和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哩！”

说话间，走到一块棉花地边。棉花已有半人多高，毛泽东下了田埂，分开密密的棉枝朝里走去。走几步，停了下来：“我钻不进去啦！”又问，“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李江生回答：“1000斤皮棉。”

“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毛泽东说着，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朝前面另一块黍子地走去。

这时，太阳已经西斜。毛泽东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坚持要再去看看玉米和谷子，看看种的山药。在每条道或栽4行秧子，或栽8行秧子，或栽12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地里，毛泽东详细问到，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当他听说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0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100万斤时，他不禁颇有深意地笑了：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

他似乎又自问自答地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毛泽东要同大寺各社告别了。他同社里的每一位干部握手,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并表示感谢。临末,他直视每一位社干部的眼睛:

“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毛泽东还想在秋后来证实一下这里的产量吗?没有人能回答。田野之中,只听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在往县城的路上谈起了劳动大协作与军事化的问题。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准备按照一穷二白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和多快好省的指示,修建一个比十三陵还大一点儿的水库,毛泽东说:“这是形势逼人。”

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答,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这是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

张国忠又汇报说县里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为公有。毛泽东对此很关心:“十个人中有没有三个人不赞成?”得到的回答是,连两个也没有。

在徐水县城,毛泽东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他走遍所有的车间,对肥料厂出产的固氮菌,从化验室的显微镜看起,一直看到成品的出现。在铁厂,他观看两个年轻姑娘操纵一台刨车,参观发电车间和这里出产的十马力煤气机。和在乡村一样,他被激动的人们和高亢的口号所包围。整个徐水城关的人们,好像都涌到了铁厂到县委的路上,朝他欢呼,朝他伸出手来。人流如潮,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涌动。毛泽东微笑着,和蔼亲切地和群众打招呼,他被深深地感染了。

迈进县委,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儿不小哩!”又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粮食原先很少,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如果说此时的毛泽东对粮食如此“丰收”多少还有点疑惑的话,那么到了9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如潮水般涌起的时候,他就是又一番感

慨了。

1958年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过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9月8日的会上，他又这样说：“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儿。”

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湖北时一直陪同在侧的王任重在他的《毛主席在湖北》的札记中写道，“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小，要就很多很多。过去9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使毛泽东抛掉了存于心中的疑虑？看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这些意思和后来对王任重所说的，最先是出自他与解学恭、张明河的谈话之中。由此可见，徐水之行给毛泽东的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徐水县委会里，毛泽东又问了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的情况，了解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抗旱的情况，并和机关干部们合影留念。

当李悦农、张明河谈到安国的山药、玉米也丰产时，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们明天去安国看看。

在回车站的路上，张国忠对毛泽东说：“群众爱戴党爱戴领袖，请主席看群众这股热情。我们党在群众中真是扎根了。”毛泽东点头：“我们打仗几十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老百姓吃饭，吃好饭！”

最后进专车前，毛泽东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施肥，密植。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用来喂牲口，养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他感慨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说，“北京就不出

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张国忠说：“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泽东对这个回答点头，显然十分满意。

晚上7时半，专列开动，朝安国的方向而去。

在安国，毛泽东又将看到些什么？

就在专列隆隆向前的时候，徐水县委要求保证今年秋粮亩产超过2000斤的电话会议开始了。

也在这天夜里，大寺各庄酝酿中的公社正式成立，树木全部归了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也在这天夜里，有一位母亲激动之下把家里的全部存粮送到了公共食堂，没剩下一点儿。

《三国演义》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那么办社是办大社好还  
是办小社好？安国的古药王庙一  
闪而过，爱论古的毛泽东此时却沉  
浸在现实问题中

从徐水县出来，专列 8 月 5 日停在定县。毛泽东要去安国视察。因为在安国停留的时间只有半天多，所以安国县县长焦家驹一早便等候在定县车站，以便陪同毛泽东去安国时多介绍些情况。

和在徐水时一样，焦家驹是在专列上被引见给毛泽东的。问过姓名、籍贯、简历等等基本情况后，毛泽东就谦虚地征询道：“我到你们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焦家驹老实地回答说：“我们正是来迎接毛主席去我们县视察工作的。”

几辆汽车出了定县车站往西驶去，焦家驹陪毛泽东同坐一辆车。从窗外看见有许多人聚在一处，毛泽东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多人？”焦家驹说：“这个地方是定县西关，这些人是候车的。”

车驶进定县城内。很多人纷纷驻足打量着这些平日不多见的轿车，猜测着里边坐着什么人。窗帘已经拉了下来，外面看不见里边，早晨的阳光却把车厢内映照得很亮。

毛泽东开始问起安国的情况：“你们县小麦每亩能产多少斤？”

“亩产 491 斤。”焦家驹答。并介绍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 5130 斤小麦的“卫星”。

“明年计划多少？”

“计划种 45 万亩，争取亩产 2000 斤。”焦家驹下保证似的说。

“怎么实现？”毛泽东似乎要追问下去。

焦家驹介绍了几种主要措施。当他讲到深耕要普遍翻到 1 尺半以上时，毛泽东又开口道：“45 万亩地，深翻 1 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种时间有多少天？”



焦家驹说，夏种时间是30天。至于深翻任务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工具。拖拉机一次能翻1尺半，要是翻两次，就能达到3尺。

“能翻3尺，那就更好了。没有拖拉机呢？”毛泽东说。

“双铧犁用两头牲口，一次也能翻1尺半。”焦家驹答。

“那你们牲口够用吗？”毛泽东再问。

“牲口不大够用，全县只有2万多头。另从外头买回来2000头。”

“是在张家口买的吗？”

焦家驹答是。毛泽东说：“还要增加点牲口。”

“你们今年每人能收多少粮食？”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这个重要问题。在徐水问，到这里也问。

“按亩产3000斤算，35万人每人平均4000斤。”焦家驹说。

“主要种的是甘薯吧？”

“主要是甘薯。明年我们计划少种些甘薯，增加种植油料作物。”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多种油料作物，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食用油。顿了顿，他向这位安国县的县长提出了在徐水县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你们打这么多粮食怎么办？”

焦家驹的答案是搞储备，另外社员可以多吃点。

毛泽东说，粮食那么多，每个人每年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多吃小麦。土地也应该有休整的时间。

太阳愈升愈高，夏日的暑气蒸腾上来，车里显得闷热了。车出定县县城，沿途可以看见庄稼地了，毛泽东拉开窗帘，尽情地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不断地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势不错。

焦家驹说，合作社以来，生产确实大大发展了。过去这些地方一层层沙地只能种点豆子。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问：“他们这儿的庄稼跟你们那里的比怎么样？”

焦家驹表示，粮食作物他们这还不行。

“为什么？”毛泽东问。

焦家驹说，我们那里有粮食的高产品种，比如多穗高粱，就是从唐山专区输入的。

毛泽东嘱咐道：“你回头拿一把多穗高粱，一把本地高粱，给我吃，看看

哪个好？”焦家驹当即说，我们选择一部分送到北京去。

车驶过定县东亭乡。毛泽东从车窗突然发现一面山墙上写着“压倒安国、超安国”的标语。他转身对焦家驹道“他们要和你们比哩。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呢？”

“我们压倒他们。”焦家驹几乎一点儿都没犹豫。

“压倒了吗？”毛泽东又问。

这回焦家驹的回答挺有分寸“没有压倒，他们的干劲也很足。”毛泽东听罢，不再说什么，只自言自语地说“压倒，压倒……”焦家驹也不再说什么，心里则在想，毛主席是不是认为“压倒”两字不妥当？

进入安国县境了。此时天气晴朗，几朵白云游弋天际，路边的玉米、高粱、谷子和棉花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煞是好看。毛泽东兴奋了，他鼓励焦家驹说，你们的庄稼长得好，我要下去看看。还没到预定目的地，毛泽东似乎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

新安村边，车终于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坟头上种庄稼的做法，便说，把庄稼种到坟头上，坟不平也可以嘛。徐水他们那里的做法是完全把坟平了，平了也可以。

见到棉花地里有些虫害，毛泽东叮嘱干部们说，这是钻心虫，两三年应该消灭掉。看到一块芝麻地，他又说，这样好的芝麻，怎么不多种一些？走上地头，他又说，公路上要大量植树。

陪同人员这时上前来请毛泽东上车继续前行。车上，他听取焦家驹关于安国县食堂化、托儿化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要求安国县把食堂坚持办下去，好好带孩子，并讲到，可以把这条马路搞成水泥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这样国际友人要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了。

12时左右，淤村乡流村农业社就在眼前了。许多人兴奋而激动地聚在村头，已经等了很久。毛泽东一迈出车厢，就被欢呼声淹没。他的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他一次次地伸出手去握住农民们那一双双老茧手。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土地和靠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充满了感情。

这一片是流村的春玉米试验田。毛泽东对它的长势满口称赞。他看到田里有些虫害，就问焦家驹，对于防治病虫害，你们有什么机构没有？焦家驹答说有农业大学和技术研究委员会。毛泽东叮咛道，一定要好好

研究治虫，两三年内消灭掉。

走过一块高粱地，毛泽东看到有高秆的，有低秆的，就问：“为什么这些生长得这样矮，有的却是那么高？”

流村乡党委书记郭建回答说“高的是大八权，能结八个穗，矮的是小八权，种它是为了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毛泽东哈哈笑了，开玩笑道“让这两种杂交不好吗？就叫矮八权。”

天很热。密不透风的庄稼地更没有一丝凉意。大家请主席休息一下，可在哪里好呢？前面恰好有个护秋用的窝棚，跟毛泽东一说，他爽快地朝那边走去。

窝棚里，只有一张光秃秃的硬铺板，虽简陋，却遮挡了灼人的阳光，而且四周透风，顿显凉意。毛泽东就坐在铺板上，听乡党委书记郭建汇报农业社的组织情况，听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汇报安国农业社大小变化过程的情况。

“你们县里有多少个农业社？”毛泽东问。

“刚建立高级社时，全县共有 29 个联村社，以后又划分成 252 个社了。”

“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搞大社？”

“农民高兴搞大社。我们把大社划小以后，有很多农民又自动联合成大社了。”干部们回答。

听罢，毛泽东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又转过头问郭建，“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接着，他问郭建“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

郭建想，这几年农村不就是由一家一户到互助组到合作社，又成立联村社的吗？他于是回答“办大社好。”

焦家驹也接过来谈“我们准备今年秋后一乡办一个社。”

毛泽东点头：还是办大社好。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千户、六千户，一乡一社。大社好办事，这是大势所趋。

休息片刻，毛泽东起身去看甘薯田。在郭建讲到甘薯亩产计划 80 万斤时，毛泽东这样说“这还是个计划，要看结果。20 万斤也不少。”他肯

定玉米地里间种豆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好,豆子含根瘤菌,既肥田又增产。当一个记者不小心踩了花生地里的一棵花生秧时,毛泽东心疼了:“看踩坏了一棵。”在谷子地里,他还讲道“谷子出小米,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

走到一块棉花田,他忽然站住了,盯着地头立着的一块牌子看半天,问:“谁是王洪才?”

“我是。”站在一边的社主任连忙答上一句。

毛泽东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地“这块棉花为什么高一行低一行?”

“这是我们试种阴阳垌呢!”王洪才解释。

“阳垌把阴垌遮起来,阴垌要吃亏。”毛泽东很内行地说。

“主席说得对。”王洪才又道,“阴垌不如阳垌见阳光多,不过种植棵数不同,阳垌每亩平均种 3700 棵,阴垌每亩平均种 6300 棵。”

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好,你们今年试一试就知道怎么种收成大了。”

毛泽东走了一处又一处。一拨一拨的人涌来看他,要跟他握手。这一天的天气特别炎热,汗从他的额头上不住地流下来,湿透了他的衬衫。一个老农见状,心里一动,急忙跑回家拿来一把扇子交给毛主席,还把自己的一顶半新的麦秸草帽戴到毛主席的头上遮阳。对这些,毛泽东没有拒绝,他就带着这样一顶普通的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乘车去安国县委会。

车上,当毛泽东听焦家驹说安国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及时指导下,没有出现“反冒进”的马鞍形时,他说:“好。没有出现马鞍形,风没有刮动你们。好。”

车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焦家驹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去看,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遇上对手,便会兴致大发,侃侃而谈,由此道出自己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这次他看到的这个药王庙,是安国的一处名胜,还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始建,明嘉靖年间重修的。面积有 3000 余平方米,坐东向西,门前有石

狮一对。门内有马殿、钟鼓楼、药王墓亭、大殿及后殿等，庙宇雕梁画栋，气度不凡。据安国县志记载，庙内供奉的是东汉开国功臣，才兼文武、精通医理的药王，安国县人邳彤，他是被宋徽宗追封为灵贶侯的。庙内还供有秦越人、张仲景、张子和、华佗、朱丹溪、孙思邈、刘河间、李东垣、李时珍、王肯堂十大名医像。对此，毛泽东不会没有所闻，他渊博的学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但现在，不知是他的心思没在这儿，还是因为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对手，他没有下车参观，也没有再说什么，车便一直朝着专列停靠的定县车站驶去。

也许毛泽东的脑海中此时真的无法容纳历史的遗迹。他和李悦农在车上谈起了几个非常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要不要并县、并社，乡社合一？是不是搞一乡一社？能不能推广徐水的“组织军事化”？

对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并的是不是少一点。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

对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可以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万八千人搞成一个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器。

对第三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 11 万多劳动力，弄 4 万多去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 7 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来了军事化，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毛泽东还谈了平原造林问题，说，在山里造林，平原也要造林，过去土地产量低，怕造了林没吃的，现在不会怕这个了。我告诉安国县委，叫他们弄一定数量的土地造林。把坏地造林，造了林可以改变气候。

他还讲到，平原上也要养鱼，有水就养鱼，山区也可以养。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林业、牧业、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有水就有鱼。

他还告诉李悦农，要研究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肯定平原上山炼铁的办法好，谁炼了归谁，这样人们就积极了。

他谈了深翻地的优越性、重要性：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光密植

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就用人力也要深翻。

他认为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园田化的口号很好。说，这样办对，应该大量这样搞。

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起来了，了不得，一跃就上去了。

车速加快了，安国县渐渐远去。它又给当时的毛泽东增添了许多跃进的信心吗？

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到了。一切竟如想象般好，他笑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河南省七里营乡，在 50 年代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1957 年冬，已经全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七里营地区，共有 56 个高级社，平均每社只有 125 户。除有 5000 余人的七里营高级社外，其他的社都规模不大，无论人力、财力和物力都显得势单力薄。1958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经过研究酝酿，七里营中心乡所属的 56 个高级社合并成为了一个拥有 7000 多户、37000 多人的大社。

1958 年 8 月 4 日，“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挂在了这个大社的门前。

七里营的动作应该说是很快的。1958 年 5 月 5 日，七里营刘庄高级社的史来贺和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同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里，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娄本耀是向谭书记汇报已有公社性质的嵯峨山集体农庄的情况的，这使史来贺受到启发。次日，河南遂平嵯峨山人民公社正式定名的第二天，七里营去参观的人就到了那里。这样的速度，使七里营走进了第一批建立人民公社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亲临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令那里的人们骄傲无比。

1958 年 8 月 6 日，这是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后的第三天。雨刚刚停，阳光从云隙中射出，大地清新无比，凉爽宜人。

毛泽东由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及有关地、县、乡的党委负责人陪同，来到公社门前。在那块牌子下，毛泽东站定，端详一会儿，轻声念出了上面的字：新乡县七里营



人民公社。县委负责人上前告诉他，这是新乡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点头，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走进院子，看到迎面屋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两个牌子，毛泽东便问：“这是什么？”大家告诉他，这是公社的红专大学。毛泽东感兴趣地问：“谁是校长？”回答是，公社的党支部书记。

毛泽东跨进公社会议室。社委会开始向他汇报七里营公社各方面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问，特别关心地问到，公社的规模、生产情况和社员的生活水平。听到高兴处，毛泽东连声称赞，人民公社好，并关切地问社委会的干部们：社那么大，管理不容易，有没有困难？社干部们一致地回答：“有困难可以克服。”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便出门参观。他首先去了敬老院。干部们汇报说，公社把一些鳏寡孤独的老年人组织在了一起，这使他决定先去看看老人们。

未到门前，院里的老人得知消息就纷纷奔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70多岁的李学正，他流着眼泪，拉着毛主席的手，一直走了十几步，就会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说不出别的话来。毛泽东一边向老人们问好，一边关心地问社长，他们住在这里满意不满意？他看了西屋看南屋，看了南屋看东屋，又进了里间看老人们睡的床铺。

走出敬老院，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又到公社建的面粉加工厂。在轰隆隆的机器运转声中，毛泽东走到出面的面粉箱前，不顾飞扬的粉末飘落肩头，细细地看圆罗筛面，顺手抓起一把麸皮，内行地用手指捻动，看磨得净不净。然后，他到公社的滚珠轴承厂，观看滚珠的生产过程。毛泽东看得专心，看得仔细，也看得高兴。

越过茂密的豆地，跨过布满瓜蔓的菜田，毛泽东到了棉花试验田。他详细地问，这块地有多少亩？产量多少？施多少肥？像这样的田全社有多少？社长王文生做了汇报。随行的人员还有人走进棉田，专门数了数棉桃。毛泽东说，要收到手里才算数呢！他一边说，一边走进齐肩高的棉丛，用手平着棉花顶比着自己的肩膀，称赞长势不错，又弯下腰，自己数了一遍棉花的果枝、棉桃。

“前边就是干部红旗试验田。”有人指着另一块地说。

“我们过去看看。”毛泽东朝那边转过去，他的脸上沁出汗珠，衬衫也已湿了，脚上沾满了泥土。一位负责人走过来说，主席先回去休息休息再看吧！毛泽东摆手，很兴奋地说：不，再稍走走！稍走走！

几个正在打药治虫的女社员看见毛主席过来，都激动得很。毛泽东对她们说：“做做给我看看。”于是那几个女社员操作起喷雾器干了起来，毛泽东很赞扬她们熟练的劳动。

“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从棉田出来，毛泽东问社长王文生。

“七里营生产队 10500 亩棉花，有 5000 多亩是这样的。”

“亩产能有多少？”毛泽东又问。

“每亩保证皮棉 1000 斤，争取 2000 斤。”王文生答。

毛泽东笑着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回答：“有这样的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很赞同：“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从棉田出来，毛泽东专门问到社员的收入情况。社干部说，去年收入 84 元，今年要大搞积累，仍然维持去年的水平。毛泽东说：对社员的分配也要增加一点儿，今年要 100 元。

毛泽东从农田参观回来，在人山人海般欢送的人群中直接上了汽车。临行前，七里营人民公社送给他一块玻璃匾，上面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车开走时，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毛泽东从车窗里探出身，向他们挥着手。

## 看完烟田看炕房，烟瘾很大的毛泽东觉得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一看“烟叶王国”

河南的襄城县盛产烟草，素有名气。

1958年8月6日晚，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停靠在京广铁路岔道长店路段上。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许昌专员公署专员王延太被请到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许昌烟草试验场和许昌县尚集俎庄一带是毛泽东原定的视察地点。由于近日多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车，经过研究，临时决定毛泽东沿许昌、南阳公路往襄城县视察。襄城史上从此添上了不寻常的一笔。

一早，约7点30分左右，毛泽东到了双庙乡郝庄第二生产队的烟田。这时，晨曦已洒满田野，一望无际的烟叶上，露珠闪闪，空气十分清新宜人，勤劳的乡民们已经早早下地劳作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从这一片烟田到那一片，边走边看，边看边问。烟垄深处的珠水打湿了他的裤腿，沾湿了他的衬衫，他竟全然不顾。他的鞋上也沾满了泥巴，走起来，脚步却依旧轻松。他对正在忙着拍照的记者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他指指身后的烟田。

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闻讯匆匆赶来陪同毛泽东。毛泽东与他握手，询问他的名字，刘熙民说，康熙的熙，人民的民。“啊，你是康熙的人民。”毛泽东风趣地说，他经常演绎别人的名字来活跃一下空气。

“你干什么工作？”毛泽东又问。

刘熙民回答说：“县委副书记。”

毛泽东听了，道：“一县之首，担子重啊！”

他转过身，问刚赶到的负责保卫工作的许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你叫什么名字？”辛建答，辛苦的辛，建设的建。毛泽东又道：“你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啊。干革命就得有不怕辛苦的精神。”

在郝庄的烟田间看完后，毛泽东在刘熙民的陪同下，乘车沿许南公

路，朝县城方向而去。

通往县城的这条公路上，不时掠过一座座彩门。其中一座彩门上写着：“襄城县双庙乡，超鲁郑跨许昌。”鲁，指鲁山，郑，指郑县，都是当时所谓的先进单位。毛泽东看到它，问刘熙民：“这是什么？”

刘熙民介绍说：“这是为了组织生产评比，搞竞赛。外边的和许昌、郑县、鲁山赛，本县的乡和乡赛。”

毛泽东问道：“作用多大呢？”

刘熙民讲了襄城县刘庄乡因搞竞赛由后进变先进的事。

毛泽东听了，对这个故事本身未做评论，只是告诫刘熙民：“开展竞赛，要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不务虚名。”

车一路驶去。刘熙民插空又向毛泽东汇报襄城县粮食、烟叶的生产情况。

毛泽东道：“要把农业搞好，光靠两只手不行，还要有农业机械化。农民们愿意不愿意买农业机械？”

刘熙民说：“今年烟叶能收入 2000 多万元，农民手里有钱，都盼望早日犁地不用牛，现在是有钱买不到农业机械。”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太急，一定会办到的。”

早上 8 点多钟，毛泽东一行到了三里沟乡后梁庄的烟叶丰产田。这里的烟田间，乡亲们正在干活，毛泽东一下车，便被认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毛泽东则笑容满面地与大家握手。他看到社员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好不耽误农活，便问身边的干部们：“农民生活情况怎样？他们的休息时间够不够？”

从村北走到村南，毛泽东到了三里沟三队干部种的试验田。这块田烟叶的长势确实比一般的田好。烟叶已有好高，但顶上还没冒花，棵挨棵，叶挤叶，十分茂密。毛泽东下了田，用手轻轻分开烟叶，探身向里望了望，道：“这不通风，用绳子攀起来就好了。”

接着，他问：“这是什么品种，长得这么好！”

刘熙民回答：“这个品种叫长脖黄，产量高，质量好，抗灾能力强，农民喜欢种。”

毛泽东问到收烟的时间以及管理技术和收烤技术。比如，什么是“挂刺刀”？什么是“挂腰剑”？什么是“留二茬”？

在一块二茬烟田旁，陪同者介绍说“头茬烟已经收完，这是二茬烟，只要加水、加肥，管理好，二茬烟也能长好。毛泽东走过去，指着一株已超过头茬的二茬烟，打趣道“孩子比妈妈长得还高。”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王延太专员“你们的烟叶好，还是山东潍县的好，你们比较了没有？”

王延太不好做正面回答，只说“现在全国 12 个省烤烟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他们反映这里的烟叶长得不错。”

毛泽东却没顾虑“在你们这里开会，说明你们的烟叶好。”

登上一道高坎，极目四望，烟田如织，浩瀚如海般。毛泽东望着，兴奋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从三里沟乡，毛泽东乘车到十里铺乡薛园农业社视察。正在开会的干部群众听说，纷纷涌过来，一迭声地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陶醉地吸上一口，看着一块块茂盛的烟田，颇为感慨地说：“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看。”

从烟田到玉米田和田间小井，毛泽东一一看完，已经徒步走了 2 里路。太阳到中天了，上晒下蒸，炎热异常，毛泽东脸上的汗朝下淌，衣服浸得湿透，大家请他去村里休息一会儿。

在村的一张布棚下，毛泽东坐下。四周围满闻讯从邻近的李庄、上徐、下徐、赵堂村赶来看毛主席的人们。小学生们排起队，隆重地向毛泽东献了花。

有机灵的人跑去端来一盆清水请毛主席洗脸擦手，又端来一杯开水，请他喝了解渴。毛泽东惬意地一饮而尽，没坐几分钟就要去炕房看看。

正在炕房修理火垄的农民烟叶专家梁运祥，看到毛主席朝这边走来，急忙忙从炕房里跑出来，忘了自己两手还带着泥巴，就被已到了门口的毛泽东握住手。梁运祥感动万分。

东炉房里正在烘烤着 210 秆烟叶。火已烧了三天，炕内温度已达 60℃ 之高。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进去，在外边看看就行了，毛泽东不同意。

梁运祥把炕门苦子刚一掀开，烟香和热浪就迎面扑来。毛泽东不在意地走进去，从烟秆的空隙里，望见满炕金黄的烟叶，他高兴地笑了。

走出炕房时，因为高温，他的脸显得红扑扑的。他问梁运祥：“烟为什么要炕，用太阳晒行不行？炕烟好？还是晒烟好？”梁运祥都做了回答。毛泽东自己烟瘾很大，对于烤烟的技术细节，问起来也兴趣盎然。

中午 11 点多钟，毛泽东离开村庄上汽车返回。村民们送来一个大西瓜，让毛主席路上解渴去暑。毛泽东用手拍着西瓜，高兴地说：这个瓜真大！

将离襄城县境时，刘熙民从车上下来，向毛泽东道别，并问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握住刘熙民的手：“你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在管理精细的玉米地边，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长葛无‘葛’啊！”面对2000斤亩产的保证，他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对河南的长葛县，毛泽东有印象。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有关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介绍过长葛掀起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的群众运动经验。对此，毛泽东不但很有兴趣，而且称赞这是一大发明。这次出外巡视，毛泽东在河南，没有忘记要去长葛县看一看。

“铃……”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正在长葛县委值班室内值班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江烈从熟睡中惊醒。

这是1958年8月7日凌晨1时许。

凭一种本能，他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果然，他伸手拿起电话，那边就传来了由许昌地委办公室下达的紧急通知：8月7日，将有中央重要领导人来长葛视察。视察地点一是以勤工俭学著称的长葛第三中学，二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受毛主席表扬的深翻土地夺高产的胜利一社，三是坡胡乡。电话那边还问到，从长葛到开封的公路通车不通车？李江烈回答：由于8月2日降了暴雨，洧川双泊河大桥被毁，公路中断已无法通车，三中也去不成。

放下电话，李江烈想，莫非毛泽东主席要来么？顾不得多琢磨，他赶紧起身通报县委负责同志，并召集有关人员连夜开紧急会议，对视察的路线、接待、保卫工作一一做详细的研究和安排。这一夜，许多人没有睡。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还有什么细节是不是没有想到？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大伙儿心里都挺紧张，生怕有什么疏忽。

上午10点多钟，许昌地委监委书记纪忠良等四人，带来两部吉普车到长葛，以备迎接中央领导人之用，真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

中午1点半钟，专列从襄县烟区出来徐徐驶入和尚桥车站。



果真是毛泽东来了。许昌地委的纪忠良等人都在车站等候。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专列下来，要纪忠良、县委书记吕炳光、王连安先上车见见毛主席。他还告诉他们，因为毛主席上午在襄县接连视察了几个小时，已经很疲劳了，加上天气炎热，为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只安排到近处看看就行了，不再去原定的坡胡等地。

吕炳光等人来不及多想，到了车上。毛泽东看上去精神还好，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红发黑。看见他们来了，毛泽东站起来听吴芝圃一一介绍并同他们握手。

介绍到吕炳光的时候，吴芝圃说，他在今年5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做过关于深翻改土夺高产的经验报告，受到过主席表扬。对此，毛泽东当然记得。

介绍到王连安时，毛泽东问他，担任什么职务？哪一年来河南的？王连安说自己1948年到河南工作的，毛泽东掰了掰手指说：“呵，你来10年了，算是河南人了！”

毛泽东要求下车。吕炳光忙问王连安，安排主席去哪里呢？王连安稍想了想，说，就去近处的宗寨“五四”农业社吧。

下了列车，毛泽东和秘书及吕炳光、王连安被安排上一辆吉普车，吴芝圃和毛泽东的其他随行人员乘另一辆吉普车。由于仅有两辆吉普车，河南省委常委书记杨蔚屏、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新华社记者侯波等人及公安部同志，就只好由纪忠良、李江烈等当地有关负责人陪同，跟在吉普车后步行。所幸没走几步，从当地驻军3655部队借来的卡车就赶到，大家这才上了卡车。

一路向北驶去，行至宗寨田间的交叉路口，却发现前几天的暴雨把这里的路面也冲坏了。王连安急忙下车，要叫人赶来修路，毛泽东这时也下了车，说：“不要找人了，咱们下去走过去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田埂上。那一片田里，长的是玉米，田间管理颇为精细，看不见杂草，叶壮秆粗，毛泽东高兴了，幽默地说，长(Chang)葛，长(Zhang)葛，你们长葛无“葛”啊！

宗寨“五四”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赵献章接到通知，匆匆赶来。毛泽

东与他握了握手后，一同朝另一块地走去。

前面是一面坡，坡下横着一条沟。怕毛泽东有个闪失，吕炳光等上前要搀扶他一把。毛泽东摇摇手：“不用。我可以上去。”话音没落，他一个大步，就从沟下跃上土坡，进了一片谷子地。看见随行记者侯波一个劲儿地在眼前按动快门，毛泽东提意见了，说：“别光给我照，要多给大家照才行。”

走过谷地，到一块玉米地。毛泽东一连问赵献章好几个问题：这块地翻了多深？浇了几次踏地水？施了多少肥？犁耙几遍？什么时候播种的？计划亩产多少？当赵献章说到计划亩产2万斤时，毛泽东又问，每亩种多少株？每株能长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又有多重？

离玉米地不远，就是宗寨村。王连安把“宗寨”两个字写给毛泽东看。

“有多少户？”毛泽东问道。

“有200多户。是一个高级农业社。”王连安说。

毛泽东又问：“有没有办食堂？”

王连安答：“有。”

“食堂是常年的好，还是农忙时好？”毛泽东再问。

“农忙时好。”

毛泽东又把问题提给赵献章：“你说是生产队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赵献章说，大了好。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沿路往回走。见到池塘里的水浮莲，毛泽东说，水浮莲好啊，可以喂猪。

见到路旁的桐树，毛泽东又说，桐树好长，可以出口，日本要我们的桐木材呢。

吕炳光汇报说，我们县最好的桐树在墙周，那里的桐树既直顺又粗壮，都支援国家出口了。

回到吉普车前，毛泽东与陪同的当地干部握手告别。乘车返回专列的路上，吕炳光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全县深翻改土和农业生产情况，当他又一次说到，今年全县玉米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毛泽东问他：“能达到吗？”吕炳光告诉说：“一定能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向主席报喜。”毛泽东仍保持着他的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下午4时,毛泽东的专列向北而去。

10年之后,即1968年8月7日,经许昌地委批准,长葛县县委将宗寨村改名为“八七村”,并在村内修建了毛泽东视察宗寨纪念馆。而毛泽东视察时走过的那条种植了桐树的路,则被命名为“八七”路。

红薯地边，有人上前扒一块红薯，  
个不大，再扒一块，还不大。毛泽  
东看在眼里，不让再扒，转身留下  
一句话：“亩产 13000 斤？秋后我  
再来看”

豫东平原的商丘县道口乡，有个“双八”大队，50 年代曾经名噪一时。它的原名叫黄楼村，而它之所以改名，全在于在 1958 年 8 月 8 日这一天，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伟人来过这里。今天，那个村子里一定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午后了，烈日炎炎，热浪袭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车未停，车窗上乳白色的布帘慢慢垂下来，遮住了来往行人的视线。聚集在站台上早已等候多时的当地党政军负责人马上抖擞起精神。只见车厢里走下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迎上来的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三人便上了车。

原来列车上的毛泽东要先见见东道主们。在他的这次视察旅途中，这几乎成了惯例。

当史向生介绍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时，毛泽东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边的铎？”

毛泽东身穿白衬衣，灰色长裤，脚登一双棕色皮鞋。他坐下时，随手从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衔上一支，打着火，轻轻吸了口，开了腔，话题却是：“商丘是原归德府，古宋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阙伯台、八关斋、壮梅堂。”

商丘在上古时，这一带即为华夏诸部落活动的中心。相传，“五帝”之一的帝誉高辛氏为帝王时，建都于亳（即今商丘南 25 公里的高辛集），封他的儿子阙伯管理火种，称为火旺。阙伯由于管火有功，被后人尊称为火

神。刘学勤介绍的“阙伯台”就是阙伯当年管火的地方，亦称“火神台”、“火星台”。

刘学勤介绍的“壮梅堂”是商丘比较重要的另一处古遗迹。“壮梅堂”原名杂佣堂，在商丘县城刘家寓首南街东侧，是明末才子侯方域的宅屋，他在此潜心著述，留下了《壮梅堂文集》、《四忆堂诗集》两部名著，还留下了他与李香君的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毛泽东听完刘学勤对这些名胜的简要介绍感慨不已，随后便把话题转入实际工作：“今年夏季收成怎么样？”

“夏粮丰收。”任秀铎简单地回答道。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哪些？”毛泽东转向刘学勤问道。

刘学勤说：“全县 150 万亩耕地，110 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 60% 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芋、夏玉米等。”

毛泽东好像并不满足于这个答案。他算了一下时间，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向他介绍说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毛泽东同意：“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轿车驶过包河，毛泽东有兴趣地问：“这是什么河？”刘学勤回答说：“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毛泽东又问刘学勤的简历，哪里人，今年多大了，上过什么学，读过什么书，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做些什么工作等等，一一问到。他听刘学勤讲到日军占领家乡永城，被迫失学时，感叹地说：“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连你的读书时间也被占领了。”他又问，“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你读的什么书？”

当刘学勤回答工作紧张，读书不多时，毛泽东认真地说：“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说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非闲谈，亦非偶然。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借鉴苏联已经取得的一些经验，同时也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摸索。对于斯大林这本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诸问题的书，毛泽东在 1958 年就先后读过三遍，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或肯定或否定或怀疑或表示需要再研究的意见。同刘学勤说这话三个月后，即 1958 年 11 月 9 日，在第一

次郑州会议上，他就单为建议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会的同志们写过一封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在这封信中，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他还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次日清晨，毛泽东还专门召集会议，专门讲解自己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体会。

和毛泽东同车前往黄楼村中华农业社的刘学勤此时并不能完全了解毛泽东的所思所想，但他还是感觉到这位共和国的掌舵人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关注和重视。

夏日的阳光下，田野一望无际。车队驶过，不时有田间劳作的人们起身张望。毛泽东了解了全县秋粮作物生长情况后问刘学勤：“农民很喜欢吃小米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进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没坐稳便又起身观看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指着上面写的“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几行字（由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1957年7月赠送的锦旗），毛泽东问：“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回答：“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新。”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吸了口烟，沉思起来。

在向黄楼村走去的时候，刘学勤问：“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先看农业。”毛泽东回答，脚步没有停。

到村子时的时间已是下午4时许。毛主席来了！消息早已被眼明耳

聪脚快的人传了开去，一时，屋里院里的老人，地里的青壮年，学校的儿童，纷纷放下手里的事拥来，都希望看看毛主席，是不是和画像上的一样。

毛泽东是往田里去的。一边走一边问：这里小社并成大社了吗？准备搞多大？搞什么性质的？有政策吗？叫什么名字？

前面就是试验田。毛泽东停在了写有“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几个字的一道门前。

“这是什么门？”他问。

刘学勤答：“‘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四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默读一遍门上的字，又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越过“跃进门”向前走去。

不远就是打井队的工地，打机井的是清一色的小伙子。毛泽东问他们：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已经打了多少天了？

黄开诗胆子比较大，别人腼腆不敢开口，他上前主动介绍情况。当他说到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时，站在旁边的乡长唐崇举大概认为黄开诗说的打井时间太长，就插话说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毛泽东却对这位只有18岁、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颇有好感，他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很好！”

离开打井队，到红薯试验田。毛泽东问，全县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产量多高？农民喜欢吃吗？怎么吃法？除去吃还可以做些什么？末了，他问：“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回答：“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两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说话间，地委副书记王林走上前扒出来一块红薯，但个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上去动手扒出一块，也不大。王林见此情况，又找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秧，要再扒一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毛泽东，此时平静地开口道：“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一边说，一边转身朝南边的另一块红薯地走去。

“这是我搞的。”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这时赶上前来向毛泽东汇报说：



“施肥 30 万斤，计划亩产 13000 斤。”

这时毛泽东转过身，怀疑地说“亩产 13000 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接下来看的是稻田，他问“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徐家林立即答道：“刚断水一晌，现在拔草呢！”毛泽东说“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然后他问起 1 亩有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1 亩 3 万墩，计划亩产 1500 斤。”

毛泽东听后不说话，只是走到插在地头的牌子前，看上面写的施肥数字和预计产量，若有所思。

从稻田出来，毛泽东去看社里搞的人造尿池，询问了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和肥料效能。将近下午 5 点钟时，毛泽东向停着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车子早被激动的人们团团包围。人们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后面的人你推我拥地朝前挤，想离得近些。近些的人则伸出手去想和毛主席的手握一握。远处，还有很多人在朝这里跑来。

汽车已经要启动了。动作快劲又大的打井队员杨邦福这时拼命挤上前去，推开已经挤在前边准备与毛泽东握手的曹效兰，把自己的手伸到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这时，原先准备好的话还没想起来说，他就又被别人挤开了。

车终于开走了。曹效兰不住地埋怨杨邦福，而杨邦福只顾一个劲儿地喊：“我同毛主席握了手！我同毛主席握了手！”

更多的人，则目送着汽车远去之后久久没落的尘埃。

返回车站的路上，毛泽东沉思着，问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 13000 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说不相信。

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又说，“你们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回答后，毛泽东说：“过去亩产 2000 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走了。1959 年 2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他没有忘记专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实验田的结果。

当天，商丘地、县、乡三级党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不让提

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党委会后，又开了干部大会。

然而，“大跃进”的热潮已不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和一两次干部会的召开所能冷却的。

为了这次视察，商丘人后来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一座挺漂亮的建筑，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据说，以后每年8月8日，这里都有纪念活动。

毛泽东对乡干部说：“你这个人  
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对棉花专家说：“不压迫，你们  
就不会上梁山”

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在视察了河南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的当天，便乘车往山东。一路上，他分别在滋阳、泰安等地，听取了中共济宁、泰安地委负责人和中共滕县、滋阳、泰安县委负责人的汇报。

8月9日，到达济南。在那里，中共山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各项工作的情况。在汇报中，毛泽东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毛泽东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以便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

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指出了办大社的优越性。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北园乡位于济南市郊区。这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就在谭启龙、裴孟飞和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等的陪同下，到这里参观视察。

一路上，看到道边的谷子秆粗穗大，毛泽东不断赞叹：“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孬嘛，我看群众干劲不小。”

北园乡有2500多亩藕田和2100多亩稻田。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北园乡北园社的干部们一一握手问候后，便开始视察藕田和稻田。

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在田旁列队欢迎。他们是社里的“青年卫星队”，正准备到地里锄草。毛泽东很热情地称赞他们的革命干劲，把自己的大手伸向他们那沾满泥巴的手。

水稻长势很好。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和密植情况。

社主任一一回答。问到计划产量，社主任道：“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每亩只产二三百斤。”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泽东说。

从北园乡北园社的藕田和稻田出来，毛泽东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他问这个所的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秦杰回答说自己是搞棉花研究的。

在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所的同志合种的一块棉花试验田里，棉花长得有一人高，有关负责人告诉毛泽东，估计每亩能收5000斤籽棉。

毛泽东听了，蹲下身，剥开棉壳，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有64个。数完了，毛泽东对秦杰道：“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秦杰谦虚地说，过去搞得不大好，只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才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毛泽东诙谐地说，“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秦杰汇报说现在棉花还存在容易落桃的问题。毛泽东道：“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毛泽东又问秦杰一个问题。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

毛泽东很满意：“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视察了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后，毛泽东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这个部队正在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了面并合影留念。曾经在长征时期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此时已是一名上校。当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心中百感交集。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两人相逢，谈了不少话。

在济南停留的时候，毛泽东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

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毛泽东勉励他们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表示怀疑：  
“搞亩产 10 万斤有可能吗？”不相信，却也不批评

已经是下午 4 点多钟了。8 月的骄阳依然灼人。头戴一顶草帽的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

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愣怔半晌，他们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真是毛主席来了。三步并两步，几人连忙迎上去，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

毛泽东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

路旁小溪潺潺的流水正被引往稻田。稻田旁绿树成荫，田内刚刚吐穗扬花的水稻散发出阵阵清香。

一块地连着一块地。走过溪上的石板桥，看到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毛泽东站住，问在这里搞重点社工作的东郊区区长张福安：“‘上游’是指什么？”

张福安说：“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 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毛泽东问。

“能赶。”张福安解释，“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这是四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泽东顺着稻田边走。贴在一个社员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 5 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 5 队的稻田。

“这块稻田 1 亩有多少墩？”他手指一块地，侧身问东郊区区委书记曾

国栋。

曾国栋说：“这块稻田共有 300 多亩，每亩平均 2 万多墩，每墩合 27 株左右。”

毛泽东蹲在窄窄的田埂上，用手分着稻株，细细地察看稻的生长情况。不一会儿，他回头问：“这块稻田是不是都这样？”

乡社干部们说都是这样。毛泽东站起身来。

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这时插进话来说：“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 22000 多墩的好稻田呢！”

“好，咱们去看一看。”

看完 5 队的稻田，毛泽东往回去看社里试验队的田。太阳已西移，依旧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热已使毛泽东汗流浹背。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 5 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斤？1 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

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 1000 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 2000 斤、3000 斤了。

毛泽东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四面张望。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他指着田旁水沟里飘着的水草，停住脚步问。

不远处正在地里忙着拔稗子的十几个社员看见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活计，快步赶来。社员李顺弟腿最快，走到跟前，正好听到毛泽东的这句问话。他上前对毛泽东说：“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他还跳下水沟捞上来一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水草，端详着，一边嘴里重复：“啊！原来可以喂猪，喂鸭。”

“这沟里是不是可以养鱼？”毛泽东指着水沟又问。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区长张福安连忙说道。

这时，围拢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摘下草帽挥动着致意。试验队的田里，也有许多社员在那里专门等候毛泽



东，他一到自然又激起一片不小的欢腾。

经过苇田，毛泽东说：“这是好东西，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

张福安向毛泽东讲述他们的设想说：“我们准备把稻子和苇子进行杂交，将来可以长成稻子穗、苇子秸，不怕旱，不怕涝，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割就行了。”

毛泽东首先肯定这种敢想敢于的精神，然后问：“现在你们搞了试验没有？”

“还没有搞。”张福安说。

“这两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类性质呀？”毛泽东问道，然后说：“你们可以试一试。”

张福安说，一定试一试。

如此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毛泽东很婉转地说。

对动辄万斤、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从未明确地表示过确信无疑的态度。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不缺少农业常识，但同时，他又从不正面地对此提出直接与明确的批评。这次在新立村农业社的这块试验田前，毛泽东又是如此。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

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这段回忆要比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直接地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亩产 10 万斤的否定态度。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对此做出直截了当的批评？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他认为，从中表现的群众的创新精神和已经鼓起的冲天热情比一些已经出现的问题本身，更为重要，更需要加以保护。

从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的一段回忆就可以看出来：

那是 1958 年的一天，高智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 1 亩地产 10 万斤稻谷？”

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

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儿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这便是毛泽东看见下面热过了头只是小淋一点儿冷水的缘故。谁能说他一点儿不受当时举国上下已近沸腾的热情的影响？

看完这块试验田，毛泽东顺着田埂看见迎面来了三个青年。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来的工作人员，到这里考察稻田搞试验。

毛泽东便问：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没有单位？正在搞什么试验？他还指着其中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捕虫用的网兜开玩笑说：“我看像个捕鱼的。”

走到另一块试验田前，毛泽东问道：“这块水稻亩产多少斤？”

区负责人回答是 5 万斤。

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赞道：“稻子长得很好。”

张福安又向毛泽东介绍，这块稻田因为幅度窄，在两边田埂上搭上木板就能进行插秧和田间管理，社员劳动不用下水了。

毛泽东感兴趣地指着远处的大片稻田说：“那里都可以搞成这样吧？”

人们劳动时,就再不用下水了。”

参观完试验田,准备回去,又走到苇田边,毛泽东没忘了向张福安说上一句:“水稻与苇子杂交工作,你们要试一试啊!”

太阳西落,津塘公路的桥头边,毛泽东上车的地方,拥满了人,大家都来给毛主席送行。车行很远了,他们还手搭凉棚望着。

8月10日这天晚上,新立村的每家每户都在议论着毛泽东来视察的事,都说,毛主席满面红光,走起路来可壮哩……

而村干部们,则在琢磨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一个个展台看过来，除了感慨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他认定，有了粮和钢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8月12日，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前夕，馆内人来人往，忙碌紧张。原来，毛泽东将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陪同，到这里参观。

晚上8点多钟，毛泽东等到达的时候，展览大厅已经灯火通明。讲解员、有关技术发明人都已各自到位，馆内展出的几百种产品，也秩序井然地陈列在展台。迈开技术发明大步，敢想敢干，力争上游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贴得随处可见。全国上下都企望着技术革新也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首先参观的是“东风馆”。在天津拖拉机厂的热轧齿轮前，刘树英厂长告诉他，这是一项新技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就能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倍到50倍，而且加工余量小，可以节省25%的钢材。

在国产矽胶的展览台前，21岁的研究发明人、青年工人孙守纲激动地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他得知这种硅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同类产品时，毛泽东赞扬说，好！

“东风馆”内的许多展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无梭织布机、电火花机床、七头绕线机等等，他都驻足询问细看。当他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汽筒质量超过美国”时，毛泽东笑着说：“汽筒也在赶？”

讲解员向毛泽东介绍，这种国产汽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接着道：“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再去看重工业、机电工业馆，天津钢厂总工程师向毛泽东介绍了转炉炼矽钢的情况。一般说来，只有电炉炼矽钢，而转炉炼法则工人们敢想敢干的成果。毛泽东看到天津用土法轧制的矽钢片，高兴地说：“你们都能制造了。”

随同参观的人们怕毛泽东走累了，请他进化工馆旁边的小屋里坐下休息喝水。毛泽东一手端茶，一面感慨道：看来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一个人都要精通几门，精通两门、三门、四门、五门，精通十门就比较困难了。

休息之后，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馆。

在化工馆，毛泽东对展出的玻璃布、人造革以及用人造革制成的雨衣、皮包、短大衣、皮鞋等产品，都有兴趣。一幅红白灯光相映的玻璃画版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海水取宝”4个字，下列从海水中取出的盐、纯碱、烧碱等产品的名字。讲解员说，海水里东西很多，永利久大沽厂今年准备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镁、金属钠等多种产品。毛泽东笑了，道：海水里有那么多金属，将来缺少金属，你们从海里取就行了。

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要数纺织和毛麻丝工业馆和手工业馆，各种鲜艳的花布、丝织品、毛毯毛呢，收音机、乐器，都布置得很漂亮。

毛泽东顺着展台走，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

毛泽东问“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展架旁边，说“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毛泽东说。

梁树楷解释说“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临走，毛泽东再次同梁树楷握手。

在手工业馆，机身用木头做的土造车床引起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还有兴趣地试听了聋哑教话器。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大家再次请毛泽东休息。这次在休息室，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

毛泽东讲：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接着，他又问：“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来？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三年怎么样？”

刘子厚道，现在开始向独立方向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毛泽东关心到专区、县的地方工业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其他地区上山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对天津工业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也很关心，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休息后，毛泽东到轻工业馆接着参观。

“你们好东西多得很啊！”他面对放着各种彩花的口杯、花瓶和茶盘的玻璃器皿展台赞叹道。

讲解员告诉他，有一种钢化玻璃，不怕摔也不怕炸。说着，拿起一个稍厚的玻璃杯，从1米多高的案子上扔到地板上。当啷一声响动，真的没有破！毛泽东看后连连点头。

再往前走，毛泽东仔细看了棉籽综合利用与造纸总厂多种产品经营的图表，并仔细询问制造过程。讲解员说，一种原料和一个工厂都可以制造出多种产品。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那好啊，我不反对。”

夜里11点，毛泽东结束了在展览会的三个小时的参观。

### 三问张美珍，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构想通过校办工厂的方法来实现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理想

8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天津参观了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到南大的时间是上午10时。在南大校长、党委书记和一些同学的陪同簇拥下，毛泽东参观了几个校办工厂：化学系的“敌百虫工厂”、“离子交换剂工厂”和“硝酸钍工厂”。

11时，毛泽东到天津大学。一下车，他就在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元之陪同下，被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迎进党委办公室。

学校负责人首先向毛泽东汇报学校的情况，主要是有关勤工俭学方面的。他说：这个学校已经有98%的同学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个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听了点头道：这样很好，本来先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

他还举例道：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先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

毛泽东又问天津市委负责人：“天津的中学有没有勤工俭学？”

这位负责人回答说：“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60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这时，楼前的广场上聚集起近万人。大家高呼、鼓掌，欢声雷动。声音传进办公室，打断了这里的谈话。毛泽东站起身，走到窗口，向大家挥



手致意，窗下随之再次涌起一片欢腾，本来就激动的青年学生此时更是按捺不住了。

好一会儿，毛泽东才回到座位前，继续听汇报。省委负责人说道，前几天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工作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一个月。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开的，会上贴出了2万张大字报。他还说，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使现在30岁以下的人，在那时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1958年8月15日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确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方针，提出全国在3年到5年内基本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和15年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刘子厚所谈的河北省教育工作会议，就是为了贯彻这个草案精神而开的。

毛泽东听罢，说：“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你们想得更好。”

市委负责人在边上说，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四所高等学校，每县将办起一所综合大学。

毛泽东说：“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省长又说，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好啊！工厂就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学生也是工人农民，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毛泽东描绘着他的教育构想。

谈起校办工厂，毛泽东的兴趣就很大。青年时代，他就实验过研讨学问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自修大学计划。今天时代虽不同了，但他一直认为，这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最好形式。现在，他又想起了校办工厂对知识分子的特殊意义。

他说：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教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

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他还讲到,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汇报临近结束,张国藩讲起,现在学生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节献礼,昼夜突击不休息。

毛泽东很关切:“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才好。”

校长和党委书记都表示,要把这种关怀转达给同学们。

将近12点,毛泽东站在门外的平台上,终于与已等待许久的学生们见面。

穿过人群的夹道,毛泽东走进校办机工厂,这里开动着的近百台车床轰轰作响。

毛泽东走近站在机床边的学生王双杰跟前,问他正做什么?

王双杰告诉他,自己正做伞齿轮,这个齿轮,能改变传动方向。毛泽东弯下腰,看机床的运动,问怎样做成齿轮?王双杰告诉主席,床头转动工件也转动,好比两个齿轮咬合,同时刀子运动,刨出槽来形成齿,每刨一次做好一个齿,工件转动一周后就刨成一个齿轮。毛泽东又指着分齿箱问,它是不是慢慢朝前走?王双杰解释要用手把它摇到刀子的前面来刨。站一边的贾震提醒王双杰做一下给毛主席看看。王双杰连忙开始操作,他告诉毛泽东这车子是自动的,干得很快。毛泽东问:“像这样的机床一个人能看几台?”王双杰说,师傅们能看三四台,自己是学生,现在在学徒,只看一台。

毛泽东走到张美珍的机床前停下来。

“你是几年级的学生?”毛泽东的口吻很亲切。

“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

“已经劳动多长时间了?”

“已经四个月了。”

“以后还要劳动多长时间?”

“还要劳动八个月左右,我们计划要劳动一年。”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毛泽东很感兴趣。

贾震这时插话说:“在这一个工种上,他们一般都达到三级工了,学得

好的已经达到了四级工。”

“你们工作时还念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讲课吗？”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

张美珍说：“我们工作时还念些书，工人给我们讲的很多，给了我们很多知识。”

毛泽东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你们是否完全赞成参加劳动？”

张美珍表态道：“我们全体同学都是百分之百地赞成，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

毛泽东的下一句，又带一个问号：“你们认为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好？”

“当然是这样好啦，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又学会了实际技术。”张美珍回答得很干脆。

“是啊！”毛泽东说，“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参观完机工厂、铸工厂，毛泽东被迎进修配车间的办公室休息。他迈过为他准备好的皮椅，拉过一把木椅刚坐下不久，张美珍冲过重重相围的人圈，又找到了这里。

原来，张美珍受车间里同学们的委托，要把他们制造的一种用来检验油漆浓度的仪器“细度计”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很高兴地接过，又拉她一起坐下，问：“你们把这个给了我，你们自己还有吗？”张美珍回答说有。然后，他向张美珍问起同学们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情况，又指着一旁的张国藩和贾震，问她认识不认识？

张美珍笑了：“那是我们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我们整天见面。”毛泽东笑了，大家也笑。

在休息室，毛泽东又一次讲到教师参加劳动的话，说，不仅青年教师，中年教师也应该参加劳动，不要光动嘴，不动手。又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像你们就是学校里有工厂，你们的工厂很大，就和大工厂差不多了。

的确，天津大学那时开办的实习工厂已经有6个车间，280多台机器了，各种设备也相当齐全。

休息片刻，毛泽东去参观1公里以外学校兴建的硫酸厂，于下午1时

多离开天津大学。

毛泽东对天津大学校内办工厂的改革措施很满意。1958年9月8日,他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了这次视察,并予以较高的评价。他说: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做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场教育上的革命,来实现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理想。更何况,他自己就是一个不信书本之“邪”的人。

毛泽东要去正阳春饭馆吃顿便饭，  
不料饭没吃好，又重演了一幕“下  
不了的黄鹤楼”。清扫现场，鞋帽  
钢笔收了七筐半

毛泽东曾把个人崇拜一分为二：正确的与不正确的。然后他说，正确的个人崇拜是需要的。

作为领袖，难道不希望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吗？

毛泽东也曾对卫士们推心置腹地说，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在万众一辞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矛盾着：时而清醒时而醉，既无法拒绝，又奈何不得，愉快而烦恼。他总想去接近群众，近一些再近一些，而结果往往使他不得不退避三舍。

他有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他自己记得，他的卫士们也忘不了。

1952年毛泽东在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不料仍被一个孩子认出，刹那间引得春游的人人潮动荡。警卫使出浑身的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却把口罩扔在一边，回首挥臂，说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驱车由殷墟进河南安阳古城，路过中山街。途中，他被新华书店的热闹非凡吸引，要冲破“纪律”的约束和普通人一样进去搜寻些古籍。但就在他推开车门，刚低头弯腰迈出一条腿来的时候，围拢来的人群就已经把车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好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眼疾手快，瞬间抢出车伸手把毛泽东已出来一半的身躯重新塞回在车中。“哐当”一声，车门关上了，人也疏散了，毛泽东却生气发了脾气。但脾气尽管发，新华书店到底还是没逛成。

身为人民领袖，耳闻万岁之声，却没有随便逛逛新华书店的自由。

但毛泽东一有机会便想再试一试要回他的一点儿自由。的确，总把他当领袖怎么成？他想有普通人的普通乐趣，哪怕一点点儿。

1958年8月13日。

这一天，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毛泽东提出，要去一家饭馆吃顿便饭。

6年前下不了黄鹤楼的事大伙儿都记忆犹新，但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的事不能不办。

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正阳春饭馆。

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工作就安排好了。为了避免麻烦，没有告诉饭馆用餐客人的身份。

1点半钟，几辆汽车载着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

车上的窗帘拉上了。还算顺利，一路之上并没引起多少人特别的注意。但负责安全保卫的人心里仍忐忑不安：会不会再出现一次黄鹤楼上的情形？

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站在门前，等候客人。听到喇叭响，他一抬头，见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

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了和毛泽东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毛泽东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毛泽东和厨师们攀谈得挺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过得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餐厅吃烤鸭。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他停下来慢慢地念了一遍贴在那里的一幅标语“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来便民。”标语贴了一段时间了，有些发旧。

2点多钟，饭菜上桌。也许天气闷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不料就这一眼，引来了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妇女偏偏就在这会儿正在窗台晒衣服，又偏偏她的眼睛特别尖，只一眼，她就认出对面楼上窗口前站的是毛主席！

她脱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前街后的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到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越来越激动，堵住路口，塞满街道，顿时黑压压一片，交通陷于瘫痪。交通警察无法疏通人群，况且他们自己也多么想一见毛泽东！

卫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上前把窗关好。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开的。

餐厅里毛泽东正与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边吃边谈。

但关着的窗户却挡不住楼下滚雷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震天动地。

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纱窗，推开玻璃，伸出头去向人群致意。这一下，立刻掀起街上的一片狂潮。

等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回到桌前吃饭，不想没吃几口，窗下又有了经久不息的欢呼。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走到邻街的四个窗口，挨个探出头去，向大家招手，向大家鼓掌，来回走了两趟。

毛泽东的情绪激动，他一再挥动着手，呼应着人们的欢呼，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回到桌前，没吃多长时间，毛泽东再次被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牵动走到窗前，如此竟有6次。卫士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呢？

吃完那顿吃了很久的饭，毛泽东和饭店的店员们在一起聊天。毛泽东待人的和蔼态度感动了他们。可不是嘛，每当服务员上一道菜，他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道辛苦。他不用摆上的象牙筷子，而叫人换上普通的竹筷。烤鸭的张师傅找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要请他签个字，他也爽快地挥动钢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这会儿，楼下安静些了。毛泽东把饭店的经理找来，叫他坐在自己身边。



毛泽东问他：“你当了几年经理啦？”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毛泽东问。

“从小学徒，干了 20 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笑着说：“那很好！”并鼓励他，“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楼下的人群却没有散。人多天热，人人汗流浃背，但他们心中的热情如日中升，他们要亲眼见见毛泽东。

动身的时候到了，可门外街上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的，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李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迭声地叫。

李市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

没办法了，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结实的战士奋力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门正对正阳春饭店的门口。

这辆车窄小，容不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可这会儿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卫士和警卫人员们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硬是把他塞进了华沙车。

接着，前面警卫排开路，后面有人推车，左右护卫，一步一步，终于将车推出了人群。

车里，毛泽东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

“走哇，往天祥市场后门看毛主席去呀”，这一天下午，天津市的大街小巷中人们彼此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招呼着。

一位团干部刚从共青团区委开完会，听大家这么一说，拔脚便跑。他到那里时已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中间停着几辆小轿车。他果真看见了车里的毛泽东。他和大家一起唱着跳着，忽然听见身边有位少先队员因为个矮看不见急得直哭。他心一动，把那孩子抱起来，让他骑在脖子上，终于让那孩子看见了毛泽东。

这位团干部和这位少先队员看见的是坐在车里正要离开的毛泽东。

他们来得不算太晚，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钟了。

汽车在人群的夹道中终于徐徐开动，车速也慢慢加快。人们依稀可见毛泽东的手还在向后挥动着，许多人恋恋不舍地跟着跑。

等到团干部把少先队员从肩上放下来，才发现他的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挤丢了一只，找不着了。

小家伙却挺高兴：“叔叔不用找啦！谢谢您让我见着了毛主席。”

“鞋丢了一只，回家你妈妈不说你？”团干部问。

他还在笑：“不会的，妈妈一听说我看见了毛主席，一定十分高兴，哪里还会说我呢！”

是啊。那个时候，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一位叫阎彦的事后描述自己这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心情说：

“人们立着脚尖，仰着脸，看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也举着双手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用了最高的嗓门，但总还觉着自己的声音低。我的嗓子沙哑了，但我还是拼命地喊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出我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挤得紧紧的，真的把身子都挤成像一根‘细麻秆’了，狂呼的人们个个都激动万分，当时每个人的心情我用文字表达不出来……”

的确，说发自内心的爱戴也好，说盲目的个人崇拜也好，那是一段真实的情景。

车上，毛泽东双目微闭，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他在想些什么呢？他是懊恼还是兴奋？是无奈还是愉快？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等群众遗失的零碎物品竟收了7筐半。

车过丰台，毛泽东去看菜地。听到“夜战”两个字，他转身向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8月13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从天津缓缓驶入丰台火车站，这是他8月外出视察的最后一站。

顶着未散的暑气，穿过大片浓绿的菜地，毛泽东由中共北京市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

毛泽东点头：“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喽！”

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1亩4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2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1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喽！”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问道。

田德顺说：“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区委书记王景铭介绍说。

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乡党委书记答道：“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三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已经晚上近8点了，毛泽东还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毛泽东还在打听菜的问题：“1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5.6亿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菜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问。

王景铭说：“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他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

到小屯农业社，毛泽东到四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

往前走，毛泽东问到小麦的产量：“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道：“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有把握。”

毛泽东问：“打每亩产 2000 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他一项一项问到，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

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 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 10 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 2 台拖拉机和 2 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就要再去看一看。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

田岐说：“1 亩地四五十个工。”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他又问，担心人力不够。

田岐道：“社里人多，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明年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翻不过来，我们就夜战。”

听到“夜战”两个字，毛泽东转身向周围的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不算黑，还得干一会儿呢！”有人答话。

毛泽东上车准备离开。大家蜂拥而上，争着再看毛主席。一位 70 多岁的老大爷找人搀着挤到前面来。社主任高声表态：我们一定要实现跃进计划向毛主席报喜。

回到中南海已是夜里 11 点多钟，毛泽东毫无倦意。相反，他两眼灼灼，精神饱满，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卫士长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话里充满了信心和勇气。

夜已深。毛泽东伏案于灯前，批阅文件材料，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做准备。

8 月 4 日从北京出发，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国县，河南的新乡七里营、长葛、商丘；山东历城北垣乡；天津市，最后在 13 日这一天夜里返回北京。4 天后，北戴河会议召开。

## 北戴河会议

1958. 8. 17～8. 30

跃进跃进，一个是粮，一个是钢。

粮食“卫星”早已争相上天。亩产千斤、万斤不稀奇，更有那十几万斤的在后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把人们对产粮的想象力发挥到无限。

对此，毛泽东信吗？未必。但他不会去浇灭这股热情，相反，他要鼓励，因为他相信这股空前的热情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8月初，他就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样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粮食“跃进”了，那么钢铁呢？

8月16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北戴河。一落地，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也许这时的毛泽东感到11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他感到有再推一把，力争完成的必要。因为到7月底，全国钢产量才380万吨。

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的这次扩大会议，提出的重要一项，就是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而工业的中心问题又是钢铁的发展。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1958年钢铁生产比去年增加一倍而奋斗，并规划

到1962年在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钢和其他若干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能接近美国。

会议认为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畅想:“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从此在全国各地展开。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到9月底,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9月3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两天后,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9月5日及8日的三次讲话中,对钢铁产量两年基本赶上英国充满信心,他说:“15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他想到了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以及那些震动世界令人骄傲的胜利。他相信中国贫穷面貌的彻底改观也会和战争的战局一样来那么一个突变。

毛泽东对战争的运筹的确炉火纯青。与其说他会打仗,倒不如说他懂得战争的本质。国务会议召开的时候,台湾海峡的局势正剑拔弩张,扑朔迷离,对此,毛泽东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美国人如果实施了对台湾的占领,那么他就是把自己的脖子套进了绞索里,又把绞索的那一头丢到了中国大陆6亿人民的手中。

然而,深谙战争之道的毛泽东却没有意识到,经济建设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9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又开动了,他会看到些什么呢?



**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  
决议》、《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  
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毛泽东  
决定再下去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1958 年 8 月的上半个月，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河南新乡县、山东历城县、天津市等地视察了一圈之后，来到河北的北戴河海滨。

在这里，从 8 月 17 日至 30 日，他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

对这次会议的议题，毛泽东自己亲笔拟写的就有 17 个，包括：明年（指 1959 年）、五年的经济计划问题；今年铁、钢、铜、铝问题；明年农业问题；明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支援边疆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肥料问题；民兵问题。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以上确定的议题几乎都经过讨论，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与决定，光形成文件的就达 40 个，包括五个方面：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关于农业方面的、关于财贸方面的、关于教育方面的、关于其他方面的。

这其中有一点却十分引人注目。毛泽东所拟的“合作化问题”的议题，做出的相应文件却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 8 月 29 日的会议上通过的，这时，离会议结束只有一天了。

也许这一切，并不令与会者感到意外。尽管“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农村所有制关系不同的两个阶段，但谁都知道，“人民公社”的确是毛泽东心向往之的。1958 年 7 月，陈伯达就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述过毛泽东这样的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

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一句赞誉的话,自毛泽东在8月6日视察河南七里营时亲口道出之后,新华社记者们就让它很快变成了铅字,而且是大号字做标题,十分醒目,这效果也是仍在旅途中的毛泽东所料想不到的。据他的一名卫士如此回忆:那天,在一列专列上,毛泽东的目光触到了那个标题,便以手拍床失声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他转着圈,看几眼报纸,嘀咕几句:“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为此,毛泽东还做过小范围的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我参观时听一位同志汇报中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

的确,光靠记者的大标题,并不能左右形势的发展,巨大的影响力还在毛泽东那里。尽管毛泽东说糟糕,但他所不安的只是未能遵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组织程序。他对人民公社好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于是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做出与通过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个决议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的历程中不可不提。它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并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决议稿亲自做了修改,还在其中加写了足足有四百余字的一段话,要求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设想:“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他还设想了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

这个设想,两年之后,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中又提到过它。不过,他是把它作为自己也曾犯错误的一个例子而言的。他说,他的

错误之一就在于在北戴河决议中把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太快了。他说，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的时间是太快了。

其实，1958年的“大跃进”的发展更甚于这个设想。北戴河会议之后，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就汹涌地冲击着华夏大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对此种“高速度”、“高指标”，毛泽东真的相信吗？他已经决定，再去看看下面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就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随毛泽东一起去北戴河的卫士田云玉揣着刚从书店里买回来的萧三写的书《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去接班。毛泽东正看文件，田云玉为他换上一杯茶水，看看没有什么事了，便退出在走廊里又翻开书。

“看什么书呢？”毛泽东走过来问。看得正入迷的田云玉猛吃一惊，慌慌张张就要把书往兜里揣，无奈毛泽东的手伸了出来。

毛泽东看看书名，飞快地翻了几页，还书给田云玉：“这本书写得基本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田云玉说：“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你也应当有抱负么。你还要多看别的书，不要光看我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都要多看看。”

田云玉表示自己爱看文学和历史书，不喜欢数理化。

毛泽东就说：“光看书也是不行的，还要实践。以后你们要拿出三年时间来学工、学农，还要搞社会调查。”说到这里，毛泽东告诉他，“过几天我要出去视察，你们跟着一块走，要留心搞调查。”

几天之后，毛泽东南下郑州。一路之上，他屡屡问人：“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从社会实践这本大书里，毛泽东想看到些什么呢？

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香。  
一语点破，一片沉默。掰块面包放  
嘴里，毛泽东尝到的是什么味道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后，毛泽东要再下去看一看，走一走。

南下到了河南省。这一天，专列停在郑州。

离郑州不远的荥阳，有一个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在那里。田野中耸立的一座土高炉，就是工作团的人们忙碌着大炼钢铁的地方。男的在钻进钻出地修理炉膛，女的则在一边打下手。十几个人，个个弄得满身满脸的煤黑和炉灰。

忽然一列火车停了下来。大伙正在纳闷不是车站怎么会停车时，只见叶子龙走了下来。这些干部都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一看到叶子龙，心里自然明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事。

果然不错，叶子龙来告诉他们，毛泽东到了郑州，要找他们去开座谈会。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后，想要下去再看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似乎有点儿放心不下。在郑州，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他感到他们一片叫好声中，就是没有反映问题。他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连问了几遍，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毛泽东要找工作团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开会，再问问情况。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很随和，帮他们学文化，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时还当“红娘”牵牵红线。同时，他也经常派他们下去了解自己关心的一些情况，搞些实地的调查研究。这一次，他决心再通过这个办法听听基层的意见。他心里明白，有时光听干部们的汇报不行。

工作团的十几个人放下手里的活，马上随叶子龙上车到郑州宾馆，然

后衣服也没换脸也没洗又坐车到了毛泽东的专列上。坐下不久，毛泽东就带着谭震林、廖鲁言等人走了进来，身后还跟了秘书们，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家还是一片叫好声。这并不一定就是他们存心要搞虚报，那个时候，一股热潮扑面而来，满怀革命激情和冲天干劲的人们，为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谁都会真心实意地全身心投入进去。

毛泽东似乎对这一片叫好声不满足。他盯住了坐在身边不远处的胡秀云，决定单刀直入：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是中央办公厅摄影组的工作人员，和毛泽东平日就挺熟悉。下河南之前的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本《矛盾论》经过菊香书屋之时，正碰上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曾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卫士夸过小胡好学习。这次碰上，他停下脚来和她聊了一会儿。看见她手里的书，便对她说：“你还看这书？我自己还不满意呢，我还想再写一本，写给你们青年人看。”他还告诉小胡说，“学理论不要忘记实践，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实事求是，不然就是教条主义。”

胡秀云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自己下河南参加劳动不就是实践活动么？听到毛泽东问她，她想，或许这是毛泽东在考她呢。

她想了想，然后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听后，并没有罢休，又将了一军：“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听到毛泽东此言，大家都感到意外，这不是有点泼冷水的意思么？毛泽东怎么会这样说话呢？也就是毛泽东这样说，别人则无论如何是出不了口的。心里这样想，大伙儿嘴上还是什么也没说。

年轻的胡秀云听罢，好像受到什么鼓励似的，下面的话想也没想便张口而出：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在座的人很吃惊,看看胡秀云,又看看毛泽东,再看看周围的人,愈加不知说些什么好,便都不吭声。

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脸上的微笑没有褪去。他望住胡秀云,胡秀云这会儿自己好像也刚醒过来般吃惊,这话怎么张嘴就来了?该不该说?

毛泽东转过头,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们,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他的态度挺和蔼,语气平和。

谁也没有回答,谁也不可能在当时回答这个问题。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毛泽东也没有再开口说些什么。

尴尬的气氛中,门忽然开了。有人端着一只盘子进来,上面放着用白面和玉米面和起来烤的面包,说是公共食堂做的,专门送来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尝一尝。

味道的确不错。毛泽东嚼一口问“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送面包的人说是的。

大家都尝了一块,都说味道不错。

毛泽东再掰下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品尝着味道,他没有再说什么。

长江水深流急，却是他最中意的游泳池。他还要把全国的江河都利用起来，让3亿人口都来游。18次击水，对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对于武汉体委游泳指导赵锦清、北京体育学院学员陈嫣屏、四川自贡市第二中学体育教员陈廷兰等人来说，他们体育生涯中最幸运的莫过于1958年几次陪同毛泽东游长江。

“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6亿人口，能不能有3亿人口都来游泳呢？”

一语惊天。毛泽东的这些话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全国的江河都利用起来，3亿人都来游泳！这是何等气魄、浪漫的构想？

这样的问题自然不是赵锦清们都能想、所能回答的。当时，他们三个人手心都捏出了汗，却不知怎么开口。

毛泽东似乎并不等他们开口，他用六个字表达他的自信：“可以！完全可以！”

赵锦清等只是重复：“可以，完全可以。”

但毛泽东意犹未尽：“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要走出游泳池！”

大江大河是他最好的游泳池。

那个时候，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温室里的花朵，是专门用来比喻一类弱者的，带贬意。他们的存在怎么能与风雷激荡相称呢？于是毛泽东鼓励青年人要勇于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去摔打、去锻炼，培养一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和本领。

这是政治的范畴，没有哪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与政治的关系会像中国一样如此紧密，也没有谁会像毛泽东那样把游泳这项体育运动放到政治生活中去。



政治家的毛泽东，挥手之间，便会有千层的巨浪迭起！

有人统计过，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毛泽东曾 18 次到长江中流击水。

## 初次挑战，毛泽东便赢了一个回合

争取到第一次游长江的权利，对毛泽东来说并非易事。

那是 1956 年初夏，毛泽东住在广州的一个小岛上。天气闷热，毛泽东叫来卫士长李银桥，淡淡吩咐一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所有的人都被震动了。游长江？普通人游长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毛泽东！出了事怎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

毛泽东感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护士劝，保健医生劝，不行，便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泽东仍坚持要游。

罗部长较起真来，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

毛泽东则大声地说穿所有谨慎的解释：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十分不安地再做解释：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儿风险也不许有。

习惯于接受挑战，也从来不惧风险的毛泽东显然不爱听这样的话，他冷笑：哪里一点儿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话虽这么说，罗部长还是不松口。

一些有关的负责人又轮番去劝毛泽东。较起劲儿来，毛泽东岂有让步的时候？他一定要赢的。

毛泽东命令警卫一中队的韩队长去实地考察一番。韩队长也不情愿毛泽东去冒这个险，他找些人调查了一番，都说长江风大浪急不能游。韩队长回来便如此一说。

毛泽东沉了脸“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如实地说没有。

毛泽东急了“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别说了！”他转身吩咐卫士找副卫士长孙勇来，指名孙勇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这回下了水，回来对毛泽东说完全没问题，可以游。毛泽东一展双眉，道：“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说完，他又故意找补一句：“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没有任何理由再不让毛泽东游长江了，毛泽东又赢了这一回。

为此，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匆匆回武汉组织有关事宜，让人探水情，选地点。毛泽东这里随后动身从广州往长沙，在5月30日游完湘江后，第二天乘飞机往武汉。胜利了的毛泽东脸上一扫阴霾，谈笑风生。

到武汉当天，毛泽东即乘武康号轮船往武汉长江大桥视察。自1953年汉水铁路工程正式开工以来，武汉长江大桥正在紧张施工当中。武康号经汉阳晴川阁朝江心桥墩而来，穿过二三号墩，接近鹦鹉洲时，又返航下行，再穿越三四号墩。这次巡视，既为了让毛泽东了解水上、岸上的施工情况，也为了能让他熟悉一下游泳的水面环境。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再次豪情大发，他为人们描绘着一幅动人的蓝图：将来长江上修上二三十个桥，黄河上修几十个桥，到处能走。

6月1日，毛泽东初游长江的日子。天气晴朗，骄阳似火。正值汛期的长江格外宽阔，东南风吹处，波光粼粼。被通知随毛泽东游泳的武汉的三位运动员等候已久，他们是王海炬、李健民和吴全福。他们身体素质好，游泳技术强，水上知识丰富，不久以前刚试渡过长江。毛主席这么大了，横渡长江天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心里如此想着，三人都有些紧张。

中午12点钟左右，毛泽东等坐武康轮到大桥8号桥墩附近。放下扶梯，孙勇先下去想扶毛泽东一把。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先挣脱孙勇，又把手一比画，命令道。他悠闲地走下扶梯，笑咪咪地左右端详一会，不慌不忙弯下身子在水里浸一下，然后手一撒，身一跃就到了水里。

毛泽东的泳技令年轻小伙子们都佩服。履大江如平地般，时而奋臂侧游；时而踩水信步于波浪之中；时而仰卧水面，双手枕后凝视万里晴空；有时又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安详地休息。江心，一个浪头打来，毛泽东喝了口水，他笑了：“长江里的水好甜喽！”陪泳的李健民看毛泽东的水面休息

动作做起来很轻松,便也想如法炮制。没想到,刚停止手的动作,腿还没放平,身子便不由分说直往下沉。

快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船上测温的人报告说水温是摄氏 20℃,这样的温度人在水里呆长了会冻得嘴唇发青,也的确有不少人支持不住了上船休息。毛泽东不愿意就此罢休,他说:“还没到汉口呢!”

两个小时过去了,游程近 28 华里。到汉口谔家矶江面,毛泽东上岸。他慢慢弯下腰,捡起已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毛巾毯,又把放在椅子上的呢外套拿开,然后在一张木凳上坐下来,极舒适地享受着阳光。他深邃的目光盯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 再有风吹雨打,已胜似闲庭信步

6月2日,毛泽东第二次横渡长江。这次他提出要从长江上游下水,穿桥墩,游过长江和汉水汇合处。这天,气温较昨天低,风也大了,滚滚长江波涛汹涌。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在汉阳鹦鹉洲尾的江面上更衣下水。到长江与汉江交汇处,大家的心陡地拎起来。这里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流速达每秒3米以上。这个险要地段,本不该选为游泳地点,但毛泽东瞄准了它,又有谁能阻拦呢?

一瞬间,毛泽东已从二三号桥墩穿过。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挥臂有力。在龙王庙江面时,一个大浪打来,却见毛泽东早已顺着水势变成了潜水。一时,只见江水,不见人影。十几秒钟后,他泰然自若地浮出水面。

这一次游泳,又是两个小时,28华里。

6月3日,毛泽东移住东湖宾馆。有人想请他游东湖,他不以为然:长江才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这一天,他再游长江,从汉阳江面下去,穿过桥墩,游到武昌。

一股豪情从胸中升起,荡气回肠。一首《水调歌头·游泳》从此诞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这是沉醉于大自然之中的毛泽东。然而,这位巨人也绝没有忘记和大自然的较量,于是更有——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有——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意犹未尽。直到赶回北京接见外宾前，他还在兴奋之中：“罗部长不让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28里！明年6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

8月，毛泽东又在北戴河挑了个风高浪急的天气下海游泳。五六米高的大浪扑来，把人推出去十几米远。

“好厉害噢！”毛泽东爬起来，站定，又一挥手：“再下去！”

又来一个浪，又被推出好远。再下！三名卫士在后，两名拥卫左右，毛泽东向大海深处游去。浪打浪，进了退，退了进，终于大家都摸到了海的脾气：遇起波式的浪，头一抬胸一挺一跃而过，遇从头上扣下来的浪，就往水里一钻从海浪后边跃出。登峰落谷，毛泽东到了防鲨网那里。

“再往外游就危险了！”卫士们说。

毛泽东一笑：“不要紧，鲨鱼来了就打嘛！”

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也对他的人民充满了信心。

这种信心是由衷的：在毛泽东6月三次游长江之后，20日，武汉市举行了第一届名为“支援解放台湾”的横渡长江游泳竞赛活动。毛泽东听了有关的汇报，很高兴，关心地说：“好呀，只是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要淹死一个人。”他更看重的，是这种活动以外所展现的政治意义和力量。

## 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泽东第二年6月没能如他所言再去长江。他的视线关注着国内两个阶级的较量，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附在无产阶级皮上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较量的表现形式便是“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的青岛，凉爽的海风吹不散浓浓的火药味。毛泽东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不仅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政治建设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凿凿断言：“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时，报纸连日刊载批判所

谓“极右分子”的文章，“右派”人数激增，党内人员同样不能幸免，而且还要钓出“大鱼”。

随着斗争形势的顺利发展，9月上旬，毛泽东终于抽出身来到武汉，两次畅游长江。

9月5日这一天，已是秋风初起。4级风紧催江浪，拍岸有声，水温是摄氏27℃。毛泽东乘坐轮渡15号在即将竣工的长江大桥5号桥墩处下水。他游得很从容，侧泳潜泳交替而行，劈波斩浪，神情自如。

一个多小时之后，到了汉口四维路附近江面，护游的人扶毛泽东上软梯。一阵江风吹来，身上直打哆嗦，这位护游人说，今天风大，吹在身上真有些冷呢！毛泽东接过话头道：“水里是被窝，暖和得很。”

泳后，毛泽东由长江一路阐发下去：“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要把世界看稊米。这，或许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会具备如此的胸襟吧？那么，此时在毛泽东心目中很大而且他信心十足地要与之较量的又是什么呢？

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对八大确定的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并坚持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毛泽东迎来了一点也不亚于长江风浪的又一个挑战。他相信，和争取第一次游长江的权利一样，自己会胜利。

## 怎么还没有人赶上吴传玉？

1958年，正是“大跃进”运动高潮迭起的年代。9月，毛泽东在武汉，除东湖外，8次游长江。

那个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最响亮，“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语言最时髦。而在毛泽东那里，要利用全国的江河让3亿人口都来游泳的设想，又怎样启发着人们本来已经很丰富的想象！

毛泽东没有忘记体育的跃进，他和陪泳运动员的谈话充分表现了他心中的那份期望，这种期望是与一个民族的站立相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他问赵锦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赵锦清说自己是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去匈牙利等国学习后，现在担任武汉体委游泳指导，工作上遇到不少困难。

毛泽东说：“工作嘛，肯定是有困难的，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是不那么容易。你终身做这个工作高兴吗？”

赵锦清忙表态说很高兴。

毛泽东点头。问起陈嫣屏：“你们认识不认识穆祥雄、戚烈云、郑凤荣、容国团（他们都是些著名的运动员）？”

陈嫣屏回答说我们是一起学习的。

毛泽东想了想，又问：“你们知道吴传玉吗？”

吴传玉在1955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创造过100米仰泳的世界纪录。对此，毛泽东不仅记在心里，而且为这一创举而骄傲：吴传玉为中国人争了气嘛！

但今天问起吴传玉，毛泽东更关心这样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人赶上了他？”

运动员们都低了头，没有人能做到。

毛泽东遗憾地屈指算着：“55年、56年、57年、58年，三年多了，怎么还没有人赶上他呢？”他希望能再出许许多多的吴传玉。

## 挥手之间千层浪

毛泽东游长江，早已超出了健身运动意义的本身。迎风浪，游逆水，既是毛泽东性格的外化，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最好展露，更是一种政治力量的象征，他具有的感召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震颤整个中国大地。长江之于毛泽东，到底意味着什么？

1961年和196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因内忧外患陷入困境亟待扭转的年份。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6月，毛泽东先后共4次游长江。这期间，他曾问身边陪同的有关负责人：武汉青少年的游泳活动开展得怎



样？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游泳吗？

1966年7月16日，在毛泽东从“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向江青发出那封表示自己愿当钟馗以打“鬼”的信之后8天，他又以73岁的高龄畅游正值汛期的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1小时零5分。他跟一位第二次随他游长江的青年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看到一个姑娘只会侧泳，他便教她仰泳，同时鼓励道：“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呢。”

毛泽东讲的是普通的道理，毛泽东也如常人般需要划臂蹬腿才能在水中前行。但当时，更多的人眼里看见的是已走上“神坛”的毛泽东。

也在这一天，他乘坐快艇，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检阅了武汉5000游泳大军。那是怎样壮观的场面啊！队前快艇开道，泳手们竞相向前。红旗漫卷，人头攒动，一时红透江面。毛泽东快艇过处，“万岁”的口号声，一片高于一片，很多的人情不自禁地不顾危险，在江中欢呼跳跃。尤其是由200名8至12岁小学生组成的少年儿童队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簇拥着的是一幅毛泽东的语录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掩不住激动的心情，毛泽东高呼一声：少年们，你们好！

回应他的则是压过涛声水声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人民万岁！”毛泽东挥起巨人的手臂。

一反过去很少公开报道的惯例，10天之后，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情景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喜讯”做了报道，并配发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降临了，其势锐不可当，翻江倒海，激起千层浪。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游长江。但从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每逢7月16日，全国各地都要组织群众性的横渡江湖的活动以示纪念。

是不是从此以后毛泽东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呢？



初到武汉，毛泽东就去看小高炉。  
他对王任重说：“你看要不要农业  
社开个庆祝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喝  
点酒，吃点肉……”

在武昌积玉桥南面的凤凰山下，有一个用红砖新砌的小方烟囱在冒烟，烟囱下面，有一个七八米高的炉子在炼铁。这个小高炉是武昌第一纱厂新建的，是1958年“大跃进”全党全民大办钢铁高潮中兴建起来的千千万万个小高炉中的一个。它动工在7月15日，9月7日上午流出第一炉铁水。

4天之后，即9月11日，毛泽东专门到此视察，这是来武汉后他第一个视察的地方。

武汉素有火炉之称，即使秋天也闷热异常。这天的天气却分外的好，秋高气爽，空气清新。

下午3时多，毛泽东在王任重、中共武汉市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陪同下坐车来到小高炉前，第一纱厂党委书记兼经理胡伯琴随行在侧。

鼓风机旁，毛泽东首先向正在检查机器的机电工场主任程汉卿询问机器、设备的情况，听取胡伯琴关于小高炉情况的介绍。

“这个小高炉是别人做的，还是自己做的？”王任重问道。

“是自己做的。”胡伯琴答道。

毛泽东说：“对，我昨天看到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了，知道你们修建小高炉克服了不少困难。”

毛泽东指的文章，就是胡伯琴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怎样使小高炉正常出铁》一文。毛泽东走到哪里，都要找来当地的报纸看，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昨天他刚到武汉，也马上要来了报纸，其中就看到了胡伯琴的文章。当时，自办土高炉、小高炉，全民上下齐动手大炼钢铁，正在全国普遍推广。如何解决建小高炉中出现的一些思想与技术问题，是毛泽东比较关心的。胡伯琴在文章中谈到了第一纱厂克服困难建炉的经验：全

厂没有一个搞过钢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就派人到黄石、鄂城、武钢去学习，请武昌钢校的师生来帮忙；没有耐火材料，不伸手向上要，而是把厂里暂时不用的老九号锅炉的烟囱通道拆了；没有鼓风机，就让原来只搞修理的机电部门自己制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颇为称赞。也许正是这篇文章激发了他要到这个小高炉看一看的兴趣？

“不简单啊！纺织厂也能炼铁。”陪同毛泽东一路视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在一边也称赞道。

毛泽东说：“纱厂办钢铁，一个企业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可以兼办别的工业和事业，要多样化，多样化好处很多。”

大家也都交口称赞纱厂炼铁这件事办得好。

有人过来报告，今天的第八次铁马上就要出炉了，毛泽东当即提出要看看出铁的情况。于是胡伯琴引他走到小高炉左边炉口出铁处，在一个做得很整齐的盛铁水的砂模子前站定。

值班人员已经把铁口旁边的泥巴挖去，接下来的事就要拿锤子开铁口。

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

开铁口是炉前工最重要的操作，也是最难的，有时打铁口，一打一两个钟点儿都打不开，最快也得一刻钟。掌钎子的工人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心有点儿慌，手似乎也不太听使唤。另外一个工人见状赶紧上前帮他一把。

不知怎么，今天开铁口的工作竟特别顺利，只打了十来下，铁口就开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开口很快，只花了5分钟时间。”毛泽东又低头看看表说。

话音刚落，通红的铁水沿着沟槽顺畅地流向盛铁水的模子，散发着逼人的灼热。大家的脸都泛着红光。

“你们武汉有5个纱厂吧？”毛泽东问。

胡伯琴说是。

“都在办小高炉没有？”

“都办了小高炉，还要办一些土高炉。他们钢铁办得好，纱厂生产也在‘大跃进’。”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宋侃夫答道。

“好！”毛泽东点头。

铁水快要流完了，炉口内流出一些铁渣，毛泽东指着它：“这是渣子吗？”

“是渣子。”胡伯琴说。

“里边有没有铁？”毛泽东又问。

“没有。”

毛泽东说：“还是会有一点儿吧！”

铁渣流完，出铁口开始喷火。毛泽东离开炉前，问了矿石原料的问题，又问纺织厂在哪里，他说：“下次再来，看看你们厂。”

小高炉边的工人们用掌声送毛泽东上汽车，整个视察过程仅用了一刻钟的时间。

在毛泽东视察的几天后，一纱厂就提出了“跃进”的新口号：“土洋并举是方向，全体职工上战场，再建土炉十五座，保证座座铁水流，洋炉产量要跃进，土炉也要逞英豪；本周洋炉达六吨，下周保证达八吨；达到八吨还不休，争取做到十出头；要和全市大竞赛，国庆节前放卫星。”

对于毛泽东的这次视察，一直陪同的王任重在后来的题为《毛主席在湖北》的札记中，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在乘车往小高炉的途中，毛泽东和王任重谈起了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和农民的苦干精神。

毛泽东问他：“你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庆祝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儿肉，喝点儿酒……”

王任重说：“好，就在国庆节那一天，庆祝国庆，庆祝丰收。”毛泽东又说：“那么要发个指示，不然会有人说是铺张浪费。”

他是真心地为眼前所看见的成就而喜悦，真心地替千百万农民着想。

王任重在札记中还提到，毛泽东告诉过他：“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

但后来的情况却表明，形势的发展违背了毛泽东这个良好的愿望。天灾人祸，带来的是三年紧了又紧裤腰带的日子。这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而这也就是那个年代的悲剧所在。

炼焦厂、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  
砂钢厂……校园工厂遍设。学生  
当了厂长，毛泽东看得高兴，但什  
么叫活性氧化铝？却没有人能答  
得出来

大学办工厂，大学生当工人，亦工亦学，这是武汉大学教学改革运动中的具体实践。到1958年9月，据说武汉大学已经办起100多个工厂，其中有98个工厂正式投入生产。

9月12日，毛泽东要到这里来视察。

早在8月视察天津大学的时候，毛泽东就指示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又说：几千年来，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因此，对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以及校办工厂的情况，毛泽东十分关心，并且要眼见为实。

毛泽东在12日下午接见了武汉部队的400多名代表后，赶到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校园，已是晚上7点多钟。校园的学生们已经激动万分，望眼欲穿地等了一整天了。特别是那些被指定到时候要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同学，更是紧张而不安。

毛泽东终于到达，由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等陪同，到了珞珈山北麓的化学系、物理系的工厂区，这里设有炼焦厂、空气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卡普隆厂、炼铜厂、砂钢厂等几十个厂。

毛泽东一露面，掌声、欢呼声就响成一片，排队欢迎的人们争相拥上

前来同他握手。张勃川副校长向毛泽东介绍化学系总支书记罗鸿运。毛泽东笑着说：“好啊！我是来看你们工厂的。你们有多少个工厂？”罗鸿运回答：“化学系共有 30 多个工厂，请主席看看。”毛泽东点头。

最先到的是炼焦厂。由学生担任副厂长之职的盛蓉生上前迎接毛泽东，并代表厂里的同学向毛泽东问好。盛蓉生激动得眼泪一个劲儿地淌，把本来应该讲的大学生把劳动生产、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三者结合起来的好处的那一段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只是愣愣地盯着毛泽东看，直到毛泽东问他话，他才猛醒过来。

毛泽东问他：“你这个工厂有多少人？”

“有 30 多个人。”盛蓉生赶紧回答。

“你们是一班干吗？”

“是分两班干。”

“那不是要停火吗？”毛泽东问道。

“不停火。”盛蓉生似乎没太明白。

“不停火？那一班不是要工作 12 个小时吗？”未等回答，毛泽东又追问一句，“是不是要工作 12 个小时呢？”

盛蓉生这才解释：“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正式生产以后是要做些调整的。”毛泽东听了点点头，有些放心。看起来，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学生们劳动好、学习好，生活也要好。

看到身边都是学生，毛泽东问道：“你们都是学生吗？有没有技术工人呢？”

盛蓉生告诉毛泽东：“有一位煤气工人是我们的厂长，其余都是化学系的同学。”

“技术工人是从哪里请来的呢？”毛泽东是想问技术指导方面的事。

“是我们化学系的煤气工人。”盛蓉生又答。

“哦。”毛泽东听后，又在厂里转了转，然后离开炼焦厂朝外走去。

走进电池厂，徐茜莉受命代表这个厂的全体同学向毛泽东问好。徐茜莉比较镇静，她一边向毛泽东介绍厂的情况，一边引着他按预定的参观

路线走。徐茜莉介绍说,这个电池厂是白手起家的,经过全体同学的大胆设想,大胆革新,利用废物造出了土机器,许多部件是用木头代替钢铁,产品质量却完全合乎国内先进水平。毛泽东高兴地笑道,“那好哇!完全合规格,合乎国内先进水平。”

说着,便走到了那个正操作中的土制压炭包机前。学生告诉主席,这是他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不花1分钱,用木料代替钢铁做成的。毛泽东在这里停了下来,看得很仔细。接着毛泽东问:“你们这个厂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徐茜莉答:“有三年级的老同学,也有一年级的新同学。”她正要继续讲下去,忽然看见毛泽东和王任重正顺手拿起他们的一节电池产品在观看。

只见毛泽东把商标念了一遍,不由问道:“汉口电池厂就是你们的电池厂吗?”

徐茜莉脸红了,她答道:“不,不,我们现在是为他们加工。不过,我们马上就要用自己的商标了。”听了她的话,毛泽东点点头。

在一帮青年的簇拥下,毛泽东走出电池厂到了硫酸厂。

正在向炉灶加煤球的工人赵春珍、蒋国礼见到毛泽东,嘴里叫着“毛主席”,脚下跑得飞快,过来要握手。学生厂长方佑龄这时也不知从哪里急急忙忙赶来,愣头愣脑张口就喊“毛主席万岁”,引得厂房里一片口号声。这个厂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酸气味,块矿炉正喷吐着一股股热浪。毛泽东走到炉前,大概是嫌热,便脱下了银灰色的上装,只穿一件白衬衣听方佑龄汇报生产情况。他还弯下腰,从洞孔里看炉内的火焰,脸上沁出了汗珠。

一转脸,毛泽东注意到方佑龄的衣着。只见他上身的背心已被汗水油垢染成了黄灰色,下身的蓝色短裤也变成了剃刀布般。毛泽东见状,伸手抚摸他的头,亲切风趣地夸奖道:“像个工人的样子了。”这使方佑龄和周围的同学都很感慨。方佑龄后来为了留住这一难忘的记忆,把这件旧背心洗干净后专门珍藏了起来。

经过硅胶厂锅炉房时,毛泽东看到里边光线挺暗,便关切地说:“为什

么光线这么暗呢？可不要砸着手啊！”

硅胶厂一部分学生此时正在门前洗硅胶。毛泽东走近，问：“这是硅胶吗？为什么要洗呢？”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怎么回答，只恨自己嘴笨，只会说：“是的，要洗。”但为什么要洗？谁也说不上来，这时刘仰峤上前做了解释。

在硅胶房，小个子的硅胶厂厂长谢能咏，操着湘潭话向毛泽东汇报说，这是同学们自己盖起来的厂房，没用一个工人。毛泽东在这里听见家乡话，感到十分亲切。他问这个小姑娘：“你是几年级学生，厂里有多少人？”

谢能咏说：“我是二年级，这个工厂共有 26 个人。”

毛泽东不由得用眼打量着这个个子不高年纪不大的湘潭姑娘，逗趣说：“26 个人，你怎么管得了？”

谢能咏回答得很得体：“全凭同学们一起干。有事同大家商量，发挥大家的力量。”

毛泽东很满意这个回答，连说：“对！对！”接着，他仔细观看了各种硅胶样品，并问什么叫吸附矽胶，什么叫防潮矽胶。在看用土法生产硅胶时，谢能咏告诉毛泽东：“现在正在大搞技术革新，逐步实现机械化。”毛泽东问：“用洋办法吗？”谢能咏答：“是土洋结合的。”毛泽东赞道：“土洋结合，对！对！”

硅胶厂门旁一幅用灯泡装饰的化学系工厂系统分布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对站在一边的讲解员曾莉蓉说：“请你讲一讲。”曾莉蓉讲了一遍。毛泽东一边听，一边用手指着图念着工厂的名字：无机工厂、分析工厂……并提出许多问题：分析工厂，为什么分析成为一个工厂？水玻璃厂都做些什么？

当曾莉蓉介绍到活性氧化铝厂时，毛泽东问：“什么叫活性氧化铝？与普通氧化铝有没有区别？”

曾莉蓉答：“都是氧化铝。”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又问：“那为什么叫活性？”

讲解员窘住了。好一会儿，她竟犹豫地说道，活性就是活泼的意思。

显然文不对题。谢能咏挤上来，搜肠刮肚般勉强地说了几句。毛泽



东听了，笑着说：“你讲了这些，我还是不懂。”

临走时，毛泽东向谢能咏等同学说：“像活性氧化铝的问题都没有答出来，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学好。以后要好好学习，钻研知识。”

在走向卡普隆厂的路上，毛泽东问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罗鸿运：“你们办这么多工厂，你是内行还是外行？”罗鸿运答：“我是外行。”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外行要变成内行！”罗鸿运向毛泽东表示：“我一定要变成内行！”

卡普隆厂里传来叮叮咚咚的木工声音。毛泽东走进来时，厂长周发昱内心有些慌张和不安，因为她拿不出卡普隆来给毛主席看。她的前任厂长是个教员，他认为从科学原理推论学生试制卡普隆会引起危险。后来这位教员不当厂长了，学生们才动手试验，因此现在拿不出成品来。对此，毛泽东并不在意，他鼓励正在钉一个木架子的周蒸萱同学，称赞她的手艺，这使周发昱感到轻松了许多。

时间已经快8点了，王任重向毛泽东建议去吃晚饭，但毛泽东坚持要把物理系的炼铜厂和矽钢片厂看完。

二年级学生、炼铜厂火法炼铜组组长曾广培，看见十米开外，毛主席正朝这边走来，兴奋地跳起来：“来了！来了！”待毛泽东走到他跟前时，他反倒拘谨地很不自然地立正：“毛主席您好！”毛泽东看着这个只到自己肩膀的学生，笑着伸出了手。

参观时，毛泽东指着烈火熊熊的炉子问道：“这是干什么的？”

曾广培介绍说：“我们是物理系炼铜厂的一部分，火法炼精铜小组。这个炉子是用来炼精铜的。”

毛泽东问：“那么你们炼铜厂还有哪几个部分？”

曾广培答：“我们炼铜厂还有水法炼粗铜和电解炼纯铜两个小组。”

毛泽东这时看看周围的同学，像出考题般问道：“水法炼铜的原理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这时正站在炉边，张副校长见状，忙提醒曾广培：边走边讲，边走边讲。曾广培陪毛泽东一边朝前走，一边答：“水法炼铜的原理是置换反应原理，用矿石与稀硫酸起作用，生成硫酸铜，然后加铁屑，铜就

被置换出来了。”

毛泽东挺欣赏：“这个办法很好呀，水炼组在什么地方，可以去看看吗？”曾广培说，水炼组现在在红安与当地政府正合作建工厂，不在学校。毛泽东有些惋惜的样子。

在反射炉旁，毛泽东站住了，问：“这就是炼精铜吗？用什么来炼呢？”曾广培告之用粗铜和废铜来炼。毛泽东又问：“粗铜含铜量多少？精铜含铜量多少？”曾广培答：“粗铜为80%，经过精炼以后达到97%~99%。”毛泽东有些惊讶：“由80%炼到99%那真不容易。”这时，曾广培又告诉毛泽东说：“我们是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和好几次失败的考验，在党总支的领导与支持下苦干出来的。”

毛泽东勉励说：“好哇，青年人就是要斗争，要经得起考验，要苦干，要巧干。”

毛泽东还想去电解炼铜组看看。曾广培告诉他，电解组还没有生产，只做了实验。他又问实验室在什么地方？曾广培说，在图书馆侧面文学院普通物理实验室。毛泽东有些失望：“哦！原来也不在这里。”

前面不远就是一座炉子。毛泽东问那是干什么的。曾广培道，那是炼矽钢的。因为学校大搞钢铁生产，需要制造马达用的矽钢片，那边正在赶炼矽钢。毛泽东问：“这炉子也是你们管理吗？”曾广培说，这是另外一个厂了。

毛泽东在矽钢片厂停留片刻，便离开工厂区。

路上，刘仰峤向毛泽东汇报说，学校大办工厂，半工半读是必然趋势，化学系的学生们纷纷要求半工半读。毛泽东表示态度说，武汉大学的积极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大办工厂这种做法很好。学生们要求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

刘仰峤又谈到，学生们采取集体创作和到实际中广泛进行访问，与工程师、工人相结合的方法，编出了很好的教材。

毛泽东听了，很注意，他问：“怎么个编法？教员参不参加？”

刘仰峤答道，是教员、学生分头编写，然后评比。教员编的教材往往不如学生编得好。

毛泽东问：“教员编的东西一点儿不可取吗？”

刘仰峤说：“教员编的教材有可取的东西都被采用了。”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又指示说，在教学改革中要注意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晚上8点钟，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的大操场前，与等在这里的武汉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武汉水利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四个院校的13000多师生们见面。

当他走上行政大楼的台阶向全体人员举手答礼时，满场爆出滚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珞珈山几乎被晃动了。

这一天晚上，武大的许多人没有睡觉，他们自豪地说：我们的工厂是毛主席来过的，我们的大学是毛主席到过的。在我们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在已经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再回首，那些当年活跃在校办工厂里的学生，又会有怎样的一番感想？

毛泽东关注下面对钢铁事业有没有信心,并表示:“三顾茅庐也要看到出铁。”出铁看到了,出焦也看到了,面对苏联专家的宏论,他却表现得平静而客气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钢的年产指标达到1070万吨,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后,毛泽东心中就时刻惦念着钢铁的生产。9月10日,在到达武汉的当天,他专门听取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全省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在武汉、黄石分别视察一批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和武昌第一纱厂的小高炉。

到武汉钢铁公司视察是在9月13日。

那天下午2时许,毛泽东由王任重等陪同从蒋家墩轮渡码头上岸。刚看到前面有一片楼房,他就问:“这是你们的住宅吗?”他的意思是这一片是不是武钢的住宅区?

王任重说:“是的。就是离厂远了一些,以后建厂时要注意改。”

在此迎接毛泽东的武钢公司总经理李一清这时走上前补充说:“我们已经搬到施工现场去了,这里改成了工人和家属宿舍。”

毛泽东点头,一行人先后上了汽车,往厂区驰去。

在车上,毛泽东问李一清:“你们对钢铁事业有没有信心?”这是他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牵涉到这一年和明年钢的高指标能否完成。

李一清道:“在整风双反以后,群众性的创造很多,出现了很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他表示,群众和自己一样对搞好钢铁事业有坚强的信心。他还告诉毛泽东,“现在大搞钢铁,耐火材料需要很多,我们的耐火材料也上马了。”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那好!”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李一清答：“现在已有 65000 人，我们还担负着支援其他地方的任务。”

毛泽东说：“对，应该这样，力量发展了应当支援别人，要有协作精神。”顿了顿，他又说，“你们办公社的情况怎样？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工农兵商学都要搞一点儿。”

王任重说：“工业有了，商业也有了，学，有技术学校，兵也好办，就是农业没有，可以划一些合作社进来。”

毛泽东点头：“应该全面些。”

不一会儿，车开到总经理办公室。大家请主席先下去休息一下。这是一幢小平房，几把藤椅，几部电话，显得拥挤而简陋。

毛泽东一坐下，便问：“什么时候出铁？”

副总经理韩宁夫看看表，说 3 点左右可以出铁，今天看到出铁还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道：“好哇！今天出不了铁我明天再来看，明天出不了后天再来，三顾茅庐也要看到出铁。”

离出铁还有段时间。武钢负责人抽空汇报厂里的基本情况。

当讲到矿石是从铁山那边供应来时，毛泽东问道：“铁山的矿石怎么样？”

他听说矿里含有千分之五的铜，还有锰等金属，矿质很好，便风趣地说：“铜也含得不少，你们可以叫‘钢铜’公司了！”

韩宁夫说：“我们自己现在还没炼铜，现在是交大冶冶炼厂炼。”

毛泽东又问到炼焦化工厂的生产：“焦化厂生产多少品种？回收不回收？”

韩宁夫答：“我们现在生产 11 种，其他 180 种不在这里回收。”韩宁夫讲到，回收的 11 种里有萘、硫铵等。

毛泽东说：“硫铵（可以做化肥用）你们可以多生产一些。”

韩宁夫说：“我们第一个焦炉一天产 10 吨，将来要提高到 20 吨。”

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联合企业。”

他听韩宁夫讲将要去看出铁的1号高炉有70多米高,12米直径粗,日产2000多吨生铁时,满意地说:“你们这跟一般的高炉不同,应该叫大大高炉。”

他夸韩宁夫说:“你成了专家啦!”

韩宁夫笑着道:“我只是在建设中学了一点儿常识。主席再问几个为什么,我就答不出来了。”

正说着,有人匆匆来报告说,1号高炉快出铁了。大家便起身朝那边走去。

听说毛主席要来看出铁,许多工人群众都聚拢来,足足有上千人,“毛主席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毛泽东被人流簇拥着,由干部们在前开路,攀上高炉炉台。回过身来,他满含笑意地凭着前沿的铁栏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炉台中部,毛泽东接见了武钢的职工代表,他们都是被评为劳动模范和红旗手的工人。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向他们道辛苦,称赞他们的工作成绩,鼓励他们再立新功。

在炉工休息室的平台上坐下来,毛泽东关心高炉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各种设备是不是全是国内制造的?”

韩宁夫回答说:“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一些主要设备是苏联供给的,像秤量车、主卷扬机等。这样大的秤量车,在苏联也还是‘头生子’哩,我们只用三天三夜就安装好了。”毛泽东听了,只点头不言语。

这时,帮助武钢建设的苏联专家巴杜洛夫、武钢设计总负责人格里高里扬、地质学家波利申和武汉地区苏联专家代理党委书记斯维里多洛夫等被引见给毛泽东。

专家组组长握住毛泽东的手,寒暄说:“1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是一个胜利,拿这个胜利来问候毛主席。”

毛泽东表示感谢之意。

巴杜洛夫道:“帝国主义代言人说武钢1号高炉在1958年内出不了铁,但是我们今天出铁了。这是对帝国主义政治上的一个打击!”

毛泽东客气地说:“这是你们的帮助。”

巴杜洛夫又说：“这个高炉是亚洲最大的高炉，像这样由自己供给焦炭的大高炉，能够在动工后的第二个年头投入生产，是世界最高的纪录！”他说得挺激动，语气高亢。

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一贯看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此时是不是感到有些伤自尊心？落后的中国，落后的工业，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有时甚至是不平等的帮助来发展，这对极其看重民族尊严的毛泽东，有着不得不为之的无奈在里边吧？

巴杜洛夫还在高谈阔论，蛮有兴趣地介绍高炉这高炉那，说：“3号高炉比这个炉子大。”

毛泽东问：“第4号呢？”

巴杜洛夫说：“4号又比3号大。”又道，“武钢是个非常大的钢铁厂。武钢要建设8个500吨的平炉，而这样大的平炉，全世界只苏联有三个，美国有两个。”

毛泽东点点头。

巴杜洛夫还在兴头上一个劲儿地赞扬中国工人的干劲：“中国工人和干部同志的干劲很大！由于有了大的革命干劲，才取得了这种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又一次客气地表态：“这是中苏两国合作的成果。”

专家们纷纷表态：“我们很愿意和中国人民合作。如果材料更充分的话，在工人们这样足的干劲之下，2号高炉只需五个月就能够建成投入生产。”

毛泽东像是对别人又像对自己说道：“平地起家嘛，什么都感到缺乏，以后就好了。”

这时，炉前工用6瓶氧气将炉口烧开了。炉内立即喷出一阵金星火花，又射出一道几尺长的火舌。

台上有人叫了声：“快出铁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往炉前来。一边问：“出铁需要多长时间？铁水流到哪里？”

旁边的人做了回答。话音未落，红通通的铁水就犹如一条巨龙，从炉内冲出沿着槽道奔流出来，映出一片红光，炉前一片欢呼。这时是下午3



时 25 分。

头炉铁出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意犹未尽，问身边的先进生产者们：“隔多长时间出一次铁？”

大家说：“四个小时。”

他犹豫了一会儿，向李一清说：“到前面去看看，看得更清楚些。”

他下到铁台，走到电动泥炮附近仔细看了看冒着火光的铁水，便沿着栏杆向台下走去。

毛泽东的意思是还想看一遍出铁，但时间不允许了。王任重上前说：“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

“去看看吧！”毛泽东有点儿不舍地离开了 1 号高炉。

3 时 40 分钟，毛泽东往焦化厂而去。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是厂党委书记刘教、厂长袁家柯。了解了焦化厂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问：“焦炉有多少孔？是不是每柱是一孔？”

袁家柯答：“有 65 孔，是每柱一孔。”

毛泽东听了，很有兴趣地从头数起，数到第 5 孔时被火架车挡住了视线，他便不再数下去，问：“这个炉子一天出多少焦炭？”

韩宁夫说：“昨天已出到 1600 多吨。它的设计能力是 1200 多吨。”

当毛泽东知道即将出焦时，他表示要看一炉。

几分钟后，通红的焦炭穿过火架车被推了出来，像墙壁般倒塌在消防车上。消防车马上开到灭火塔下，冰冷的地下水立即将火扑灭，塔顶冒出一阵白色浓烟。大家告诉主席，焦炭熄灭后，就倒在前面小屋旁边的焦池里，通过皮带机送到高炉去。”

毛泽东的兴趣十分浓厚。他问：“多少时间出一炉？”回答是，平均 9 分钟出一次。他看看表，要再看一次。

他还转过身向在场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焦炉？”曾希圣回答没有。毛泽东说：“你们也应该有。”

看完第二炉出焦，约下午 4 点钟，毛泽东便离开武钢。离开时的情景，用当时陪同毛泽东参观的张治中的话说是“我们总算冲出重围了”！

可武钢人一连几天没有平静下来。

毛泽东在高炉时，电装公司的青年工程师潘正德离他很近，看得仔细，听得清楚。因此总有人在他身边围着，听他讲述细节。

模范工地主任韩喜，总爱和大家讲在高炉平台被毛泽东接见时的情景，比如他给毛主席擦火点烟啦，在炉前给毛主席递毛巾擦汗啦，还不时拿出毛主席敬他的一支烟给大家看。这支烟，大伙儿你传我递，反正舍不得吸。

9月24日下午，武钢职工用1号高炉炼出的铁，制成一座精美的高炉模型，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们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正当我们1号高炉出第一炉铁水的时候，主席到了武钢，这对我们武钢65000名建设者和生产者，是一种伟大无比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建设好钢铁工业、锻炼成坚强的队伍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信中还表示：“到年底确保出铁21万吨，力争达到并超过23万吨。总之一定鼓足干劲，采取一切办法，提高再提高，增产再增产。”

能炼焦能做草酸，“大跃进”中的武汉妇女既敢想又敢做。毛泽东的片刻接见，更使她们干劲倍增

9月13日，毛泽东听取武汉市市妇联副主任陈哲关于“大跃进”中武汉妇女敢想敢做，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的情况汇报。当陈哲提出大家都想来看望主席时，毛泽东答应明天一定抽出时间来见一见。

9月14日晚上10点多钟，11位武汉妇女代表等候在省委的一个会议室里。明亮的灯光下，桌上铺着的雪白台布上，陈列着妇女们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样品。

大家排着队，眼睛盯着门外，等待着，心中则在想自己该向主席说些什么。

10点45分，毛泽东来了，他亲切地同大家依次握手。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劳动模范朱玖，她握着领袖的手，激动得满脸通红。排在第二的周春姣是个性急的人，此时她挤上前，不等朱玖放开手，便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旁边的肖慧纳连忙介绍说：“这就是我在八大会上讲的那个五好积极分子，长安里居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听了笑着点头，向周春姣问好。

接着，毛泽东又同制造草酸的詹淑权、办汉阳维新炼焦厂的喻望香等分别握手问好。

毛泽东走到桌子跟前坐下，打招呼让大家随便坐。喻望香腿快，立即跑过去占了一个离毛泽东最近的位子。别人也都围拢来，紧挨着坐下。

毛泽东一边拿起面前摆着的焦炭、草酸、硫酸等产品样本来回地看，一面同大家聊天。

他先拿起的是一块焦炭，问旁边的喻望香：“妇女也能炼焦炭了！你们是用什么炼成的？”喻望香说，是用土办法炼成的，很简单。

“用什么土办法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红砖砌一个窑，把煤装在里边烧，烧到一定程度，用冷水泼下去，就变成了焦炭。”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又问：“要烧几天呢？”

“一个4吨的窑，要烧6天。”喻望香答。

她很想在此汇报一下汉阳月湖街二十几个妇女从河边运来1万多块砖来做窑，挑200多吨煤白手起家办炼焦厂的详细情况，还想说说她们以后的计划，但时间紧，自己一时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最后只说道：“我们那里还有20吨和40吨的窑，已经开始烧了。”

毛泽东拿起一个草酸瓶轻轻摇动里边的白色粉末，问詹淑权：“你们制的草酸是用什么做的？”詹淑权说，是用锯末做的。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这时身穿白制服的邱益英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转过脸来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人民警察。”邱益英边回答，边站起来举手向毛泽东敬了个礼。

“哦，人民警察。搞了多久啦？”

“今年三八节开始的。”

“你的工作有困难吗？”毛泽东关心这个职业是否适合妇女们去干。

“没有什么困难。”邱益英表决心般说道。

毛泽东笑着说：“也不容易喽！”

接见的时光不长，毛泽东就要离开了。大家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门口。

妇女代表们踏上归途时已经深夜12点钟了。她们一边走，一边还在谈论着刚才的情景。

路上，杨菊珍对詹淑权说：“你信不信，我这时有劲儿得很，简直可以把你背回去。”

詹淑权则说：“你看毛主席已经6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操劳，连我们街道妇女办工厂也关心到了。我们两人都还只四十上下，这下半生我们要活得更起劲儿，要用更大的干劲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你说呢？”

她们就这样聊到很晚才回到家。

第二天，像预先约好了似的，她们两人都起了个大早往厂里去。喻望香、周春姣、郑冬英等人，她们也都是是在朦胧晨雾中走出家门、走上岗位的。

## 两年后，武重人终于又迎来了毛泽东。听着汇报，毛泽东笑得好开心

当毛泽东身着白衬衣灰色长裤，穿一双黑色布鞋，第一个从车上走下来时，武汉重型机床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史梓铭、党委副书记储丹亭、副厂长孙毅等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毛泽东果真不负前约来这里了。

毛泽东和武重有一个什么前约？

1956年4月20日，武汉重型机床厂在过去湖塘纵横、乱草丛生的荒丘上开工兴建。

6月1日，史梓铭和孙毅接到中共武汉市委通知，要他们做好向毛泽东汇报的准备。

这时，工厂的平土工程刚刚结束，厂区还是一片空白，谈不上生产，产品也没有试制出来，拿什么去做汇报呢？两人和党委一班人紧急商量之后，决定向毛泽东汇报全厂准备一年半完成建厂任务的计划以及设想的边建厂边生产的具体方案。汇报方案落实了，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毛泽东到了武汉，武重建设这么大的一件事就不能不挂在他的心上。他也知道，武重开工兴建才两个月时间，不可能马上投入生产出产品，但他殷切地了解有关的全部情况。他有点儿性急地等着。

史梓铭、孙毅等是在武汉市市委机关一幢楼房的阳台上做汇报的，那所房子也是毛泽东在武汉的临时寓所，时间则是在6月3日上午。

毛泽东手里拿着汇报材料，一边听一边还不时地在材料上改些错别字和错用的标点符号。听到关键的地方，则明确表态。

当汇报中讲到“我们决心修改原来基建计划，提前一年半建成投产”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同武重的这种气魄，说：“你们做得很对，应该有雄心壮志。”

对武重采取的建设之中先在外厂试制新产品的做法，毛泽东也予以肯定和赞扬。他鼓励他们说：经验来之于实践，路是人走出来的嘛。那

时,要建设这样一座现代化的技术要求复杂的大型机床厂,对于资金不足技术力量缺乏的武重人来说确非易事。其实,这个困难与挑战不仅是武重人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

汇报持续一个多小时。对于史梓铭和孙毅来说,他们不仅在向毛泽东谈设想谈方案,而且,也从毛泽东那里汲取力量。

毛泽东说,及早抓住工人的培训工作,使新生力量很快地成长起来,将来新老结合起来,床子开动了,你们就主动了。

毛泽东说,做公婆的要了解新媳妇是个什么样的。凡是老厂支援你们厂的人员,你这个厂长都应该看看他们,要他们认识你才好。

毛泽东说,反正不能一个长,反正不能独裁。

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都具体而明确,使史梓铭、孙毅他们深受启发,更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汇报结束,他们告辞。毛泽东也站起来说:“你们的汇报,很好,以后发生情况,要直接写信告诉我。”

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下午去工厂的工地参观。

这大大出乎史梓铭他们的意外,心里暗暗着急:“说行吧,厂区正搞土建,到处堆着建筑材料,路面也挖沟通道,坑坑洼洼,不要说车子进去很颠簸,步行也难。说不行吧,又不能回绝毛泽东,只好如实报告。

毛泽东不在乎,他说:“我要去。只要你们能走,我就能走。光听汇报不行。就是在你们厂的工地上站一下,我也高兴。”

没有人能再拒绝毛泽东的要求。午饭后,毛泽东等坐的小汽车就开了出来。

谁知快到工厂时,天公不作美,突然一场暴雨从天而降,遍地渍水四溅,道路泥泞不堪。

无奈,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不进厂区。但他还是让司机开车载着他围着厂区转了一圈。他的脸贴在玻璃窗上,透过水渍朝外望着,望着……

临别,毛泽东向史梓铭、孙毅等表示,到生产机床的时候,要再到武重来看看,以遂心愿。

两年多过去了。武重人今天终于迎来了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他一一介绍了厂有关负责人。

对史梓铭、孙毅，毛泽东当然不陌生。而他们两人这次再向毛泽东汇报，就该实实在在地讲生产的情况了。

听了武重边建厂边生产和工厂生产跃进的情况，毛泽东回想了1956年听汇报的情景，他不由从心底感叹一声：“那时候这一切还在计划中啊！”

一切都已成现实。毛泽东几乎有点儿迫不及待地要进厂房看一看，亲眼看亲手摸。

他们首先参观的是第一机械加工装配厂。一进门，便是一个重大件加工车间。离门不远，耸立着一台巨大的龙门刨床，几乎触及厂房的房顶。4米宽、12米长的工作台上，载着庞大的工件，来去不停，刨刀刨出的铁屑，哗哗落了一地。毛泽东最先被它吸引了过来。史梓铭站在一旁介绍说：“这是7288龙门刨。明年我们要生产7289龙门刨床，比这个还大。”毛泽东听了笑得好开心。

在第一装配车间，毛泽东一边慢慢走着观看工人们装配镗床和锻锤，一边听孙毅副厂长介绍武重边建厂边生产的情况。孙毅和史梓铭1956年6月2日向毛泽东汇报时就讲到一年半完成建厂任务的计划，如今，这个计划已经实现。史梓铭也介绍说：“这个月一装配车间的任务是7台镗床，9台锻锤。”毛泽东感到满意。

“鼓足干劲，大战苦战，一定完成二百台”，迎面墙上，一幅大红字的标语映人毛泽东的眼帘。他转头问史梓铭：“今年厂里的任务是200台吗？”

“是。”史梓铭回答。接着他介绍厂的跃进计划说：“我们今年原定任务是42台，后来跃进到65台，‘双反’运动中跃进到130台，最近，又第四次跃进到200台。”

毛泽东说：“能够完成吗？”

史梓铭答：“这是工人提出的倡议，我们一定力争完成。”

毛泽东点头。



走到一台5米的螺旋铣床边，等候了许久的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林、马雷赛夫斯基和设计总工程师奥尔沃夫等苏联专家们迎了上来。巴杜林很早就曾对厂领导说过，他到中国来工作，很想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能否到武重来？早上听到毛泽东确实要来的消息，他的心情很激动，连忙通知所有的专家到机床旁等候。

史梓铭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道谢。他们则向毛泽东介绍这个厂设计、施工与生产的情况。奥尔沃夫还对毛泽东说，苏联专家正在和中国同志一起“大跃进”。毛泽东笑了，再次对他们表示谢意。

大件车间旁是一个中小件车间。毛泽东走进去，从一部机床看到另一部机床。机器的轰鸣声很大，工人们听不清毛泽东的问话，也不知道厂领导和主席说些什么，他们只是以激动而敬仰的眼光打量着他。毕竟亲眼看见了毛主席，和像片上又像又不像的活生生的领袖。而毛泽东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机床上。

他又走到车工吴健民的车床前。这台车床与众不同的是上面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着“车床高产试验田 月产700小时 操作者：吴健民 黄志雨”等字。毛泽东感兴趣地打量着它。

原来，它是厂技术革新能手马学礼与吴健民、黄志雨三人创造的一种名叫外旋风铣的新工具，能使工效提高10多倍。原来它的刀盘，要等几天后才能做好。昨天早晨，听说毛主席要来视察，三人就想，一定要在毛主席到来之前把它做好并投入生产，让毛主席看到它。经过熬夜苦战，终于使它一上班就能开足马力干起活来。

看到毛泽东走过来，吴健民忘了操作，用足力气大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带动车间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接下来，毛泽东看了铸造车间的砂箱，了解造型的过程，还看了化铁炉。

半个小时过去了，参观结束，毛泽东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厂房，这些机器。而武重的工人则追随着毛泽东，很多人离开岗位，跟着从一个车间

走到另一个车间。

厂领导扯大了嗓门喊：“你们工作去吧！生产去吧！不要跟着了！”  
可是谁听他的呢？

黄石地方虽小，却有个大冶铁山和  
大冶钢厂。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  
在炼钢镜中，毛泽东看到的是  
一幅钢铁“跃进”的未来宏图

大冶铁山的尖山矿区，爆炸声此起彼伏。一股股浓烟，冲天而起，电铲马达轰鸣，机车来往奔驰，一片繁忙的开采景象。

大冶铁矿地处湖北黄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一部分。1951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派出地质专家到铁山了解矿床情况，抽调力量成立大冶资源勘探队，进行全面勘探工作，以充分开发利用其资源。1955年中共黄石市市委专门成立了铁山工作委员会。1956年1月矿山建设工程全面铺开，1957年底矿区即实现通电、通水、通车。1958年6月，矿山剥离工程进展神速，完成582万立方米，超过技术设计数字。7月1日，东露天采矿厂正式投产，与武钢冶炼投产同步，从而成为我国现代化开采的大型矿山。

对大冶铁山的建设与生产，毛泽东十分关心。1958年9月15日大约上午10时半，他在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平化、黄石市市委第一书记杨锐等陪同下来到尖山180水平的地方视察。

下了车，由铁山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陪同，毛泽东朝矿区走去，边走边听陈明江介绍铁山的开采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

“整个的大冶铁山矿石蕴藏量是多少？”毛泽东问。

陈明江答：“是1.1亿吨！”

毛泽东又问：“多不多？少不少？”他的意思是问实际蕴藏量是比这多还是比这少。

省委书记张平化插话介绍说：“这个1.1亿吨是近期勘探报告材料，是××米以上的情况，××米以下的情况还没查明。”

毛泽东点头。这时，王任重递给他一块矿石，他翻来覆去地看着，掂着，问：“矿石的含铁量怎样？除铁之外，还含什么成分？你们是不是光

要铁?”

陈明江说：“这里矿石的含铁量是50%~60%，矿石中除铁之外，还含有铜的成分。”

毛泽东便问到选铜的问题，陈明江表示，现在正在动手建设选铜厂。

看了一段矿区后，张品、陈明江请毛泽东和省委领导同志去休息室。

在那里，毛泽东听取有关矿山开采和基建情况的汇报，陈明江说：“这里是露天开采，剥离工程很大，基建费用也比地下开采要多得多。比如，地下开采，可以不修铁路，不搞电机车，不用电铲，但地下开采没有露天开采量大。”

毛泽东问：“花了多少钱呢？”

陈明江说，基本建设原来计划的费用是1.5亿，经过工人们想点子，找窍门，千方百计实行节约，结果只花了1.2亿，省下了3000万。

“你们是包干？”毛泽东问。

陈明江回答是。毛泽东连声称道：“好！包干好。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

陈明江兴奋起来：“早搞大包干，省得还要多！有1亿够了。”

毛泽东道：“七成也不错。”

这时，张平化开口提及铁山职工鼓足干劲、大干社会主义的情况。他说，窍门和潜力到处都是，关键是发动群众。这里的电机车设计能力是拖8个车皮，工人们打破迷信，大大发挥了机车牵引能力，前几天拖到13个，现在到了14个。工人说完全可以拖16个，是设计能力的200%，毛泽东听了连连点点。

不知是谁传播开了这个消息，许多不当班的矿工们纷纷跑上山来看看毛主席，拥拥挤挤地聚了一大堆人，有电机车司机、道路工、电铲司机，穿孔机司机……他们指指点点，满脸激动。

毛泽东走出休息室，和他们握手，问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姓名和简单工作情况。接着，毛泽东循着弯曲的山道，登上大冶铁矿露天采场尖山180水平处，察看掌子面上穿孔机、电铲、电机车、汽车、风钻的作业情景，和工

人们握手问好，仔细询问这些矿山机械的性能和每天的工作量。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喜悦，久久地望着工地穿梭往来的繁忙景象。

远远地，一位青年工人从电铲驾驶室爬上车棚，向这边手舞足蹈地喊着什么。因为距离远，毛泽东听不清，便只好举起手，朝那边打招呼，那人的情绪更激动，几乎在车上蹦了起来。事后，这位叫殷励勉的电铲司机说，毛主席向他招手了，而他向主席说的是，一表决心争取更大的成绩，二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能够看看毛主席就是无限的幸福”，许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不顾疲劳，不顾工地可能有的危险，奔向这里的。毛泽东离开铁山前正与矿长、党委书记们握手道别时，有一位小伙子分开人墙硬挤上来，愣头愣脑地上去握毛泽东的手，嘴里说：“毛主席，您老人家可好？”毛泽东被他这可爱和朴素的举动惹笑了。

吃过午饭，毛泽东坐车往大冶钢厂视察。

黄石是个小城市，毛泽东对它却不陌生。1953年2月18日，他视察长江路过黄石，就专门停船上岸。

那天，船到黄石，天已黑下来，居民住宅区灯光闪烁。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劝阻说，黄石连马路也没有，很不方便，不要上岸了。毛泽东却不依：“我骑驴子也要看。”

当然不会真骑驴子，不过毛泽东还是上了岸，去的地方就是大冶钢厂。人没在招待所坐稳，毛泽东就要去厂区，说：“我要把大冶钢厂炼钢过程从头看到尾。”

果真就从南边到北头，从炼钢、铸钢、锻造、化验室一直看到了轧钢。这一趟看得过瘾，也激发了他对钢铁事业的信心与雄心。当黄石市市委副书记高芸生问他还有什么指示时，他说：“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人们抱着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只争朝夕，走在时间的前面。毛泽东对于钢铁生产，一直予以了极大的关心。他在9月13日视察了武钢，这时与中共黄石市市委第一书记杨锐同车往大冶钢厂的时候，又一次关切地问道：

“你看，今年1070万吨钢能不能完成？你们地方怎么样？”

1070万吨钢是这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铁生产指标，它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

杨锐表示有信心。他介绍大冶钢厂的职工干劲儿很大，这个厂去年还只能生产十几万吨，今年已跃进到50万吨。

毛泽东表示满意：“这很好，跃进得很快。”他说，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儿。

下午1点多钟，毛泽东的车开进大冶钢厂。钢厂厂长江敏、炼钢部党支部书记丁振江、主任王全治等赶来迎接他。

毛泽东这次参观的是新建的平炉炼钢厂。平炉的操作台离地面有五六米高，上平炉要走一条窄小的楼梯。李振江和王全治先行一步上前要扶毛泽东，被他谢绝。他在4号平炉前停住，让出乎意料见到他的工人们喜出望外。

“这是什么炉子？”毛泽东问。

“这是平炉，又叫马丁炉。”杨锐和厂长江敏答道。

“有多大？”

“90吨的。”江敏答。

李振江介绍说，这是三座新建起来的平炉，都是最近投入生产的。

毛泽东从炼钢老工人、平炉工段党支部书记张开先手中，接过蓝色的炼钢镜，迎着炙人的火光，走到炉前观看钢水。

看完4号平炉，又看3号平炉，再走到前不久大放“钢铁卫星”，称炉产量超过设计能力将近一倍的2号平炉前。炉旁，工人们正操作着自动加料机，进行装料工序。

毛泽东拿起炼钢镜看了一会儿，问道：“现在你们一炉可以出多少钢？”

丁振江答：“现在可以出到150吨以上。”

炼钢的火光特别灼人，毛泽东衣衫全被汗水打湿，但他兴致却好。下了2号平炉，又朝电炉、转炉等炼钢厂房走去。他对每一个生产操作过程都问得很细。对四、五、六号电炉的生产，毛泽东赞扬道：“你们建设得很快，建设得好。”

在往新建轧钢厂厂房南边走去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停住了脚步：“怎

么从这里走？”

原来，1953年2月18日晚，毛泽东到大冶钢厂参观时，去轧钢厂是朝东走的，他记得很清楚，不是现在这样朝南走。

大家告诉毛泽东，他今天要去看的已经不是1953年的旧小轧钢车间，而是后来新建的轧钢厂，毛泽东听了，真是高兴，感慨地说：“你们的变化很大啊！”

大家提起他1953年说的要把工厂办大办好的指示，毛泽东笑了：“你们还记得我的话呀！”神情十分满足。

1953年时，大冶钢厂是一个刚恢复生产不久的厂子，规模小，设备旧，生产水平低，一年的钢产量不过四五万吨。现在，大型的炼钢和轧钢车间都已建成，钢的年产量据说已达50万吨。

在新建的轧钢厂，毛泽东特别注意地看了国产轧机，一路上还仔细询问了厂里整风“反右”斗争情况，他说了自己的意见和体会：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结束对大冶钢厂的视察。和1953年不同，他受到了工人更加狂热的欢呼，无论走到哪里，都陷入欢呼的人海。毛泽东原来是由王任重陪同走在前、张平化陪张治中在后面走着的，结果，其他人统统被挤到了后面，毛泽东成了人潮的漩涡中心。

秩序一乱，王任重有些生气，说：“应该要他们党、团、工会好好地开会检讨一下。”

张治中宽解说：“这也难怪，工人们的狂热情绪是没法阻挡的，厂方事先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王任重还是有意见：“热情当然是好的，但总要有秩序。”

两人拼力挤到毛泽东跟前。见毛泽东身在此中，虽然早已汗流浹背，但丝毫未改欢欣从容的态度。两到大冶钢厂，他都感受了一种巨大的激情。

下午，毛泽东乘车到中共黄石市市委驻地，和市委机关的职工们见面并合影留念。

黄石视察结束，毛泽东在沈家营码头上船。突然，一场暴雨降临，狂



风劲吹。

眺望波浪汹涌、奔涌咆哮的长江，毛泽东来了兴致：“你们会不会游泳？敢不敢在长江里游呀？”

他走下舷梯，率先跃入浪中，从沈家营码头一直游到上窑上船，风浪中，毛泽东体会着勇往直前的英雄豪情。

晚上 5 时 30 分，毛泽东举起手，向黄石告别。

16 日，毛泽东离武汉到安徽。这一天，他应王任重之邀，为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以此“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

风高浪急，正是游泳好时候。一连  
看了两座小高炉，上了车却差点走  
不出安庆

9月15日，在由武汉去安徽的江峡轮上，毛泽东向跟随自己外出视察的张治中说起自己这次外出的一番感受：“还是到外头来多看多得到一点儿东西，老住在北京实在不好。”

“您今年外出，这回是第五次了吧？”张治中问。

“是呀，但是5、6、7三个月没出来，1、2、3、4月都在外，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8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毛泽东答。

“最好全国各省区都去一次，您还有哪几处没去过？”张治中又问。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说：“西北三省——陕、甘、青，四个自治区——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华北的山西，西南的云南、贵州，都没有去。”

“还是准备去吧？您如不去，有人会说您‘偏心’了。”张治中打趣。

毛泽东笑一笑：“我不可能见到所有的人。”

张治中建议：“到西北最好是春秋两季。”

“夏天也好。”毛泽东说。

16日上午10时左右，江峡轮驶进安徽的安庆境内。毛泽东提出，要下江游泳。

江面上正刮着大风，波涛汹涌，水面上漂浮着的草根木片一眨眼就漂过去了。张治中关切地说：“今天风浪这样大，不要游了吧？”

毛泽东说：“试试看。”他不会放过这种乐趣。穿上游泳裤，乘上为江峡轮领航的航标船，他迎着6级浪去了。

陪同毛泽东游泳的20多位运动员整装待发，其中有3个女运动员，年纪最小的叫小成，排在第一位，在扶梯上首先迎接毛泽东。看小成既瘦小又怕冷的样子，毛泽东率先入水。小成也随后下水，一进江她就不由自主地说道：“好冷啊！”已经开始游泳的毛泽东听说，回头给小成鼓励：“不

要怕，要有勇气！下去就不冷了。”

事后，毛泽东向别人打听，小成为什么长得这么瘦？别人告诉他小成肚里有虫，毛泽东听说，叫来医生嘱咐一定要替她治好。

毛泽东在江中酣畅淋漓地游了1个多小时，几千米距离，到达安庆码头附近。江峡轮就要靠岸了，毛泽东从江中上了护游的小船，然后沿航标伸入水中的扶梯拾级而上。

毛泽东上了船，张治中的紧张心情还没有放松下来：“今天风浪太大，水流太急，游泳不太合适吧？”

毛泽东却轻松得很：“风大流速都没有什么，就是一浪紧接一浪，人在水里得不到一点儿休息。”

江峡轮上，船员们都已在甲板排好座位，等候毛泽东来留影。他走过来了，却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一个个面孔端详过去，然后问，是不是少了一位同志？原来还真缺个人。有个炊事员因为值夜班这时休息了没来。大家都佩服毛泽东的好记忆力。照完相，毛泽东就登岸离船。

近中午12点50分，毛泽东在中共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安庆市市委第一书记方振华等的陪同下，乘车到安庆一中的门口。一中校长鹿钟毓急忙迎上来。方振华上前做介绍，随后，黄岩告诉鹿校长：“毛主席要看看你们的小高炉，请你引我们去。”

毛泽东刚在校门口下车，就被住在学校对门的一户人家看见了，他们惊喜地叫起来：“是毛主席！”沿街群众听说，立刻围拢起来拥向学校，学校赶紧关上大门。门外群众不散，门内的学生们欣喜若狂。

“我们走近路吧。”方振华提议，他怕人多拥挤。

“不，还是走人多的地方吧。”毛泽东从容地向人多处拐去。

走到小高炉前的两块黑板报前，毛泽东站住。一块黑板报上是有关钢铁工业的剪报，另一块上写满了学生们的决心书。毛泽东边看边说：“这个黑板报办得不错。”

前面就是学生们办的小高炉，鼓风机轰隆隆响，烟囱上喷出一股股黑烟。像这样的小高炉，学校有8座，而且还建立了电机制造厂和一个木工

厂,由学生们轮流参加劳动。

毛泽东问:“这个炉子有多大?”黄岩介绍说有 1.04 立方米。

毛泽东又问:“一天能出多少铁?”

鹿钟毓回答说,1 吨左右。

毛泽东看看炉前穿着炼铁工人服装、满面灰尘的几个学生问道:“你们是工人还是学生?”

他们说我们都是学生。

“你们真的学会了炼铁么?”

学生们回答:“学会啦!”

“你们是几年级的?”毛泽东再问。

他们说是一高三三班的。正说着,不知谁喊一声:“要出铁了!”

毛泽东有兴趣地看他们拿起通条通炉塞。一会儿,铁水从炉口流出,在沙盘里穿行。毛泽东笑着点头:“好!好!”

走到小高炉后面,他见体育教师马怀生正在鼓风机前工作。他手一指问:“这是什么东西?”

马怀生说:“这是马达带鼓风机。”黄岩插话道:“这是土法炼铁。”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能算土法吧?沾了点‘洋’气,是土洋结合。”

在学校的电机厂,毛泽东饶有兴致地看了初三一班 13 岁的学生杨相陈绕漆包线。从电机车间走出来,毛泽东便问鹿校长:“你们有半工半读的班吗?”

鹿钟毓回答有一个班。

毛泽东问:“不知半工半读班的同学的劳动怎样安排的?劳动有多少时间?”

鹿钟毓说:“一个星期劳动一天半。”毛泽东点头。

来到木工厂的锯木车间,有十来个学生正在拉锯。毛泽东走近初三一班的焦祥英,问他多大了?焦祥英说 18 岁了。毛泽东说:“你会锯吗?”焦祥英和另一个同学汪孟民两人就互相配合哗啦哗啦地锯起来,毛泽东侧着头看了一会儿说:“很好!”

毛泽东离开安庆一中时,聚在门口的人更多了。校门一开,人群就沸腾了。本来街道就窄,有关人员好不容易才排开一条路来,让毛泽东等人

的座车出校门上了街。

车行不远，到了安庆市委设在郊外新辟工地的三个小高炉前。三个小高炉已经有一个开始出铁。几个开炉工谁也没有经验，第一天好容易出了铁，第二天就烧坏了水套，苦战 24 小时才把它修好，毛泽东看到的就是修复后的第一炉铁。听了介绍他笑着说：“难啊，可是不要怕。”

正在劳动的机关干部们见到毛泽东，不管手上是不是很脏，都争先恐后地拥上前跟他握手。曾希圣和黄岩在一边连连劝道：“不要握手了吧！”但大家哪里肯听！

毛泽东到了安庆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街上拥满了人，谁都希望自己能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在安庆一中出来时，车队还能开动前行，但这次看完市委机关的小高炉出厂时，却被群众重重包围。好容易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挤出条道，让毛泽东上了车。但车门没关，车前车后就又挤满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费好大力气推一下，车子走上几步，又推一下，又走几步。任凭车喇叭用劲嘶叫，人们充耳不闻。

陪同的市委领导有些急了。黄岩省长也对张治中说：“你看主席会不会怪我们？我们并没有通知群众，他们自己涌来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张治中说：“没有什么，主席不会见怪的。”就这样，走一路，停一路，走走停停，好容易才把车子开出去。这时已经是下午 3 点钟，毛泽东离开安庆，往合肥而去。

汽车开出一公里才知道搞错了方向，毛泽东没在意。他大感兴趣的是吃饭穿衣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前景。一出管天管地管神仙的新编剧更令他夜不能寐

9月16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等人的车队终于冲出人们的重围，离开安庆往合肥。

也许是还没有从刚才的激动与兴奋中清醒过来，带队的驾驶员竟然转了向。待发现时，已经朝岳西方向开出了1公里多。驾驶员很紧张，毛泽东却满不在乎，也没计较。他的心情不错。下了车，趁车队调头的机会，他站在路边陶醉地望着秋季成熟的田野，感到舒畅无比。跟着下车的陪同人员悄悄吁了口气，轻松起来。

车队接着上路。车里，毛泽东一边沿途察看农田，一边和同车的曾希圣兴致勃勃地谈话。谈话内容也是睹物论事，随意自在。

看到公路两侧许多农民在“烧包子”，到处烟雾弥漫，毛泽东便问：“这种‘烧包子’。是不是很普遍？”

曾希圣回答说很普遍。

“有什么作用呢？”毛泽东问。

曾希圣说：“主要是积肥、杀虫，还可以改良土壤。”

毛泽东接着说：“大概还有深耕的作用吧！”

沿途的标语很多，墙上、树上、屋顶上，以至地上、田埂上，到处都写着有关工农业生产跃进的口号。一路上还不断能看见一掠而过的跃进门、宣传牌、宣传站。

毛泽东很感叹：“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嘛。”

下午4时，毛泽东一行到达舒茶人民公社。

舒茶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9月9日成立的舒城县第一个公社，它主

要以种植茶树为主。

一下车，毛泽东就走到一块荞麦地边，兴致盎然地观看那开得正盛的银白色荞麦花。前来迎接的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被介绍给毛泽东，然后，大家一起朝社里走去。站在由几间平房围成的公社大院，毛泽东不由称赞这个地方的卫生工作做得好。

休息片刻，毛泽东先看制茶厂。揉茶机、炒青锅……一样样都看得仔细，还问：“炒一锅茶需要多长时间？”县委副书记杜来春回答说需要30分钟。

走出茶厂，登高远眺，看公社的山与水。远望大别山余脉的青岗岭上一片葱绿，毛泽东抬手指道：“那是不是茶？”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指着周围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

毛泽东到公社的远景规划展览室观看远景规划模型。

公社干部汇报了社里的大好形势和今后的设想，讲到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7200万斤，平均亩产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

接着又有人汇报说，舒茶人民公社8600多户现已养猪32000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以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60000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吃到4两猪肉。另外，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

对此，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也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车到合肥，已近傍晚。到后不久，毛泽东即接见了全国妇联、省妇联的干部，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毛泽东首先问从北京来的全国妇联负责人：“我看沿途晚稻长得好，宣传工作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这位负责人就汇报自己看到的三八社的情况和东方红一社妇女卫星棉田的情况，毛泽东笑着打趣道：“不要光看女的，男的也要看一看嘛！”

省委负责人就介绍舒茶公社外其他几个社，如郎溪幸福社等的情况，



毛泽东有兴趣地问这些社名怎么写，离这里有多远。

大家又谈起无为县响山大队的分配情况。这个大队的复员军人陈广复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他当队干部后，根据这些经验，在大队实行了供给制。

毛泽东听说，称赞他是一个人才，幽默地说：“无为不单出了个黄文炳（《水浒》中的人物），还能出这个陈广复。”

随后当他听说这些妇女干部中有几个人曾在新四军呆过，还有部队培养的女作家时，说：“好啊，你们都是新四军！”

他又说：共产主义的传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从前是红军，后来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变成一个军——人民解放军。部队多好啊，就要有战争年代那样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吃的大锅饭，拿的供给制，没有星期天，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多好啊！

说罢，毛泽东问：“你们看 1949 年解放以后妇女彻底解放了没有？”

“政治上是解放了。”全国妇联的负责人回答。

毛泽东却答：“还不能算彻底解放，就是男的也不能算彻底解放了。不办人民公社，每人每年没有 1000 斤、2000 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不能进小学、中学、大学，算什么彻底解放？”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亢奋。

话题又转回供给制，毛泽东问：“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妇女、青年是最赞成的吧？”

全国妇联负责人回答说，青年、妇女最赞成工资和供给发给个人。

“是啊！非常赞成！”毛泽东重复说，“闹‘三八’闹了这么多年，没有彻底解放，现在是大有希望了！”他认为，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晚上 8 时半后，毛泽东观看庐剧《牛郎织女笑开颜》。这是一个新编剧，剧中提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

毛泽东看得兴致勃勃。他对剧中表现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很赞

许,但又认为剧中跟王母娘娘和龙王作战的场面弱了些。

他幽默地说,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董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打一仗哩!

毛泽东的精神状态是那么兴奋,以至于他看完戏回来仍无睡意。从这天上午10时下江游泳到现在,他几乎没有片刻休息。这会儿,他又开始工作,读书。他一到合肥,便向省里借来了《安徽省志》和朱熹注的《楚辞》。通过读地方志,不仅可以借此了解本地的过去,也可以一览它的今天和未来。《楚辞》则是毛泽东最爱看的一本书,今年的几次巡视,他都随身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读。

这天夜里,兴之所至,他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封信,称赞前几天自己在鄂“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

他又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遵嘱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并且写了4张以供选用。谈及对安徽的观感,毛泽东是这样写的:

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

对安徽省曾经有的把省会从合肥搬迁至芜湖的打算,毛泽东也表了态。他在信中说:

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这一夜,毛泽东通宵没有睡,一直到17日早上8时才上床休息。

不知道他这一夜读完《楚辞》没有?就在合肥,当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等在毛泽东处聊天时,他特别把它介绍给他们看。聊天中,毛泽东由《楚辞》谈到《论语》,由《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又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陕、洛、闽、皖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

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谈及朱熹，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安徽人张治中则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了。”

毛泽东却道：“婺源县划归江西，但不能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纵论古今，一直是毛泽东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视察的旅途之中，这种情形确是屡见不鲜。

在安徽省博物馆，毛泽东对淮北河网示意图兴趣最大。看到几十种除“四害”工具，他开心了：老鼠就要遭殃了

9月17日早上8点多钟才休息的毛泽东，下午专程视察安徽省博物馆。他在那里看了有两个半小时，这是他在安徽的视察点中呆得最长的一次。

对这次参观内容，毛泽东自己这么评价：相当丰富，看不完。

在矿产馆，毛泽东观察了勘探队员们采来的矿石标本，逐字逐行地看了安徽矿藏分布图。

在机械馆和轻工业馆的新产品展台前，毛泽东风趣地对省委负责人说：“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们是存心要抢上海的生意吧？”

农业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标本，棉秆竟有一人高，毛泽东用手摸摸棉秆和棉桃：“这株棉花的桃子不少！”

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站试验田采集来的两株烟叶，每株足有1丈多高，叶子像水芭蕉一样，毛泽东道：“这两株烟叶很好！”讲解员告诉他说，根据当前生产情况预计，每亩可收33000多斤。

毛泽东又看小麦与水稻丰收的情况说明，特别是郎溪乡幸福公社的大面积丰产田图片，还有安徽省群众抗旱的各种图景和提水工具。看着看着，毛泽东不禁诵出了作为图解说明的安徽当时流行的新民歌：“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

水利馆挂有一幅淮北实行河网化成就和将来规划的示意图以及濉溪县河网化示意图，上面表示河道的各种线条密如蛛网。

毛泽东问道：“细红线表示什么意思？”

省委基建部部长张祚荫回答说：“这是表示小河道，有20米宽，淮北河网化，根据新的规划共有5种河道，最宽的有60米。”

毛泽东又问：“这个县的河道已经挖得怎样了？”

张祚荫说：“全县计划每平方公里挖 35 万立方，现在已挖了 11 万立方。”

“有没有用洼地做水库？”

张祚荫又说：“凡是能做水库的我们都已经或者准备做水库；平原地区的水，我们主要是把它蓄在河网里面。”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很有意思！”接着，他又指着淮北河网化的总图，问图上的红线和绿线分别表示什么？

张祚荫告诉他，红线是表示没有挖成的河道，绿线是表示已经挖成的河道，现在整个淮北挖成的大中河道已有 9100 多条。

“啊！大工程！”毛泽东感叹道。他对曾希圣说：“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

毛泽东在博物馆参观时感兴趣的还有除“四害”陈列馆。那里，陈列着几十种除“四害”的工具。

看到一种活板捕鼠夹，能立即打住一脚踏上去的老鼠，毛泽东说：“老鼠这个东西很狡猾，这样，老鼠就要遭殃了。”

省除“四害”指挥部副指挥杨杰向毛泽东介绍了一种用两块土坯吊着做成的“土老猫”。老鼠喜欢沿着墙走，只要一碰上这种“土老猫”就能打中。既方便，又经济，而且效果很大。据说界首县有一个庄子用这个办法就打死 2000 多只老鼠。毛泽东听了，说这个办法好：“真是对老鼠大为不利啊！”

看了灭蚊用的简易火焰喷射器，毛泽东笑指道：“这是火攻！”

他又念了一遍安徽省除“四害”成就的文字说明，叹道：“你们消灭的老鼠麻雀真不少呢。”接着问：“消灭这样多鼠雀可以节省多少粮食？”

杨杰说，节省的粮食以每人每年 500 斤计算，可供 600 万人吃一年。

毛泽东在财贸馆看了自动售粮器的表演；在邮电馆看了自动售邮机和自动售报机；在卫生陈列馆，他对安徽省已有 14 个县 100 多个乡消灭血吸虫病表示高兴。他还参观了工业馆、文化教育馆、林业馆、水产馆、历史文物馆等。

对这样的博物馆，毛泽东认为很好。休息的时候，他对在座的人说，

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晚上，被邀跟随毛泽东在安徽视察的女作者茵子问主席，要不要去合肥市内的游泳池游泳？毛泽东摇摇头，说：

“要到大江大河中去游泳才行！”

视察省委办的钢铁厂，毛泽东提醒  
青年工人：你的胡子该剃了。参观  
新式农具展览会，他赞赏群众的发  
明创造

9月18日下午4点多钟，毛泽东视察安徽省省委办的钢铁厂。他对这个厂的情况询问得很详细，还去看了这个厂两座13立方米高炉的出铁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告诉毛泽东，这个厂每天出铁20多吨，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毛泽东道：“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啊！”

他问起，在这个厂参加劳动的是不是都是工人，曾希圣摇摇头，说，除少数技术工人以外，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毛泽东表示满意。

在高炉前，毛泽东特意询问上料情况。有人指点给他看，只见不远处装得满满的料车沿着倾斜向上去的滑道正自动慢慢地爬上去。毛泽东看了，一个劲儿点头：“机械化了！”

青年工人、车间副主任曾传火接着话说：“我们是土洋结合，这就是洋。”毛泽东转过身来，握住他的手，表示赞同，又和他并肩一起走到2号高炉前看出铁。

“铁不少啊！”毛泽东说。

这一炉铁确实挺多，曾传火机灵地说：“主席来了，铁也多了！”

毛泽东不由回过头看这位青年工人，问他的年龄，又问你们的宿舍离这里有多远。曾传火指着炉边的几间平房，说就在那儿。毛泽东走过去看了看，若有所思。回到炉前，赞扬工人们的干劲，同时关心地问：“你们有没有休息时间？”

曾传火回答，还是有的。

毛泽东打量着小曾唇边已长满了的短髭，做着手势说他：“你的胡子该剃一剃了！”

毛泽东接着又去视察合肥钢铁厂，看了转炉的出铁情况。

傍晚，毛泽东前往设在郊外的新式农具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设在西郊的野外，有山有水，也有耕地，主要的新式农具都可以在这里当场试验。现在，塘边就摆列着通过滑丝就可以隔岸取土的运土器；水车水筒伸入塘中，车架排列在凉篷下。土坡上则排放着像秋千架似的二龙戏珠运土工具和整齐的滑车轨道。几架深耕犁和两只健壮的黄牛整装待发，停在一片待耕的土地上。

毛泽东在曾希圣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田世五的陪同下，先走近塘边。场内负责操作表演的刘庆云操作空中运土器的时候，竟慌慌张张地摇反了一次。他使劲儿按捺自己激动的心情，重新再来。这次对了，装满泥土的自动倒土斗徐徐在空中向对岸前进，在预定的地点自动翻身倒土。毛泽东点头，弯腰仔细看了牌记上写明的发明单位与姓名。对每一件新式工具的发明人，他都很注意，有时还会念上几遍，打听一下情况。

毛泽东接着看单人手摇脚踏空中运土器，山坡上的转马式运土器和二龙戏珠运土器的操作表演。在脚踏双轨滑车运土器前，曾希圣告诉毛泽东：“这是我们省委几个牛皮匠搞的，工人帮我们想了一些办法。”这个运土器上面是脚踏水车式的，靠着绳索牵引，能使两个各装300多斤泥土的小斗车，同时在两条小木轨轨道上爬上爬下，并能从漏斗中自动上土。毛泽东研究其运转原理后，对省委负责人称好，说：“你们也有发明权呢！”

踏上一块田地，毛泽东对人力绞关和改良深耕犁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曾希圣介绍说，这是1950年受灾缺少耕牛时想出来的人力耕地的办法，现在用绳索牵引的深耕犁，最多能翻1尺5。曾希圣还说：淮南深耕比较困难，两条牛拉犁还很吃力，一定要发展这种绞车才能解决深耕问题。毛泽东便让人们试耕两次，自己在后边一步步跟着，看着。犁上可做耕作深浅的调整，这两次耕的是6寸和8寸，都达到了标准。毛泽东看罢道：“这种绞车深耕犁要普遍推广。”

对于深耕，毛泽东曾经谈及，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1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1亩当3亩。总之，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农业的深耕问题，这会儿自然更加关注深

耕的改良工具。他参观深耕时，还特意看了单行条播，并在地上翻出被松土掩埋的种子来看。

随后，毛泽东去看各种各样的水车。有立式和卧式脚踏的，有手摇的，有的用大轮，有的用飞轮，有的以竹筒代替车筒，有的像自行车，可以一面车水一面看书，大都根据戽水的原理制造。毛泽东问，1亩地一年需要好多水？曾希圣说，大概600立方。毛泽东走过之处，试验表演的水车都操作起来，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毛泽东注视车身两旁的水流，说：“水头真不小，可以发电呢！”

敞棚中，毛泽东看了由安庆农民自己造出的插秧机，有密植 $2\times 5$ 和 $3\times 6$ 的各一部。毛泽东仔细询问操作方法，看了插秧机的关键部位——用两根铁针做成的秧爪。看完之后，又看利用倒粮食本身重量冲击力而设置的自动风粮器，并看了操作表演。

对这些大都利用木材制造的新式农具，毛泽东感到，目前农村还多以木材代替钢铁，在所有的创造中木工最有用武之地，他很赞扬群众的发明创造，对在场的土专家木工高友萱，一再握手鼓励。

最后，毛泽东去看了陈列在4排长桌上的上千只滚珠轴承。

天完全黑下来，毛泽东才离开展览会。

张治中灵机一动，毛泽东慨然允诺。秋雨之中，30万合肥人从省委机关一直排到火车站。毛泽东说，他们是主人了

9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将要离开合肥往芜湖。这些天，毛泽东外出参观，每每陷入群众狂热的包围之中难以脱身。人越多，秩序难免就有些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不满意。但又不能把毛泽东掖起来藏起来，不让他和群众面前露面。怎么办？于是准备在毛泽东离合肥时干脆来一个“夹道欢送”，既有利于维护秩序，又能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这事当然得经过毛泽东，而毛泽东竟破例同意了。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张治中的一番努力。

当毛泽东快要从武汉去安徽时，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先期离鄂回合肥进行准备工作。临行，张治中找到他，出主意说：“毛主席是第一次到安徽，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这可是安徽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机会。我们能不能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边，请主席坐在敞篷车上，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他。”张治中是安徽人，自然对家乡多一分偏心，能陪毛泽东回到家乡安徽，也使他十分兴奋激动。

曾希圣当然也愿意这么做。但一想到毛泽东每次外出从来都喜欢轻车简从，也从不要什么夹道迎送一类的安排，便很犹豫：“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负责人都不让去迎接。当然，主席这次到安徽，对全省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能够这样做最好。”

张治中不想放弃努力，他说：“让我去和主席讲，试试看嘛！”

曾希圣答应了：“好吧，听你的回音。主席能答应最好。”

曾希圣回合肥了。到晚饭的时候，张治中果真把这个事提了出来：“主席十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您，您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瞻仰瞻仰可以吧？您不反对吧？”

“你说要夹道欢迎？”旁边有人惊异地问了一句。

毛泽东片刻没说话。他夹一筷子菜慢慢放进嘴里嚼完咽下，才开口说：“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安徽省省委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治中确实好几次在与毛泽东闲谈时提到请他去安徽甚至游黄山的事。有时，毛泽东会故意地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这次，毛泽东不仅去安徽，而且同意按这边设想的安排，真是令张治中喜出望外。张治中马上通知曾希圣，说主席准许了。

按原定计划是毛泽东到合肥时通知群众夹道欢迎。但在从安庆到合肥的船上，安徽省省委的负责人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大批群众站在街道两旁欢迎，必然会有许多人跟随毛泽东的车队到他的住处，这样也就免不了会有群众一天到晚站到毛泽东住处门口等他出来，不断的欢呼与喧嚷也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他们找到张治中商量，能不能毛泽东进合肥城时仍采取暂时保密的办法，而在毛泽东离开合肥时来这么一个“夹道欢送”。

张治中认为有道理。他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9月16日，暮色苍茫之中，毛泽东一行顺利到达合肥城。3天之后，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这时，“夹道欢送”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就绪。

消息传开，整个合肥市轰动，连邻近的几个县也闻风而至。原定通知的人数为15万，但自动集合起来后，竟达二三十万人，等于合肥市人口的半数。从省委住处到火车站，长达10多里路的街道两旁，尽是密密层层的人群，有工人、农民，有市民、机关干部，也有教师、学生、军人，还夹着不少的小学生和老大爷老大妈们。天上飘着初秋的雨点，脚下是一片泥泞，但他们却像丝毫没感觉一样。人们议论着，等待着，翘着脚朝吉普车要走的路上望着。横挂马路的长幅标语“我们敬爱的领袖万岁”由于雨水一浇，分外鲜明。

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坐在第一辆绿色敞篷车上由金寨路缓缓驶进市区。后面是张治中、公安部长罗瑞卿、省长黄岩等坐的第二辆吉普车和其他随行人员的车。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车队走得很慢。毛泽东站在车上，和大家一样顶着霏霏的细雨，没有伞。他频频向两边的群众挥动手臂。

车队所过之处，立刻掀起人海的浪潮。“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一处比一处高，震动十里长街。少先队员挥舞着手中的红领巾，年轻的姑娘摇动花束，大学生们手舞足蹈，抛起他们的帽子。带着孙子孙女的老人们，就用力把孩子举过头顶，让他们看得清楚一点儿。许许多多的人激动地流出了热泪。

车队走了半小时才到火车站，60多岁高龄的毛泽东也冒着雨在汽车上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车队进了火车站，群众跟着拥进站台，拥到车厢旁边欢呼万岁。毛泽东几次从车厢里走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每一次露面，都激起一片更热烈的欢腾。将近3时，火车开动了，许多人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好久不肯离去。这一天夜里两三点钟，合肥邮局门前仍然川流不息，写信的，寄稿件的，都是见到毛泽东的事。事后，省报发行额比平日陡然增出两倍，仅零售就卖出19万份。报卖完了，群众还有怨言，说他们“太保守”，卖的报纸太少了。

渐行渐快的专列上，罗瑞卿部长感慨地对张治中说：“今天这种夹道欢送的做法，是主席多次出来视察的第一次破例。”

罗瑞卿的话说得一点儿不假。这对每次外出不但不要群众接送，就是连地方党政领导也不让他们迎来送往的毛泽东，实在是个破例的举动。

张治中就此对毛泽东感叹说：“今天群众情绪这样狂热，他们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

毛泽东说：“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做主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张治中说：“这话对。不过要是没有党和主席正确英明的领导，国家不能这样快强大，人民生活不能这样快改善，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热烈欢乐的表现。过去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天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

毛泽东笑了：“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的美好远景了。”

张治中这次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走动，两人之

间就有了许多谈话的机会。事先，张治中就曾嘱咐他的秘书余湛邦留心毛泽东讲的每句话，以便写成宝贵的日记。

就在此次开往芜湖的专列上，他们之间又有了一场有关张治中《六十岁总结》的谈话。

《六十岁总结》是张治中在1949年冬自己60岁时写就的。1958年5月3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把这个总结和他为民革整风期间写的《自我检查》一起寄给毛泽东看。

对此，毛泽东在5月22日回信说：“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的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接着毛泽东体贴地写道，“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现在毛泽东终于觅到一个休暇时间来谈一谈张治中的这个《六十岁总结》。

“您说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指的是5月22日毛泽东回信中说的“距离”。

毛泽东说：“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阶级斗争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非同寻常。

张治中回答：“《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至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居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作，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噢！”毛泽东微笑了，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毛泽东感慨，“1955年我走了几个



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张治中说,“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钧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两人各谈感受,兴致颇浓。

5点钟左右,专列到达裕溪口,毛泽东一行登上过江的小艇。

到了芜湖,毛泽东落脚铁山宾馆。



拒绝专用餐厅，不用象牙筷，穿旧拖鞋，不让烫衣服。“我这儿还有半截烟，不抽不就浪费了吗”

秋雨淅淅沥沥地没有停，芜湖铁山宾馆四周的青松修竹显得愈加挺拔苍翠。幽静的山谷，间或传来一声声清脆的鸟语。

9月19日晚上6点钟，几辆小轿车开至宾馆门前。刚从合肥到芜湖的毛泽东来了。

守候在2幢楼门前的服务员王传云和翟笃勇二人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迎上前去。2幢楼是毛泽东的下榻处，王、翟二人也就担负起了为毛泽东服务的任务。

“你们辛苦了！”毛泽东见面就打招呼，接着握住他们的手，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哪里？父母做什么工作？生活得可好？王、翟二人一边回答，一边陪毛泽东走进门厅。

毛泽东脱下身上的雨衣雨帽，服务员连忙伸手去接，他却摆摆手，自己把它们挂到衣帽架上，转过身关切地说：“瞧你们的眼睛都熬红了嘛！”可不是，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使他们一连几天没睡好觉了。

进了房间，毛泽东便问：“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每到一处，他都要当地报纸。

小王拿来报纸，毛泽东接过来的时候，没忘对她嘱咐一句：“你们要好好学习政治。”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小王进房间请毛泽东到对面特地布置的小厅去吃饭。毛泽东问，其他的同志在什么地方吃饭？小王回答在下面的餐厅里。

“我也到餐厅里吃饭！”说着，毛泽东就往外走。天还下着雨，又是下坡路，小王连忙抄起一把伞跟出去。毛泽东身材魁梧，相比之下王传云身材纤细，她踮着脚，努力把伞撑得高一些。看见她那个费劲的样儿，毛泽东不禁笑了。

“我自己来！”他伸手接过伞，还招呼小王也到伞下来，别让雨淋着。

毛泽东在餐厅一露面，服务员们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这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会像最普通的客人一样到这里来吃饭。

毛泽东随随便便地在餐桌旁坐下，招呼还在愣着的大家：“开饭了！来！坐！坐！”

等大伙儿都坐下了，毛泽东便拿起碗朝饭桶走去。

怎么能让他自己盛饭呢？服务员小王、小周连忙抢着去接毛泽东的碗，可他却把手一挥：“不用，自己来！”

毛泽东走到饭桶前，却发现里边没有饭勺。原来事情来得突然，大家的视线与心思一直放在主席身上，竟谁都忘了取饭勺。服务员们有点慌了，急忙要去取。

只见毛泽东转身走回餐桌，抄起一把长柄汤匙道：“这个不能盛饭吗？”大伙儿都笑了。毛泽东自己端着碗，用汤匙盛了半碗米饭回到桌前。

这时，原来也被安排至小厅用晚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来到大餐厅。张治中学毛泽东的样也自己盛了碗饭，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见了打趣道：“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也说：“真像个窝窝头了！”

拿起筷子，却发现是象牙做的。毛泽东不愿意了，让服务员给换上竹筷。

津津有味吃了几口，毛泽东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要来了一个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自言自语说：“很好！”举筷推荐给大家，“你们都来尝尝？”

张治中说：“我怕辣，不敢吃。”毛泽东却道：“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晚饭后，毛泽东出席在芜湖市工人俱乐部举行的文艺晚会，接见了1000多名工农兵代表。回到宾馆，又接见宾馆全体工作人员。

回到房间，已是晚上11点多钟。按毛泽东平日的习惯，卫士过来撤掉了宾馆准备的沙发床垫和被褥，在木板床上铺上自带的卧具：一条半旧的普通的蓝条子布床单，一条半旧的毛巾被和一个枕头。

服务员拉好窗帘，正准备出去让毛泽东好好休息，毛泽东却叫住她，说，找张桌子来。

小王不知道主席要桌子干啥，就搬来个很小的两屉条桌。搬到门口，

毛泽东拍拍她的肩膀，示意她放下，然后自己抬着另一头，和小王一起两人把它抬在床前。卫士们随即把大叠的文件和笔放桌上。

小王明白了，毛主席还要办公。她连忙要去搬椅子，被毛泽东叫住：“不用椅子了，就坐在床沿上。”一边说一边自己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挪上桌。台灯太矮，他顺手就把一个茶叶筒放倒垫在下面。台灯的细纱罩子不够聚光，小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就把一条毛巾搭在了灯罩上。

毛泽东看了看，很满意地坐下，不一会儿，便沉入他的文件里去了。

深夜1点多钟，毛泽东让秘书给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了一次电话。2点多钟，毛泽东屋里的灯光仍未熄灭。

厨房的厨师准备给主席做点夜餐，卫士说“毛主席不吃夜餐。”

厨师很不放心地问“毛主席那么大年纪，天天工作到深夜，不吃夜餐怎么行呢？”

卫士解释说“主席夜间工作，一般是不吃夜餐的。他还要我告诉你们，请同志们不要等了！”

卫士临走特意嘱咐厨师，主席说过了，明天的早餐只简单准备一点儿就行了。卫士还说，毛主席到农村视察，有时就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哩！

服务员偶尔进屋，想看看毛泽东还需要些什么。见他抽剩的半支烟放在烟灰缸上，就走过去想给他换支新的。埋头看文件的毛泽东发现，和蔼地指着那支半截烟对服务员说“我这儿还有半截烟，不抽不就浪费了吗？”

夜里3点多钟，毛泽东终于可以休息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后半夜的雨下大了，屋檐滴水嘀嗒作响。王传云和翟笃勇生怕惊醒已经入睡的毛泽东，悄悄找来许多垫子铺在檐下。

然后，小王和小翟主动把毛泽东换下来的衬衣拿去洗干净。这是一件极普通的白府绸衬衣，领子和肩头已经打了两个补丁，袖口也磨起了毛。这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们精心地将它烫平后，交给卫士。

不料卫士却说“忘了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衬衣是不叫烫的。烫了，主席要批评。”他还告诉他们，不但衬衣，主席穿的睡衣也补过好几次了，皮鞋的颜色已经褪了，拖鞋的后跟也磨出了须子。因为主席已经休息，卫士也就多聊几句。

“为什么不给毛主席换新的？”小王不解地问。

卫士说“毛主席只要还能穿，就不换新的。”

小翟要把宾馆里的新拖鞋换给毛泽东，卫士制止道：“不行，不经主席老人家同意，不能换任何东西，不然要挨批评的。”

接着，卫士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毛泽东在延安时的故事：有一个冬夜，毛泽东挥笔疾书在写《论持久战》，没留心脚底下取暖的炭火，待发现时一只脚上的棉鞋已经烧了个大洞。那鞋无法穿了，警卫员请房东大娘再赶做一双新鞋，毛泽东竟不同意，说战争年代大家生活都挺艰苦，不能增加老乡的负担，那鞋补一补就行了。当他穿上那只补了一个大疤的棉鞋，还说，这不是很好吗？

小王、小翟听了卫士讲的这些事，又感动又敬佩。

天放亮了，雨也停了。附近火车的一声鸣叫，打破了宾馆的宁静。

小王、小翟踮起脚想轻轻走进房门，看看毛主席是不是被惊醒了。不料见他已经起床，在走廊上散步了。

服务员请毛泽东去吃早饭时，他正在看书。早饭后，又在看书。20日上午9点多钟，一切行装都打点好了，他才把手上的书和笔交给卫士装进书箱，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的视察。

20日上午10点多钟，毛泽东在芜湖造船厂视察。下午3时后，到马鞍山钢铁厂，冒雨看了这个厂的5号中型高炉，炼钢车间，7号、8号高炉。马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向毛泽东汇报了马钢1953年恢复生产以来的情况。当毛泽东知道魏安民是从解放后才学搞钢铁的老干部，他鼓励道：“怎么样，现在懂得一些了吧？”

关于马钢，毛泽东说：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

马钢是毛泽东在安徽视察的第四个钢铁厂。在对这几个钢铁厂的视察后，毛泽东重点谈了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他说：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当天，毛泽东乘火车由马鞍山往南京。至此，毛泽东1958年9月对安徽的视察结束。

中南海里，年轻时就擅长新闻笔体的毛泽东不但评说昔日《大公报》报人，还亲手描述他的9月之旅：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

9月29日，毛泽东一路顺风回到中南海。

30日，人们从广播中听到了一条不短的重要新闻：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0月1日，庆祝国庆9周年的盛大集会上，毛泽东和往常一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他微笑着，激起的却是一片非同寻常的热浪。

当天，《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这篇新闻稿。

人们凝神聆听或争相传阅之时，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不会想到它的大部分文字竟出自毛泽东之手，对此，当年《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有回忆：

那是9月30日下午，他被叫去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一趟。

毛泽东的书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书房。从地板到顶棚都是书架，上面放满各类学科的中外文版图书，尤以社会科学类书居多。临窗的写字台上，一盏台灯，一本日历，几支削好的中华铅笔，铺满桌面的还是书。

毛泽东打完招呼，对吴冷西说，新华社准备刊发我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篇谈话稿已经写好，并且我也修改了一遍，正拿去打字，过一会儿就可以拿到。他让吴冷西先坐下来等一会儿。

吴冷西进门时，毛泽东正在看一本字帖，很悠闲的样子。这会儿，他的话题又兴致勃勃地转到下去视察的事情上。他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发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那篇新闻稿只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他扳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

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搞些调查研究。

吴冷西道，我在5月间还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接口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他又讲，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张季鸾是解放前名声很响的《大公报》的主笔。说起报业，毛泽东很有兴趣，话也似开闸般滔滔不绝。

他议论《大公报》说，《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的“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泽东又重点评说张季鸾，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泽东又说，人们把《大公报》对蒋介石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宾，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吴冷西静静地听着，点头，有时插上几句话，议论一下。

毛泽东又讲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些办法。他举例说，《大公报》



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说到这里，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自已说，我在延安时就经常看。毛泽东认为，《大公报》在培养青年记者上也算有功，大家知道的范长江是一个，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讲到《人民日报》，毛泽东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正谈得热闹，秘书推门进来告诉毛泽东说，新闻稿已打印出来了，请主席过目。

毛泽东接过来，浏览一遍，又递给吴冷西，请他看一遍，问他有什么意见没有。吴冷西看后表示没有意见。

当天晚上，这篇新闻稿就这样广播了。其中对记者所谈的那几段话，基本是由毛泽东亲笔所写。

由于这篇新闻稿涉及到毛泽东 9 月巡视的大部分日程及地点，涉及到毛泽东对此次巡视的观感，包括他对“大跃进”运动中诸问题的看法，包括他对民兵师和帝国主义的认识，因此我们不妨全文引出，来看看毛泽东自己如何又是从怎样的角度来描述他这段旅行的：

新华社 30 日讯：毛泽东主席最近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毛主席 9 月 10 日至 15 日在武汉，看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出铁；会见了工人群众；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看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们办的许多小型化学工厂，同武汉大学师生见了面；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同工人见了面。在武汉同各方面的干部见了面。15 日，毛主席由武昌经鄂城、大冶到了黄石港，沿途看了丰盛的农业、大冶铁山、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群众见了面。16 日上午，毛泽东到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会见了安庆人民群众。当天毛主席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城，沿途经过桐城、舒城、肥西三县，看了丰盛的农业，看了一个人民公社。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



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广大的人流。毛主席第一次访问了合肥城。在这里，毛主席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看了农具展览场；又看了工业农业产品和发明的展览馆。毛主席在合肥会见了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芜湖，看了工厂，会见了干部。20日毛主席到了马鞍山钢铁厂，会见了工人和市民群众。毛主席20日到南京，跟干部们见了面，然后到上海，会见了干部，看了一个钢铁厂。毛主席已经在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主席对本社记者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对记者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90%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

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 郑州会议

1958. 11. 2~11. 10

9月的巡视，触动了毛泽东。以他的敏锐，他感到了什么？

10月14日，毛泽东到天津，同天津市市委和河北省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6日和17日，又分别听取河北保定、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各县负责人的汇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随后，毛泽东接连有4封信给陈伯达，指导他及张春桥、胡绳、李友九和河南省省委书记史向生等对河南遂平嵕岈山人民公社以及邻县进行实地调查，以资比较。同时要求他们读当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3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经石家庄、邯郸、安阳于11月2日到达郑州。在专列上，他召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省委书记开会，了解情况，交代即将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有趣的是，郑州会议有几天还是在专列上开的。

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它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纠正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和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有人想在三五年内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搞

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却是错误的。(二)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是错误的主张,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向与会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本就是已向陈伯达等推荐过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与会的每个人对每一本书都用心读三遍,随想随读,加以分析。

毛泽东一直想对还不熟悉的社会主义经济做一个理性的认识。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研读与分析,他是不是想让高级干部也包括他自己去清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呢?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11月13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在15日凌晨到达武昌。

身在郑州，心在南阳。诸葛亮、二十八宿之首、每人每月几两香油……毛泽东连发三问，装了一书包汇报材料的南阳县县委书记却交了白卷

中原名城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历史渊源甚远，据考证，远在一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不但如此，它还是中原战略要地，豫西南的经济中心。

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过郑州，走新乡，到了襄城县，便有心要到离襄城县只有150公里的南阳看一看。

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阳，毛泽东就亲自为《新华日报》写过一则消息。

但吸引毛泽东想领略南阳风光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南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古迹名胜有好几处。

医圣祠，在南阳东关温凉河畔，是为纪念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建；在南阳石桥镇西，又有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之墓。张衡的《南阳赋》就生动描绘了当年南阳经济、交通和文化的繁荣景象。

南阳汉画像馆，是汉画像石墓较为集中的地区，刻工精湛，题材多样，以浅浮雕加施阴线的技法，画面粗犷、古朴而奔放。

对毛泽东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武侯祠和古宛城。

武侯祠在南阳西卧龙岗，相传蜀汉丞相武侯诸葛亮曾躬耕于此。唐宋时即建祠，元大德年间重修。清康熙时，南阳郡守曾在祠内发现前人题咏“卧龙岗十景”的石刻，曾依石刻修建有半月台、老龙洞、野云庵、三顾茅庐、小虹桥、抱膝石、躬耕亭、古柏亭、梁文岩、诸葛井，与武侯祠的山门、大殿、清风楼、三顾堂、关张殿、石牌坊相衬构成壮观的古建筑楼。祠内碑刻还有岳飞书写的出师表。

南阳市北尚有土丘一处，为古宛城遗址。古宛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

发迹的地方，又有南都、帝乡之称。

对此，毛泽东心神往之，怎么不想来游览一番？

无奈因为不通火车，往南阳去的公路还是石子铺就的，颠簸不平，行车困难。作为东道主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担心毛泽东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便好心劝阻他放弃此行。此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正要进行的郑州会议会务繁忙，心中惦念农村人民公社诸多问题，便决定不去南阳，而让南阳的有关负责人来郑州同自己见见面。

南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得知消息，为自己有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应该向毛主席汇报些什么呢？当然是南阳十年来的巨变和“大跃进”中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他找来办公室主任，找来会动笔杆子的秘书，要电话，听汇报，抓典型，催材料，从县到公社到大队，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情况，分门别类，层层道来，熬了三天三夜，写成几十页书面材料，以备汇报之用。

出发的时间到了。这位书记带上装着材料的鼓鼓的包，乘汽车连夜赶往郑州。

这天上午，风和日丽。毛泽东安排出时间要接见南阳来的这位书记。毛泽东很热情，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对方也激动不已。

大家落座。书记便开始按事先准备的材料，从头至尾汇报一遍。说完之后，他等着毛泽东向他提一些问题。

毛泽东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吸一口，笑笑，开口道“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

这位书记想，这是毛主席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吗？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材料包里也没有讲到诸葛亮是哪里人，该怎么回答呢？他语塞了。

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出答案“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他又接着问，“还有一句俗语，叫做‘二十八宿走南阳’。西汉末年，刘秀就是在你们南阳访贤求将，寻来二十八宿后，才兴兵讨伐王莽的新朝。你说说，这二十八宿到底谁为首呀？”

这是毛主席提的第二个问题吗？这位书记又想。自己的材料包里也

没有答案，这个问题怎么答？从前听戏也听说过马武、岑彭是二十八宿里的人，但谁是头？还有谁？他朝毛泽东摇摇头，感到手心出汗，脸发烧，有些坐卧不宁。

毛泽东又笑笑，自己又答道：“二十八宿又叫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为首。他是南阳新野人，刘秀手下的大将、谋士，很有本事。”毛泽东说完，又说，“这两个问题你不知道，不要紧。我再问你，现在南阳农村的社员，每人一个月吃几两香油啊？”

书记使劲儿地想了想，仍没答案，材料包里也没有这一条。他关心粮棉的丰收，关心超额上交公粮，也注意到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农民不吃香油，吃多少香油，他没在意过，也没有问过。那时市民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香油，而农民吃油，则要靠地里收的芝麻完成上交任务后，余多分多，余少分少。每年或三五斤或五六斤，各地不同。这个问题不再是论古，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的问题，自己无法同毛主席论古，这么一个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小问题自己也没答上来，他感到实在有些坐不住了，费力地说：“主席，我真不应该……不知道。”

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什么，只是分手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  
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公  
社，但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  
像你所说的那样？”潮起潮落，他  
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县委书记和嵯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嵯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两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要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四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 第一个公社在这里诞生

在嵯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嵯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嵯岈山脚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县委书记、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

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使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委副书记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委副书记书记让遂平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信阳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嵯峨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嵯峨山大社”吗？

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嵯峨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委副书记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嵯峨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

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八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嵯岬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嵯岬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友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嵯岬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友久很赞同。

这样，公社就有了正式的名称：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8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8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 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边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一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条长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居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嵒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嵒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 500 斤。”

“500 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嵒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 4 个菜，还有 1 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嵒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不好，就拿出来展览。”

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 126000 多头。”

嵒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嵒山管理区养 9 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 2 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 15 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 个母猪一窝下 14 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嵒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

绍,有 9369 户,43263 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 年到 1958 年共 87 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

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

毛泽东指的是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 3000 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嵯峨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说:“9 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 3000 多人。9 月 1 日,开发工资大会,有 16 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 500 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接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嵯峨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

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 毛泽东对“大跃进”感到愉快，因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

毛泽东这次在专列对遂平县委书记等四人的接见，调查了解了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的一些简单情况。

其实，他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止这些。谭震林、史向生自然有向他汇报并请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秀才们。

1958年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是党的机关刊物。它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创办的，刊物的几个负责人也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可以说，它的创刊，树起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上的一面旗帜。

1958年5月，嵯峨山卫星公社成立不久，《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就来搞调查工作，并帮助公社正式定了名。

事隔不到两个月，7月初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他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中传达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就讲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对毛泽东这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陈伯达的文章中还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边，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



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充分肯定，对嗅觉灵敏、善辨风向的陈伯达来说，是个表现的好机会。7月下旬，他和张春桥到嵯峨山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陈伯达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调查”的范畴。他积极地进行了取消货币的试点。他的试点在土山大队的小集市上，办法是在流通领域内实行以物换物，辅之以“货券”。于是，集市上人们开始以鸡蛋换韭菜，用红薯换辣椒，价不相等，再找些货券的场景。随后，陈伯达又让遂平县银行行长发行在全县流通的货券。

接下来，陈伯达指示遂平全县在8月5日合并成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改任政委，县长改为社长，依次类推，原来的各公社一律改为管理区。对此，陈伯达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协调，社会才会较快地发展。你们现在的公社规模太小，应该搞一县一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更大的气魄才行。”

8月8日，遂平全县各食堂实行统一流动餐票。供给制的范围，由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而扩大到全县。一个月后，开始实行全县工资制。

然而，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全县的财政收入便再也不够发下个月的了。其实，10月份发放的工资人均才1.86元，但就是这样的负担，县财政便也无力再负荷了。陈伯达取消货币的试点遂宣告失败。

就在陈伯达在遂平想一显身手的时候，毛泽东在8月上半个月外出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农村。

他在河南省的继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之后很快成立起来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他在听取山东省省委汇报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对河南省遂平县《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做出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试行简章共二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等等。大到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小到托儿所、缝纫组、公墓的建设，公社年



收入分配项目，简章均有明确阐述，其中还规定，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的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这个简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后，又在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全文刊载。

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

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

乎小心翼翼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成就呢?

许多年后,有人擦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嵯峨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嵯峨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嵯峨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  
伤寒病的流行，毛泽东想了又想：  
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灯夜  
战行吗**

1958年11月14日下午2点钟，几乎是同时，湖北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接到来自县委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赶到县城，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

3点多钟，几人风尘仆仆赶到县委，办公室同志告诉他们，一辆吉普车已经把县委王书记和地委吉书记送往孝感火车站了，要等这辆吉普返回才能送他们过去，并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他们谁也无法静下心来。是哪位首长要找他们？又要谈些什么？

那辆吉普返回了。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三人上了车。不多久，就到了孝感火车站。

站内一片寂静，只有一列专车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过来，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等。由于已入深秋，三人都穿了不少衣服。车厢内有暖气，加上赶路 and 心情激动，他们的脸上沁出汗来。工作人员示意他们可以脱了外套，朱朝启就把大衣脱了挂在衣钩上。

他们被引至第四节车厢内。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陪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看上去，大家等他们已经有一会儿了。

毛泽东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王任重坐的椅子向这边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官木生和晏桃香是毛泽东以前就认识的，这次见了自然不生分。问

过好后，毛泽东看见晏桃香还捂着棉袄，便道“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儿把袄子脱下来。”腼腆的晏桃香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要紧！不要紧！”

毛泽东坐桌子的东边，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地委书记王家吉；桌北是县委书记王振明和朱朝启；西边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一边请大家吸烟，吃苹果，一边问感觉眼生的朱朝启“你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担任什么职务？”朱朝启做了回答，毛泽东顺手记在一个笔记本上。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王任重、地委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泽东谈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家重新坐定后，王家吉接着讲到大办钢铁时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没睡觉砌平炉，后来实在忍不住倒在平台上睡着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哩！”大家跟着笑。

其实，毛泽东这一夜真的没睡，通宵工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在14日这一天凌晨4时，专列在广水时，他还亲自批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思考着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文件是1958年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一则电讯，题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其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电讯稿还说，这些情况已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情。他立即提笔批示将此件印发到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进一步写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



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放下笔，望着外边的夜空，好久好久，他才入睡。

这时在座谈会上，听王家吉汇报到有人困得在平台上睡觉的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合理安排人民生活问题。不过，下面接着是梅白的汇报，他没有打断他。

当梅白汇报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插了话，他望着王任重说：

“我不相信。”

一句话，说得朱朝启和王振明两人有些紧张。身为县委书记与长风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自然对这件事摸点底细。“万斤田”出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起眼儿的角落。青年突击队的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青年在那里改造落后畝时，想了一个主意，用铁锹把几块快黄了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搬到了一块田里去。验收时，人们只在禾场看谷堆，加上天色已近黄昏，过秤时，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有了一个亩产1.5万斤的“万斤田”典型。说起这事，谁的心里也都会有点嘀咕，但这个“典型”既然已经上了1958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影响了全国，到这时，谁敢说出其中的真实情况呢？即便是毛泽东在此时表态不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于是朱朝启沉默着没有开口，心中只盼这个话题快快结束。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面用手指慢慢掐，一边终于换了话题，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看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连续苦干群众疲劳过度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事。

晏桃香已近4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自丈夫死后，独立挑起了生活重担，早出晚归，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见毛泽东这时问她，便实实在在地说：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泽东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转而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儿都



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

也许是觉得官木生没说清楚，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汇报此事。

毛泽东听后说道：“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他深深吸完最后一口，才把只剩一丁点儿的烟头掐灭放到烟灰缸中。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水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泽东听了，情绪才高涨起来，会上气氛也随之活跃许多。

最后，毛泽东又问大家，增加水稻产量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道：“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深耕一点儿行不行呢？”

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表示回去马上照这个法子去办。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天已黑。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站台上还是静悄悄的。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鱼贯开出孝感车站。也许是事先有布置，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只听见热烈的掌声，但没有往常雷鸣般的口号声。

在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里，毛泽东在驻军首长廖冠贤陪同下，晚7点左右同群众一起观看京剧《打焦赞》的演出，这是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在演出前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大家见面。不过，他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戏一完，他便和陪同的军、地两方面负责人退场了。

##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 11. 28~12. 10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压缩国民经济的诸项高指标。认识不尽一致，意见仍有分歧。毛泽东的发言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一步务实。他说，看来，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他说，“两个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说，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在谈到1959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不久前郑州会议上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起来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此时，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一些了，有了不小的调整幅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紧接着这个扩大会议之后，在武昌举行的。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那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改写的，意在纠正急于由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的倾向，它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做出明确规定，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

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会议做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尽管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吓人，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会议还做出了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稿是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他增加的内容不多，有三点：这个建议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应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不致有所误解。

他在南宁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这个设想，今天终于获得结果。12月18日，《人民日报》将这项决议公诸于众。

尽管一篇《张鲁传》再次引发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诸多感慨和不尽向往，但“纠左”的许多迹象，确使党内许多曾为高指标和浮夸风焦虑不安的人轻舒了一口气。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往广州小憩，借此一洗这一年马不停蹄的疲倦。难得有这份闲心，他通览了自己几十年的诗词作品，并对评论界一直争议未决的地方一一注解说明，意在以“谢注家，兼谢读者”。

几十年征战，往事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再起硝烟。

曾经沧海，哪一片是可耕的桑田？

毛泽东在思索。

12月30日，毛泽东从广州返回北京。1959年的元旦即将到来。

谁也不会料到，1959年，中国的历史将再一次极富戏剧性地拐个大弯。

# 毛泽东 MAOZEDONG 在一九五八 ZAI 1958

1958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不平常的一年。

毛泽东走出红墙，究竟看到了什么？接触了怎样的老百姓，怎样的基层、中层官员？他说了什么？他想些什么？他的思想又如何随着外界形势的发展波澜起伏？

ISBN 978-7-5006-8085-7



9 787500 680857 >